

POR-
TRAITS
OF
CHI-
NESE
WOM-
EN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

IN
REVO-
LU-
TION

解放军出版社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著

万高潮 译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Agnes Smedley
PORTRAITS OF CHINESE WOMEN
IN REVOLUTION
The Feminist Press
New York 1976

根据纽约女权主义者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译出

中国革命中的妇女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著

万高潮 译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5.25印张·113,000字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85·68 定价: 1.00元



本书作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出版说明

为满足党史、军史研究以及广大史学、文学爱好者的需要，我们计划出版《中国革命纪实译丛》。这套丛书收集的都是国外一些有名的政治家、作家、记者从不同侧面反映中国革命不同历史阶段斗争情况的著作，既有史料价值，又有一定的文学可读性。但由于作者本人的政治立场、思想认识和对中国情况了解不甚全面等原因，一些书籍中所反映的内容难免有误或带有片面性，有些观点可能与我们有着较大的差距。为了保持原书的面貌，我们基本按原文照印，请读者注意鉴别。

编者

内 容 简 介

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在本书中，以主要篇幅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伟大历史功勋，同时对中国妇女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下所遭受的苦难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对中国妇女中的败类为虎作伥的丑行也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该书是作者“献给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一份厚礼。

目 录

上篇：献身之路

- 一、妇救会长·····(3)
- 二、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10)
- 三、女织工·····(13)
- 四、女雇农·····(21)
- 五、共产党人珊辉·····(26)
- 六、矿工之家·····(33)
- 七、姐弟俩·····(36)
- 八、蒋介石夫人与萧红·····(45)
- 九、我的中国儿子·····(48)
- 十、贵清、梁香和木子小姐的故事·····(62)
- 十一、献身之路·····(76)

中篇：苦难的歌

- 十二、苦难的歌·····(99)
- 十三、难 民·····(102)
- 十四、五个沈阳女性·····(108)
- 十五、徐美林·····(115)

下篇：死的生活

- 十六、死的生活·····(123)
- 十七、烈士的遗孀·····(136)
- 十八、中国的显贵文人·····(153)

上 篇

献 身 之 路

一 妇救会长^①

当我首次见到蔡老妈妈的时候，她已经作为一位妇女领袖在这条河谷崭露头角了。作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女性，她的身材比一般人要高。她的皮肤是褐色的。她那已经衰老的双手上，静脉管就象山梁一样鲜明地突起。她瘦削而结实。当她说话的时候，她的声音坚定而高昂。她那已经出现了根根银丝的头发，从高高的前额朝后梳着，在脖子后面卷成了一个发髻。作为一个农家妇女和许多孩子的母亲，她的一生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磨难，但她从不讲这些。她的白布上衣的扣子全都整整齐齐地扣着，连风纪扣也如此。她的黑布长裤永远象刚刚洗过一样。她们这些人没有谁熨过自己的衣服，可蔡老妈妈总是用重物将自己的衣服压得平平整整。她就是尊严与坚强的化身。

很难相信她已经六十八岁了，因为她显得那么年轻。她告诉我，她是有四个孩子的寡妇。她有三个儿子，两个大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小儿子十五岁，在家里帮助她和媳妇干农活。

乡村的生活是乏味而单调的。但是一年以前，新四军开进了这条河谷，从此以后，整个世界似乎都随着新四军前进了。许多年轻的女学生参加了新四军，在政工部门工作。这些姑娘敲开了乡村妇女的家门。于是，旧世界土崩瓦

^① 原名《The Women Take a Hand》。——译者

解了。但上层社会的夫人们拒不接受她们的宣传，反而指使自己家的男人在外面散布谣言，说新四军的这些姑娘是卖淫的妓女。后来，这些姑娘来敲蔡妈妈的门了。蔡妈妈直视姑娘们的眼睛，她知道了——她们都是好姑娘！她请她们进屋，在她们面前摆上一碗碗清茶，还把自己的儿媳和邻家的妇女都叫过来和这些姑娘坐在一起。用这样的方法，妇女救国会^①在这条河谷诞生了。它日益发展，今天已经有了一百多个会员。

在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小道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蔡妈妈那干练的高高的身影。她动员妇女参加识字班、讨论会，认识战争的形势及妇女应该怎样支援战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人们看到妇女们坐在家门口的台阶上做针线活。我问她们忙什么，她们回答说：“为新四军做军鞋！”

越来越多的妇女接过了以前由男人干的农活，因为年轻力壮的男人都参加了新四军。老头和小孩或者在地里帮忙，或者往前方运军需品，或者往后方送伤员。每逢节假日，妇女救国会的会员总要去医院慰劳伤病员——给战士们送食物，为他们唱歌，和他们交谈，等等。蔡妈妈常常在病房发表演说。她对伤病员说，他们都是她的孩子，都是妇女救国会的孩子。她还向伤病员宣传妇女的权利，要他们动员自己家里的女人参加妇女救国会。有些男人还是第一次听这样的演讲，他们充满了对蔡妈妈的敬意。看来，在这些事情上，比起西洋男人，中国的男子似乎更有修养、更加宽宏大量。在他们之中，反对“新运动”的人微乎其微。

^① 即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群众组织。——译者

新四军女战士开班授课以后，妇女们变得特别自信。女战士在讲授对付日本间谍及其在战区的破坏活动的方法时，鼓励妇女们成为“新四军的眼睛和耳朵”，鼓励她们与失败主义作斗争，鼓励她们随时随地监视奸细和叛徒，鼓励她们抵制日货。女战士用一句口号概括了所有这些活动的内容：保卫我军后方。从此以后，妇女们不再象以前那样规规矩矩地坐着听男人们卖弄小聪明了，她们参与各种谈话，传播外界新闻，出席群众集会，检查从河谷经过的每一个陌生人。

有时，有那么个把男子跳出来反对新女性。例如，有一个姓张的商人宣称，每当妇女们采取行动的时候，她们总弄得男人们精疲力竭，连牛马也累得够呛。他说，蔡妈妈是这些女人中最可恶的一个。这个张姓商人对蔡妈妈恨之入骨，因为她揭露了他的丑行。这个人四下收买蜡树籽。平时，老百姓都从这种树籽里榨油制蜡烛。张姓商人囤积这种树籽，把它们运到芜湖市出售，而芜湖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妇女们急于了解他从事这种交易的原因。她们问：张姓商人从日本人的战线通过，这个月进，那个月出，竟然毫无困难，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条河谷的蜡树籽为什么突然找到了这么大的销售市场？也许，是日本人需要蜡籽油！没有人看得起张姓商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在河谷新开了一家鸦片烟馆。村里的地痞、流氓甚至某些农家男子，都在那里大肆赌博，挥霍钱财。

一天，蔡妈妈径直走进张的店铺，质问他。张姓商人故意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反问蔡妈妈是否想买他的树籽。这是一种侮辱，更是对这位老年妇女及河谷每户贫困的农家的嘲弄。很快，这位商人就知道蔑视人民的愿望

意味着什么了。再没有任何人到他的店铺来做买卖了。每当他从街道上经过时，人们总是侧目而视。小孩子跟在他身后，边扔石头边喊叫：“卖国贼！卖国贼！”一天，他从一家农舍经过时，清清楚楚地听见一条恶狗跟在他的身后叫。

于是，张姓商人怒气冲冲地找到当地政府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请蔡妈妈来作一次友好的交谈。老妈妈来了，但她不是一个人来的，妇女救国会的全体会员护卫着她来到了这位干部的家门口。她的儿子、儿媳和几个亲戚陪伴着她走进了这位干部的家门。其他村民也陆续赶来了。这位干部本人并不是坏人。事实上，他是爱国的，思想也很开明。而且，当他看到拥挤的人群以后，他变得更开明了。他请蔡妈妈解释她和张姓商人的矛盾。蔡妈妈说，这个商人与日本人占领的芜湖市做交易，还开了鸦片烟馆、赌馆。她还说，鸦片烟来自驻扎在本省的某些贪污腐化的国军军官，以前这条河谷从来没有鸦片烟馆。妇女救国会坚决要求关闭这个烟馆。

这位干部承认，吸鸦片和赌博都是一种恶习，有关禁烟的新法律不久就会颁布，可现在还没有禁烟、禁赌的法律。他鼓励妇女就“她们心中的爱”和男人展开讨论。蔡老妈妈回答说：“我们妇女已经讨论过‘我们心中的爱’了，可男人们不和我们讨论。他们叫我们回厨房去，不要干涉男人的事情。”

最后，蔡妈妈向这位干部宣告：“我们妇女已经站起来了，我们不允许有钱人蔑视人民的愿望！”

这位干部拿张姓商人也毫无办法，因为他并没有掌握该商人与日本人进行交易的证据。这位干部说，的确有人在芜湖市看见过张姓商人，可是他也许是象其他人一样偷

越日本人防线的，而法律并不禁止这种行为。

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全中国都要为之庆祝。这条河谷人声鼎沸，准备在一座旧祠堂的大院里召开群众大会。虽然邀请了男性领导人致开幕词，然而这个日子却是妇女的节日，祠堂院子前面的全部座位都是为妇女保留的，男人们都被请到后排就座。画有世界各国的女科学家、女作家和女革命领导人的宣传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她们正号召妇女“发扬弗洛伦斯·南丁格尔精神”^①。

这天上午，蔡妈妈领着妇女救国会的全体会员去军医院慰问伤病员。去病房之前，她们送给我十个鸡蛋、一只小鸡作为礼物。蔡妈妈坐在我对面，请我告诉西方妇女，中国妇女正在为自己的解放而战斗。她说：“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吃苦，表现了女性高尚的心灵。”我被她的话深深地感动了。

我和妇女们一起去了医院病房。我看到，她们提着的大竹篮里，装满了鸡蛋、饼子，还有半扇猪肉。她们的丈夫自豪地将礼物拎到过道上给伤病员看，并高声说着什么。献上礼物之后，所有的妇女集合起来，唱起了《慰劳伤病员》。她们称战士们为“光荣的人”，说他们是为保卫几百万妇女和儿童在战争中受伤的。

这是一个十分精彩、动人的场面。慰问演唱结束后，我和蔡妈妈及其部下交谈起来。她们希望知道自己还能为什么伤病员做些什么。我提议她们做一些枕头，并在每一只枕套上绣上“民族英雄”、“迎接最后的胜利”等字样。她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发动了一场捐款买布料

^①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女护士，她开创了欧美近代护理科学和护士教育事业。所谓“南丁格尔精神”，是指她的救死扶伤精神，特别是她在战争中的救死扶伤精神。——译者

和丝线的运动，并要求她们不要为此感谢我。我说，就象她们在战斗一样，这只不过说明我也在战斗。

三月八日下午的群众大会开得非常成功。蔡妈妈开始有点儿怯场，但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她就妇女的权利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做了演说。她表示，她领导的妇女救国会将根除这条河谷的一切丑恶现象，包括赌博、吸鸦片和懒惰等等。在即将结束演说的时候，她说，她刚刚得到消息——她的一个儿子在前方受伤了，这对于她是一种光荣，同时也要求她负起更大的责任。

她正准备离开讲台，却又停住了脚步，因为会场上所有的军人都站起来了。他们将步枪高举在空中，高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在歌声中，蔡老妈妈缓步走下了讲台。

几天之后，一位军医将我叫到医院的候诊室。我大吃一惊：蔡老妈妈竟然躺在担架上，身负重伤！她用微弱的声音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我。她说，事情与吸鸦片和赌博有关。妇女救国会已经和男人们就关闭烟馆和赌馆的问题进行了辩论，可男人们拒绝接受她们的意见。于是，她和其他妇女闯进那里，强迫男人们回家。地痞、流氓冲着她们高声叫骂。后来，蔡妈妈举起一根粗棍朝桌上砸去，钱和麻将牌散遍全屋。其他妇女亦如此行动。男人们和她们打起来了，发生了一场大乱。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受了伤，蔡妈妈伤得最厉害。

几天来，这条河谷一直群情激愤。父亲们、丈夫们、儿子们、士兵们和指挥员们四处奔走，怒火中烧。蔡妈妈床前围满了妇女。她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带了伤，可她们却高兴地叽叽喳喳讲个不停，因为鸦片烟馆已经被关闭了，张姓商人及其他殴打妇女的男人已经被送进了监狱。

“伟大的胜利！伟大的胜利！”妇女们不停地嚷嚷。

蔡老妈妈恳切地对我说：

“美国同志，你给美国妇女救国会写封信吧。把我们的事情告诉她们。你对她们说，我们胜利了。告诉她们，我们决不会因为这一胜利而满足。”

当我告诉她我会这样做时，我的声音微微颤抖了。我想起了我们美国的妇女——她们穿得漂漂亮亮，被人照料得十分周到，看了成百上千部电影之后便相信“爱”可以解除一切烦恼。我怀疑，她们之中的许多人是否能够理解这里艰苦的生活条件，而中国妇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之下生活着、战斗着。

几个星期之后，蔡妈妈回到了战场。那天，我正在写东西，一抬头，突然发现她站在我的房门口，一小群妇女跟在她身后，她们都在开怀大笑。我和她们一起走出房门，发现许多手捧枕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站在外面。每只枕套上都绣着花鸟和“民族英雄”等口号。妇女们从一个病床到另一个病床，将枕头一只一只地送给伤病员。伤病员们报之以极大的惊奇和喜悦。

然而还缺几只枕头，因为刚刚进来了几个新伤员，其中包括两个日本战俘。在蔡妈妈的动员下，两个中国士兵将自己的枕头让给了日本战俘。拿着这一礼物，蔡妈妈讲了一番关于妇女权利的道理。日本战俘注视着蔡妈妈，脸上露出了惊诧而尴尬的微笑。

“这些日本战俘躺在这里什么也不能干，却在聆听老太太关于男女平等的讲话。”我高声冲着——一个医生说道，“伟大，真伟大！这位老太太竟然注意到了受伤的日本战俘。这对他们是一剂良药。”

二 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①

一天，在妇女会议室里，青年委员和妇女委员召集来自全省各地的代表们开了一个会。我是主要发言人。因为我是外国人，人们希望我就国际妇女运动做一个全面的报告。然而我知道，这是我所发表过的最为困难的一次演讲。虽然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仅仅报告了一些零零散散的片断。我相信，我对中国妇女的了解，比她们对外国妇女的了解要多。会议室里挤满了妇女，包括许多即将生孩子的孕妇。她们中的大多数受过教育，但也有一些工人和农民。她们将会议室装饰一新——到处挂着标语，标语上写着诸如“全中国反法西斯力量和全世界妇女团结起来”之类的口号。有一张标语甚至将我称为“中国伤兵的母亲”。

一群穿着小军服的战争孤儿，把从山上采来的野花作为礼物献给我。他们还以伶俐的口齿向美国儿童发出了一个小小的信息：中国儿童决心战斗下去，直到中国赢得自己的解放。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送给我两双白色的棉袜子。青年委员会中的妇女委员们写了一首欢迎诗。她们在诗中宣称，几千年来她们一直被人践踏，现在她们看到了前面的新曙光。

从这些妇女口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妇女的悲惨境

^① 原文如此。史沫特莱在此可能是指青年救国会和妇女救国会的委员。——译者

遇。许多人说，中国不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她们便不结婚，因为家庭生活的负担十分沉重，致使已婚妇女极少能够参加社会活动。这倒是一桩新鲜事。因为在中国，结婚被认为是每一个姑娘的责任。如果她们不结婚，单单是她们的家庭对她们施加的压力，就会使她们的生活变得极其悲惨。女性一到二十五岁就被人认为“老了”。过了这个年纪，便没有几个人认为她们还会有结婚的幸运。

她们告诉我：绝大多数妇女都是文盲，这些人缺乏训练，没有富于条理的思维习惯，至今仍然为封建主义的陈规陋习所束缚。在安徽的一些村子里，还存在着溺婴的现象，女婴一出生便被扔进水里溺死了。姑娘们很小的年纪就订婚了。这些姑娘在自己的婆家长大，然后结婚。婆婆虐待童养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以致于妇女委员会常常不得不去解救这些小姑娘，并让她们集中住在一起。

妇女委员会的秘书朱清霞小姐——一个受过教育的二十多岁的已婚妇女，曾经对我讲：

“大别山地区曾经是苏区。当时，妇女们松了裹脚布、剪短了头发、读书识字、参加社会活动。可是现在，她们的头发长长了——留短发的妇女都被国民党军队当作共产党杀害了。我们去找她们，鼓励她们剪头发，鼓励她们参加抗日组织，可她们害怕白色恐怖死灰复燃。

“十分奇怪的是，尽管苏区的大多数妇女都不能读书写字，但她们都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知道世界大事。她们在会议上的发言也很出色。我们告诉她们，即使她们参与公共事务，她们也不会被人杀害了；即使没有我们的帮助，她们也可以和当地村子里的男人们一起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妇女，觉得自己做妇女工作很困难，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程度都完全不同于那些乡村妇女，以致于很不容易在我们和她们之间找到共同点。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组织了一批乡村妇女在这里受训。

“我们还遇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问题。当年，苏区严禁强迫婚姻。只有在男女双方经过互相选择，并且都不要嫁妆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成亲。但是现在，苏区不复存在了。有些男人又主张按照陈规陋习，让女子在童年时期就和他们订婚。童年的婚约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有时，妇女们被他们用‘偷’的手段或者通过暴力带回家中，那些被‘偷’的妇女也许是孤身一人，她们的丈夫或者已在内战中被杀害了，或者正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奋勇战斗。于是，我们的妇女委员会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麻烦——强迫这些男人把他们‘偷’来的妇女送回家去。”

三 女 织 工

一九三〇年盛夏，正当我到达广州的时候，又一位将军被他的卫兵杀死了。他的卫兵接受了与他争雄的另一位将军的五十块银元。这类讽刺性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广东省政府是半独立的，可它落在将军们手中。在南方，这些将军通过暴力手段占有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享受的一切财富。他们乘着防弹汽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卫兵耀武扬威地站在车子的踏板上，这就是将军和官员们的风度所在。他们认为这种作派可以给他们带来力量。

我和他们这伙人都见过面，谈过话。不过，他们说他们不相信这一套。他们待我倒十分客气。因为在盛夏，外国旅行者是很少到中国南方来的。于是，我有了一艘归我本人支配的官方汽艇；还有一名官方向导，领着我参观工厂、公路、新自来水系统以及孙中山纪念堂等等。为了解真实情况，我不仅依靠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而且依靠中国的大学教授，或者偶然相识的报社记者、编辑、教师、作家，以及德国驻广州的领事^①。

现在，中国丝绸在美国的市场正迅速被日本富翁夺走。我在一年最热的时候到中国南方来的真正目的，是想研究那几百万名蚕农。然而，我并不希望作为实力雄厚的广州丝绸同业公会的客人去参观丝绸工业区，因为同业公会就

^① 一九一九年史沫特莱即离美赴欧，侨居柏林八年。一九二八年她来中国时，身份是德国《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译者

象一尊笑咪咪的、袒露着大肚子的、巨大的如来佛。后来，我找到了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的几个教授，他们也正在研究工业问题。一位年轻的专家正准备离开广州去顺德的丝绸工业区作为期六周的巡视。我和他一起去了广州丝绸同业公会。在同业公会，他和一个多疑的同业公会负责人争执起来了。最后，同业公会答应让我们乘他们的江面汽艇前往顺德。在那里，几百万农民正在拚死拚活地干活。在那里，南洋的百万富翁们已经建立了许多大型丝厂，厂里的纺织女工全部是年轻姑娘。

次日，年轻的专家和我一起登上了一艘江面汽艇。艇上的其他乘客全部是同业公会的商人，大约有二三十个。这种汽艇装有铁甲板和机关枪，以保护商人免遭“土匪”的袭击。据我所知，所谓“土匪”都是农民，每年的某个时候，他们占据水陆交通干线以求生计。

我曾经想过，如果这些“土匪”劫持了我们的汽艇，他们将获得足够维持全村几个月生活的粮食。吃饭的时候，这些商人围坐在桌子四周，狼吞虎咽，鸡骨头扔得满地都是。他们谈论的话题都围绕着丝绸、金钱、市场，以及商行遭受的损失等等。丝绸工业的确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即使出现亏损，这些商人也不会掏自己的腰包。

我的年轻伙伴敬畏这些商人。而一谈起蚕农和丝厂的年轻女工，他的声音就充满了敌意和轻蔑。他似乎特别仇恨成千上万的纺织女工。他告诉我说：这些女人作为同性恋者在全中国都声名狼藉。她们拒绝结婚。如果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了，她们就用自己的的一部分收入去贿赂自己的丈夫，并唆使自己的丈夫娶姨太太。这样的姑娘结婚

以后，最多只是为丈夫生一个儿子。然后，她便重新跑回工厂去，拒绝再和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政府刚刚颁布了一道法令，禁止妇女通过贿赂等手段逃婚。但是妇女们对此漠然视之。

“她们太有钱了——这就是问题的根源。”我的年轻伙伴解释道，“她们每个月挣十一块银元，于是她们便变得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他补充说，用这笔钱她们可以赡养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祖父母。“她们随便挥霍自己的钱！”他叫道，“我每次去电影院，都看见她们成群结队地坐在那里，手拉着手。”

他责难道：丝厂一直是共产党和工会活跃之地，直到一九二七年他们才被禁止。现在，这些下流的姑娘通过组织秘密的“姐妹会”来逃避法律。她们甚至敢于为缩短工时、增加工资而罢工。不时地还有两三个姑娘，因为她们的家庭强迫她们结婚而自杀身死。

一连几周我们或者步行，或者乘小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集市到另一个集市，四处奔波。骄阳似火，衣服就象外科医生的手套那样紧紧地贴在身上，汗水湿透了我们的帽带和鞋袜。夜里，我们在乡村小客店里租两个房间，或者在祠堂里挂上蚊帐、支起行军床。所有的道路旁都是半裸的农民，他们的身子压得低低的，背着用大竹筐装着的蚕茧。集市上到处散发着蚕茧和生丝的臭味。每个村子都有许多大竹盘，蚕就在这里面生活。上身赤裸的农民没日没夜地照料着它们，而农民自己却因焦急忧虑而日见憔悴。

当我询问农民的生活和劳作情况时，年轻的专家便为

我充当翻译。农民的家都是泥土地面的茅屋，里面空空如也。所谓床，不过是一块木板，上面铺着一张旧席子，挂着一顶黑糊糊的纱蚊帐。通常还有一座小小的粘土灶，上面搁着一两件炊具。也许，还有一张陈旧而残破的桌子、一把窄窄的凳子。几百万农民的家都是这个样子。财产是按桑树的多少来计算的，但拥有几棵桑树的农民屈指可数。为了养家糊口，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将自己的蚕茧提前卖出去了。如果收成不佳，他们便破产了。无论我们走到那里，情况大都千篇一律：蚕农被商人用典当手段控制起来了，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挣脱债务的锁链。

只有在丝厂林立的大集市附近，才能见到稍稍象样一点的家庭和稍稍明朗一点的面孔。而这些人家的女儿，通常都是纺织工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理解，当工业主义似乎在其他地方引起灾难的时候，它对这里的女工所具有的意义。整个中国只有在这个地方，女孩子的出生才被认为是一件幸事，因为女孩子在这里是家庭的主要支柱。姑娘们对自身价值的自我意识，在她们尊贵而独立的举止上表现出来了。人们指责她们为同性恋者的原因，现在我才有所了解。只要她们将自己的地位与已婚妇女的地位加以比较，就不可能分不出高低贵贱。她们的独立性似乎是一种个人对官方的挑战。

当我们访问丝厂时，我的同伴对这些姑娘的仇恨变得更明显了。姑娘们身穿黑色衣裤，一长列一长列地坐在沸腾的茧桶前。她们的手指在不断旋转抽出的蚕丝中抖动着，被开水烫得通红。突然，一句什么话从她们的行列中传出来，引起全车间一阵大笑。年轻专家的脸色立即变得铅灰。

“她们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说您是帝国主义的魔鬼。

她们在取笑您的衣着、头发和眼睛。”年轻的专家向我解释道。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一座古老祠堂的门口。这是一座空荡荡的石头建筑，我们在里面架起了带蚊帐的行军吊床。运河对岸，高高地耸立着一座丝厂的围墙。不一会儿，由身穿黑色衣裤、手提马口铁饭盒的年轻女工组成的人流便开始从工厂的门口倾泻而出。她们个个都趿拉着一双木拖鞋，走起路来卡答作响。她们都将自己那光滑的黑发梳成一根沉甸甸的辫子，辫子上扎着一条两三寸宽的红丝带，样子十分可爱。

当她们走过架在运河上的小桥，经过祠堂门口时，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见过比她们更美的女性。

我怂恿我年轻的伙伴为我当翻译，可他不干，说他不懂女工们的方言。他的态度十分明确，竟然一个人站起来朝镇上走去。等他走后，我也走下了台阶。一群姑娘汇集在我的周围，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我主动递给她们几颗麦芽糖，她们一边吃糖一边仔细打量着我的衣着、头发和眼睛。我也以此回报她们。不一会儿，我们都大笑起来。

两个姑娘挽起我的手臂，推着我朝铺着石子的小街走去。其他姑娘则跟在我们后面，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我们走进一个姑娘的家，受到了她的父亲、母亲以及两个大眼睛的小弟弟的热情欢迎。他们身后是一座小小的房子，里面已经挤满了姑娘和好奇的邻居。房中央的小方桌上亮着一支蜡烛，桌子周围摆满了椅子，我被安排在最荣耀的座位上，茶水一杯一杯地送了上来。

接着，一场奇特的谈话开始了。即使我知道最标准的北京官话，也不能理解这些姑娘们说的话，因为她们的语

言与中国其他地方的语言根本不同。我曾经断断续续地研究过中国话——在满洲，在北京，在上海——可是每一次，在我有所长进之前，我都不得不转到一个新的地方。而我先前学过的一切，在这个新地方几乎毫无用处。上海有它自己的方言，我学的北京话在上海总是引起哄堂大笑，在南方更是毫无用处了。只有传教士和外交官才能在北京语言学校学习一年，旅行者则不得不在旅行途中完成他们的学业。

因此，我和丝厂姑娘们的谈话是靠表情加手势进行的。她们指着周围的孩子，问我有没有孩子。“没有？那您也没有结婚吗？”^① 她们对我的回答似乎很有兴趣，也很吃惊。为了解释清楚，我拧开自己的自来水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试图以书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检查了一遍书写工具，我便开始动笔了。现场的气氛令人十分兴奋。

一个站在门附近的男人用北京官话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能够听懂他的话。“我是一个美国人，一个新闻记者。”——他把这些转述给挤在屋里的人们。“是的，我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曾经是一个工人。”^② 当这个男人把我的这句话传达给她们时，她们显出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姑娘们有的挤在椅子上，有的肩并肩地站在我身后。我们偶尔讲讲北京官话，但更多的是依靠手势。我得知，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每个月挣八九块银元，只有少数几个人挣十一块。她们一天工作十小时——并不象我的同路人说的是八小时。而且以前，她们一天甚至要工作十四个小

① 史沫特莱曾经结过婚，但孩子未能成活，她后来亦与丈夫离婚。

——译者

② 史沫特莱出身工人家庭，本人亦当过卷烟女工。——译者

时。我想问她们是如何争取到十小时工作制的，可我的语言不够用，于是我便通过在笔记本上画图来补充语言的不足。我先画了一座丝厂，一个大胖子男人站在屋顶上哈哈大笑；然后又画了同一个大胖子男人，可现在他却在哭哭泣泣，因为一排姑娘正手拉手地围着工厂站着。她们俯身在这几张图画上叽叽喳喳，然后一个姑娘喊出两个音节，于是姑娘们开始表演“罢工”了。她们挽起手臂，似乎是表示拒绝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将肘部支在桌上，低下脑袋，似乎是表示拒绝她们的行动。接着，她们笑着手拉手地连成一个圆圈，并且将我也拉进了这个圈子。我们大家都站在一起，放声大笑起来。是的，她们就是这样赢得十小时工作制的。

一个姑娘突然用甜甜的女高音唱起歌来，片刻之后歌声便嘎然而止。紧接着，作为对她的回应，全体姑娘齐声高唱。领唱的姑娘一遍又一遍地用歌声提出问题，其余的姑娘则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回答。我呆呆地站着，为眼前这种我尚不能理解的事态激动得不知所措。

然而，奇妙的歌声停止了，她们在向我要求什么——她们想要一支歌！《马赛曲》在我心中升腾，我唱起了这支歌。她们高兴地叫我再来一个，我又唱了《国际歌》。我一边唱，一边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反应，然而她们根本不知道这支歌。看来，说这些姑娘是共产党人，完全是撒谎。

一阵轻微的骚动之后，我看见一个男子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根长笛。他将笛子放在唇边，笛子发出了悠扬的声音。接着，笛声变得十分高昂，领唱姑娘的甜甜的女高音紧紧地跟了上来。突然，她停止了歌唱。这时，笛声更加高昂了，一个男子的歌声加了进来——他在诉说着一个

古老的故事，姑娘唱着回答他的问题。这支歌表现了民间音乐的一般特性，它肯定是一支民谣，是一首古老的民歌。

就这样，我们这些彼此不通语言的人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当我返回我下榻的祠堂时，许多人伴随着我，有一个人还提着摇摇晃晃的灯笼为我们照路。我走过宁静的铺着石子的院子，回到自己的房间，上了床。整整一夜，乡村更夫一边敲着铜锣，一边高声吆喝着“平安无事”。他的锣声开始听起来那么遥远，然后来到了祠堂墙外，接着又远去了……

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想着远古时代的情景：共同的人性，优良的品质，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团结，等等，等等……

四 女 雇 农

红军^①的队伍沿着山道盘旋前进，鲜红的军旗迎风飘扬。终于，宁冈出现在他们面前了。甚至连店铺老板和小商人都挤在欢迎他们的人群中。

那天，宁冈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许多村子里的农民和雇工都赶来参加，大会盛况空前。井冈山地区的革命群众运动从此兴起了。

会上，建立了农会、工会、雇农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随后，又从这些新生的联合会中选出代表，成立了统治这一地区的革命委员会。而革命委员会，后来即演变成了苏维埃政权。

在宁冈县，未曾裹脚的女雇农数以千计。作为劳动一年的报酬，地主仅付给她们一点点稻谷和四五块银元。而且有些人本身就是奴隶，被地主买去干农活或者家务。

这些女雇农都参加了雇农联合会，并且在其中占了优势。组织赤卫队的时候，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踊跃报名。她们说：“看——我们是大脚，从来没有裹过的大脚。我们可以象男人那样行走和工作，我们象男人一样强壮。给我们枪吧！”

于是，宁冈的赤卫队成了一支男女混编队，武装男女

^① 本章中的“红军”应为“工农革命军”。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布《军事工作大纲》，才将工农革命军改称为红军。——编者

都在自己的手臂上套着红袖标。

宁冈大约有两百名妇女是编织袜子和内衣的工人，她们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如果老板需要，在店铺里工作的工人还得充当营业员。有许多妇女为了养活自己的家庭，既要纺纱、织布、制鞋、编席，又要在地里干农活。

在红军开进宁冈之前一个星期，就有三千名妇女坚决要求组织起来。看到女雇农组织起来了，她们也要求加入雇农联合会。在她们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妇女组织。她们的要求没有实现。取而代之的，是为她们建立了一个普遍性的妇女组织——妇女联合会。她们在改善妇女劳动者的境遇并使之摆脱旧的习惯与传统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不久，又一个新观念席卷了宁冈全境。领导着各个群众组织和红军的共产党号召人民无偿地没收为地主、寺庙和家族所控制的全部土地，并将这些土地分给受苦受难的农民。

农民对此非常热情，许多人立即行动起来，而女雇农则站在这场斗争的最前列。

但是，当这个问题正式提交农会讨论时，事情就进行得不那么顺利了。阶级斗争开始出现了。因为农会中不仅有贫农和中农，而且还有富农。富农剥削他的雇工，有时还向佃户出租土地。许多富农能说会道，因此他们在农会里或群众大会上成了头面人物。在公众选举中，他们作为农会的委员互相支持。贫农、农奴和奴仆总是从地上抬起眼睛冲着他们说：“好吧，就让他当委员吧！我们是穷光蛋，笨手笨脚，讲也讲不得，写也写不得。”

分配土地的问题提出之后，富农们大喊大叫：“革命就是为了平等。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同样多的土地！”而这就意

味着，家庭中的任何成员，无论是老人还是婴儿，都要得到同样多的土地。

贫农家庭的成员都很少。有许多孩子还是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就因贫困而死去了。活下来的寥寥无几。而且，在这些幸存者中，男孩子还不得不四处奔波，到镇上或者沿海城市去找活干、当苦力，有些甚至去投奔军阀“当兵吃粮”；女孩子，也被作为奴婢卖给了人家。贫农家庭通常是两三口，最多也只是四五口人。而富农家庭就人丁兴旺了。因为如果一个人生活富裕，他的兄弟和儿子就用不着跑到城市去作苦力，干那些在国外通常是由牛马和机器来干的苦活。

尽管贫农不可能与富农平等，但是分配土地的口号仍然在他们心中点燃了希望之火，他们几乎陶醉了。因为无论如何，土地一分下来，他们现在的被奴役状况就会有所改善。只要给五亩土地，他们就觉得不少了。

实际上，平分土地在富农心中引起的是痛苦，因为他们都拥有二十、三十、四十甚至五十亩土地，他们事实上都是一些小地主。只是因为这一事实，他们才象虫子一样钻进农会，以求逃避地主的厄运。他们借革命之风扬自己之帆，真是狡猾极了。宁冈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后，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被分配下去了。贫农和雇农得到的土地不多，有些是五亩好地，有些是六七亩中等地。可是富农却保留了他们早已拥有的一切财富，并且还得到了更多的土地。

土地分完之后，贫农们便抱怨开了。他们说，富农也剥削雇农，也拥有牲畜和农具。仇恨的波澜在一部分贫农心中掀起来了。有些贫农说，人应该知足。农会中的富农大概听到了这些怨言，他们便表现得好象他们自己已经把

土地分给了贫农。由于当时群众问题那么多，红军的任务那么频繁，党的担子那么沉重，以致在土地革命的最初日子里，土地的分配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红军在宁冈一直呆到了四月中旬。谷雨前后，红军突袭了离宁冈很远的集市，击溃了白军，缴获了大批枪枝弹药，并从富商手中没收了大批粮食。在大地主家里，红军政治部留下了布告。布告说：

“市民们！

今天，中国革命的先锋队——中国工农红军，从压迫、剥削穷人的有钱人手中没收了以下物资：稻谷五百担、食盐一百担、火腿二十五只、银元五千块、白布二十丈、电筒一百五十只（带电池）、西药三十六盒及制造子弹用机器一套。红军不拿工农群众一针一线，不拿小商小贩一针一线。

此布

红军政治部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

四月的第二周，通信员从北边赶来，带来了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向宁冈进发的消息——他们准备在井冈山山下迎接朱德的队伍。

司号员吹响了军号，嘹亮的号声在宁冈全城回响，震得树叶微微颤抖。为了加强宁冈赤卫队，留下了一个中队的红军战士。然后，红军便开始向井冈山进发。红军战士军容整齐，精神焕发。他们的军服已被宁冈妇女和姑娘组成的缝补队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他们的脚上穿

着崭新的草鞋。高举着迎风飘扬、猎猎作响的红旗，红军大队沿着山道盘旋而上。他们象飓风一样，朝着井冈之巅奋勇前进！

五 共产党人珊辉

珊辉是中国湖南一个大地主的女儿。她曾经穿着绫罗绸缎、别着自来水笔上学读书。后来，她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和一位农民运动领导人结为夫妻。在以后的年月里——不，我还是从头开始讲述她的故事吧。

她的母亲是一个奇特的旧式女人，裹了脚，顺从旧式封建丈夫的每一个愿望。然而，她又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女性。她看着自己的儿子们长大成人，上学读书，并转向新思潮。这些新思潮有一些是与妇女有关的。例如，妇女不应该裹脚；妇女应该和男子一样读书；妇女应该按自己选择的时间，和自己选择的对象结婚，等等。

每当儿子们谈起这些话题时，母亲总是静静地坐在一旁，一边听，一边用眼睛盯着女儿珊辉，同时用脚轻轻地摇着女儿的摇篮。新思想长时间地影响着她。这些思想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后来，母亲为了女儿的自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场斗争是在她家的高大的石头围墙里面进行的，斗争的对象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兄弟，母亲使用的是受制于人的妇女古已有之的武器：泪水、哀求、计谋、狡猾，等等。首先她赢得了——一个胜利：她的丈夫同意让珊辉受教育。条件是：教师必须是旧式男人，必须上门教学，而且只准教中国文字。此外，珊辉一定要裹脚，一定要按旧俗订婚。就这样，孩子的小脚被裹上了，并且和弱不经风的邻居家

的儿子订了婚。这个邻居是一个有钱的地主，一个有着许多姨太太的腐朽老头子。

珊辉的父亲在家里一直实行着暴君式的统治。但珊辉十一岁的时候，他突然死去了。这大概是一种自然死亡，珊辉的母亲流下了悲痛的眼泪。然而，父亲的葬礼还没有结束，小姑娘脚上的裹脚布就被去掉了；父亲坟上的泥土还是湿的，珊辉就进了百里之外的一所学校。

裹脚布虽然去掉了，但珊辉的小脚已经因为五年的束缚变形了。在姑娘的一生中，那半死的、无用的、弯曲的脚趾，象石头一样阻碍着她的行动。

可是无论如何，裹脚布毕竟是去掉了，被奴役的标志毕竟是去掉了。现在留下来的，是珊辉和那个富家子弟的婚约。这种婚约在中国是一种合法的束缚，敢于为子女打破这种束缚的父母都将被召往法庭，从重处罚，就象犯了滔天大罪。然而，珊辉的母亲似乎有这种被封建人物称为罪过的企图。人们都怀疑她企图推翻这桩婚约。更有甚者，到处都传说她不是劝珊辉恪守闺训，而是鼓励珊辉追求自由，策动珊辉大逆不道。当珊辉领导学生罢课反对腐败的学校当局这一消息传来后，谣言更是象烈火一样蔓延开了。当时珊辉年近十六岁，正是适合结婚的年龄，然而却“不体面”地被学校开除了。珊辉回到家中，头颅高昂，傲然不屈。她的母亲并没有压制她，而是和她单独谈了一次话，然后就将她送到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学校上学去了。这个学校很远，在长江边上的武昌。珊辉进了这个学校之后，传闻就更多了，说她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学生运动领袖；还说在武昌，男的女的都在一起读书，等等。

事态越来越严重了。最后，那个有钱的邻居把珊辉的

母亲叫到法庭，并呈交了一份诉讼状，指控她阴谋悔婚。但是，老太太非常机智地捍卫了自己。她使法庭相信，她的全部愿望不过是将婚礼推迟两年而已。

珊辉的母亲只能使法官相信她的话，那个地主是不相信的。那个地主还得到了杀气腾腾的乡绅们的支持。那年，当珊辉从学校回家度假时，他们便企图用暴力手段将她抢过去。但他们失算了，珊辉逃跑了，她在武昌又呆了一年。第二年，当她再次回家时，他们又企图抓她。然而，在母亲的帮助下，珊辉又一次逃脱了。她先住在农民家中，然后通过曲折的途径回到了武昌。

然而，她刚到武昌，她母亲逝世的噩耗就传来了。这也许是自然死亡，也许并不是。珊辉说，她母亲是因为长期斗争的疲劳和封建家庭的拖累而去世的。“她是为我而死的。”在她的语气中，流露出来的与其说是悲哀还不如说是骄傲。

珊辉的同学试图阻止她回家奔丧。可这是一位母亲的死，是一位为妇女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的死。而珊辉，少年气盛、无所畏惧，还颇为两次逃脱旧势力的追捕而骄傲。她觉得，她可以再次击败他们。为了防止万一，她和学生会的同学们约定：如果她没有在预定的日子里回到武昌，他们就去救她，帮助她脱险。

老母亲的尸体尚未入土，珊辉的家就被全副武装的男人们包围了。她被强行抓起来，带到她的婆家。她被监禁在结婚用的新房里，等候成亲日子的来临。但她并没有坐等厄运，而是整整绝食了一个星期。只是由于这个家庭中另一位反叛型妇女的出现，她才开始吃饭。

这位妇女是这个地主的第一个妻子。这在中国被称为

主母，以便与她丈夫的姨太太们相区别。几年来，这位老太太一直关注着这位奇特的反叛型的富家女儿，关注着围绕着她而发生的持久的斗争。而此刻，她便运用妇女自古以来就一直在运用的小小计谋，为这位姑娘赢得了自由。当然，这种为这个地主本人所同意的自由，不过意味着可以在室内和院中散步，但绝对不许超越于高大的围墙之外。

在中国，消息常常传播得很快，几乎没有什么持久的秘密存在。一个女学生、两个男学生从武昌赶来了。他们住在这个地主的邻家，收买了他的一个佣人，从而与珊辉取得了联系。一天晚上，珊辉翻越了高墙，和她的朋友们一起，乘着星光朝武昌赶去。

这是一九二六年夏末发生的事情。当时，革命风暴正席卷全中国。不久，南方来的军队攻克了武昌城。珊辉放弃了学业，投身到民众之中，她成了一名共青团员。在工作中她遇见了一位农民运动领导者，他们相爱了，她不顾一切陈规陋习——正是这些东西借助法律将她和那个大地主的儿子束缚在一起，宣布自己和自己所爱的这个男人自由结合了。从这一天起直到现在，她一直用自己的全力在这片土地上奋斗着。她一直过着最贫苦的雇农所过的生活，穿着他们所穿的衣服，吃着他们所吃的食物，象他们一样劳动，和他们一起在前线面对死亡。即使在怀孕的时候，她也没有放下革命工作。孩子一生出来，她便将他背在背上，继续从事各项工作。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的日子里，作为最活跃的女革命者之一，珊辉被派往她的老家担任国民党妇女部的领导人。在那里，她组织革命法庭审判敌人，没收大地主的土

地并将它们分配给贫苦农民。她帮助农民没收了自己家里的全部土地，也没收了自己以前的未婚夫家里的全部土地。

当革命发展成为全社会的运动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分裂了，可怕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军阀和封建地主重新掌握了权力。珊辉的家庭和她以前的未婚夫的家庭都要求国民党逮捕她。这一命令发布下来了。这对她及她的孩子均意味着死亡。和她一起工作的两个妇女、三个男人被捕了，其中妇女的乳房被割了下来。然后五个人全在大街上被砍掉了脑袋。工人们在棺材上钻了一个出气孔，将珊辉和她的孩子藏在里面，把她们抬出警备森严的城门，来到城外的坟地。从这里，她开始向武昌进发。途中她被敌人逮捕了，她的短发暴露了她的革命者的身份。但她用双臂抱着出生不久的孩子，坚持说自己无罪。于是，她被释放了。

到达武昌之后，共产党命令她返回湘西一带，投入秋收期间频繁的斗争。当地的农民将自己武装起来了，拒绝交纳租税，并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在那些日子里，珊辉和他们战斗在一起。夜里她睡在山坡上的树林子里，周围躺着的全是不敢冒险回家过夜的人。国民党军队开来对付他们，农民们被打败了，几千人被杀，其余的全都被解除了武装。

珊辉又回到武汉，党再次派她投入战斗。然而这一次，她是冒充国民党员出发的。她到了为军阀控制的一个城市。城外，全是农民军；城内，珊辉作为国民党妇女部的头头公开活动着，暗地里却在工人群众和国民党士兵中进行宣传。不久，这个城市的首席法官见到她，并且爱上了她。此人是一个有钱的军阀。珊辉从他那里打听到了不少

国民党军队“围剿”农民的计划，并将这些情报送给了城外的农民军。而这支农民军的领导人之一，就是她的丈夫。

因为在军队中进行宣传时不谨慎，珊辉被捕了，并被判处了死刑。她托人去找那个爱着她的官员，此人竟然相信了她的申辩。于是，他将她放出了监狱，并让她离开这座城市。后来，农民军向这座城市发起了攻击，但是失败了。她的丈夫活了下来，她和他在武汉见面了。

接着，珊辉从事党的专门工作——排版与印刷。她总是让孩子躺在自己身边的桌子上，自己一边工作一边唱着催眠曲。一天，敌人突然搜查了她的家。碰巧，她的丈夫外出了，她在敌人来到之前几分钟离开了家。几个小时以后，她偷偷潜入家中寻找孩子，发现敌人已经将孩子扔进水桶淹死了。珊辉的丈夫用脸颊擦去她痛苦的泪水，珊辉又重新投入了工作。

一天，珊辉去访问母校的校长，并留在学校里过夜。第二天黎明时分，她被口号声惊醒了，她觉得她听到了自己丈夫的声音。她坐起身来，屏息静听，听到了清晰的口号声：“为了共产主义！革命万岁！”她的朋友用枕头堵住她的耳朵，激动地说：“他们每天都在这里屠杀共产党人，他们把这个广场当成了刑场。”

枪响了，口号声消失了。珊辉站起来，跌跌撞撞地朝刑场走去。敌人正在离去，只有一小群旁观者还站在那里。珊辉看到了她丈夫温热的尸体，她一下子昏倒在地上。

白色恐怖也使珊辉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党组织命令她离开武汉。她从长江流域的一个城市到了另一个城市，在工厂里负责组织妇女和儿童。但是她在这个岗位没

有工作多久，因为她那双变形的脚使她不可能一天在机器旁站上十二到十四个小时。

一九二九年夏天，她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被派往长沙。在那里，她和两个男共产党员（其中一个农民领导人）一起被捕了。她在监狱里关了六个月。后来掌权的老军阀被一个新军阀取代了，新军阀为泄私愤，释放了老军阀关押的许多囚犯，珊辉也乘机出狱了。

珊辉是带着皮肤病和胃病出狱的。她得了胃溃疡，她的皮肤因贫血而变成青白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她依然回到乡下，继续坚持战斗。

一九三〇年春天，她参加了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随后，朋友们将她送进了医院，医生为她动了手术。在养病期间，她的枕下全是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她说：“现在我有时间学习理论了。”

也许有人会问：“珊辉是否年轻貌美呢？”

珊辉二十五岁了，她皮肤黝黑、脸庞宽大、颧骨突出。她那双黑黑的眸子闪着光芒，似乎能够洞察比午夜更为黑暗的中国。她的身材适中，象一个农民。要使它脱离土地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那么自然、那么坚定地植根于大地之中。她究竟美不美呢？对此我无需评说，我只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大地美吗？

六 矿工之家^①

今天，我再次访问了矿工游击队。我和三个矿工进行了交谈，他们曾经在广阳镇帮助八路军打过日本人。其中一个人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过去是冯玉祥将军队伍中的一名士兵，后来到河北省唐山市作了一名矿工。日本人人侵后，他失业了。后来他又在山西北部的大同煤矿找到了工作。这里条件很差，他工作一天只能挣两三毛钱，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由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他被捕了，被判处十二年徒刑，关进太原监狱。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被释放了。他被党组织派往石太线^②的阳泉组织矿工游击队。那里的矿山关闭了，但有二百名矿工留了下来。他把他们组织起来，和当地的铁路工人一起成立了一支武装游击队。他们破坏日本人的铁路运输，还帮助八路军破袭各地的铁路。从十一月二日起，他们在阳泉西南的广阳镇协助八路军作战，四日下午赢得了胜利。

游击队员们和家人在一起。立波^③和一位老母亲聊了起来。她六十一岁了，头发灰白，但身子还很结实。她告诉立波：她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本地的游击队员，另一个是义勇军战士。她曾对儿子们说“你们不要惦记我，要和敌人

① 本文摘自作者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的日记。——译者

② 原文误为郑太线。——译者

③ 即著名作家周立波同志，他当时陪同作者在矿区访问。

拼”。她现在和小儿子在一起，为他及全体游击队员缝衣做饭。她是全队的母亲。

从阳泉下来时，矿工们看见了许多中国青年的尸体。在许多地方，每个家庭都有亲人被日本人杀害。有时，日本人将一个村子里的全部青年人都杀光。日本人用绳索将这些青年人绑在一起，然后用军刀砍下他们的头颅。按照日本人的理论，活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是危险分子。矿工们说，过去许多人只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横冲直撞，可是现在他们吸取了血的教训，他们懂得了日本人的占领意味着什么，他们正在全力抗争。

如果缺乏使用语言的能力，与中国的矿工及其妻子、姐妹和女儿进行谈话是困难的。无论在哪个方面，各个国家的矿工看上去都很相似。他们的举止一模一样；他们的双手都伤痕累累且渗透了煤粉；他们意志坚定，待人严格而又十分友好；他们具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理智与精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同样的——虽然中国矿工遇到的问题要比美国矿工遇到的更艰巨、更繁重；他们都在向外界呼吁，说明自己生活条件的悲惨，说明自己正在为组织起来而斗争，说明自己身受的束缚和折磨。日本开始入侵后，中国的矿工都拿起了保家卫国的武器。他们具备其他国家的矿工都不曾具备的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有一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即八路军在帮助他们、训练他们、组织他们。

我们曾遇到过一队武装矿工护送下去后方的妇女。这些妇女大都是矿工们的妻女。象她们家里的男人一样，这些女人是坚强的。她们甚至比男人更坚强。她们稳稳地站在那里，头发散落在脸上。她们的双手有时搭在背后，

有时交叉在胸前。

离开矿山之后，我觉得自己仅仅是一个作家、一个旁观者。瞧着他们那粗大的让煤尘染黑了的双手，瞧着穿在他们的短袜或者光脚上的布鞋，瞧着他们满是泥土的衬衣，我知道自己没有机会去分担和了解他们的生活。我只是故事的叙述者，只是我不曾经历过的事件的记录者。在中国发生的真实的故事，只能由中国的工人和农民自己来讲。然而在今天，这还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陪同我访问矿工的人——虽然他们也是中国人——能写出中国人民斗争的真实故事。因为这些人是中国的文化人，象我一样远离民众的生活，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所谓“风格”。这一点，他们之中一个姓徐的作家表现得最为突出。

如果你和他谈起某一本书，他首先告诉你的就是这本书的“风格”，然后你才有可能向他询问该书的内容。立波倒确实对书的内容更感兴趣。只是他现在生活过得非常艰难，以致于经常病怏怏的，无法写出他的感受。不过我想，艰苦的生活会使他变得更坚强。至于我所写的东西，决不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本质，而仅仅是对它进行观察后的记录。

七 姐 弟 俩^①

从东固往东南的第九号公路上，走着一个农村姑娘和一个赤脚男孩。姑娘背着一个小小的蓝布包袱，男孩的左臂上挂着一个装满了鸡蛋的篮子。姑娘长得很漂亮，最多不过二十二岁。她穿着一件天蓝色上衣，衣服的领子齐着脖颈，衣服的下摆垂至臀部。一条肥大的黑裤子直到她那结实的脚踝。她未系头巾，浓密的黑发从宽阔而光滑的前额往后梳，在脖子后面挽成一个光滑的大发髻，一根用竹枝做成的长长的发针别住了它。竹针的一端被削成锥形，另一端则修得又宽又扁。

姑娘又黑又大的眼睛和她的全身，都蕴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温柔和沉静。也许，只有仔细地观察她，才能体会其中的原因。人们可以看出，在她体内正孕育着一个新的生命。这当然是爱情的结晶——只有他，才可能使这位青年妇女的脸上充满梦幻般的表情。

然而，同样清楚的是——这位青年妇女决不是一个成天耽于梦想，只会在心中和体内正在生长的小生命窃窃私语的女人。她的眼睛是机警而明智的。只要山道旁浓密的树丛中有一点儿声响，她马上就警惕地转过头去。她常常情不自禁地举起手，摸摸头上的发针，好象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一样。

① 原名《A White Episode》。——译者

只有三个人知道这发针的秘密。一个是她本人，一个是东固红军交通站的同志，第三个就是她年轻的农民丈夫钢梁——红军的一个中队长。他们知道，在竹针的空管中装有无色显形墨水和一支很小的毛笔。他们也知道她去吉安的原因，知道她的衣袋里带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她通过东固周围白军封锁线的“通行证”。信封上写着她的地址，信文读上去似乎是她“丈夫”——白区一家丝绸店的一个职员——写的，末尾处还注明了信从吉安发出的时间。信中写道：

“立即离开赤匪盘踞的地区，到你在碧潭的祖母那里去，然后再设法来吉安。你呆在赤化地区，我时刻担心你的生命和名誉会受到威胁。”

“你能完成任务吗？”她丈夫钢梁和交通站的同志问她。

“我不是已经工作过两年了吗？我不是已经从许多次危险中闯过来了吗？”她不无自豪地反问，“至于现在，即使遇到比以前更麻烦的情况，他们也不会把我怎么样。”

他们都明白她的意思。她现在就要作母亲了，这有利于掩护她的身份。

这位青年妇女在九号公路上走着，一边想着这些事情，一边和身边的男孩子谈话。她瞧了他一眼。他身材单薄，皮肤黝黑，光着脚走在她的身旁。他上衣的前襟敞开着，腰间扎着一根宽宽的布腰带，一条灰色的旧长裤挽到膝头。姑娘虽然并不确切知道，但她可以感觉到，男孩子的布腰带里肯定藏着一只小小的铅笔头和一卷柔软的竹纸。他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子，在清塘的红军学校学会了读和写，四个月来他到处奔波，以卖鸡蛋为掩护替红军收集情报。

他和她说话的时候总是扬起头来。这是一张瘦削而严

肃——有时甚至是庄严——的面孔。他的颧骨很高，但下颌的线条是柔和的，显得十分孩子气。他的眼睛细细的，但却非常明亮，透着一股聪明劲。

“你从不害怕吧？弟弟。”姑娘问他。

“害怕？当然不。一次他们在离清塘不远的地方抓住了我，打我。我说我是一个孤儿，红军毁了我的家，杀了我的父母。我孤身一人，没有一个铜板，也没有吃的，只好出来卖鸡蛋，挣几个吃饭钱。我的鸡蛋价是贵了点，可我太穷了……‘兄弟们，买我几个鸡蛋吧！’我这样冲他们说。

“他们终于相信了我的话，还买走了鸡蛋。当时我刚到红军学校，什么武器也不认识。可我能记住白军各部队军旗的区别和一些枪的式样，我还记下了他们的哨位和驻地……。现在，我已经认得许多字了，可以将我看到而又可能忘记的东西记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还会懂得更多……。我以后要象毛同志那样——你知道，他总是那么不声不响可又十分机警，心中时刻都在思索着、计划着。”

男孩庄重地说着，瞧了姑娘一眼。他俩的眼光相撞了——明亮而热情。

“你害怕吗？”男孩子问姑娘。

“有时候害怕。比如遇见军官的时候，遇见老兵油子的时候——他们都是畜牲！”

“可是我们将继续战斗，消灭他们。”

“对。我们将继续战斗，消灭他们！”

突然，男孩子停住了脚步，说：“现在，我要绕过这座峭壁往北去了。再见吧，姐姐同志。”

“再见，弟弟。”她答道。她站在那里目送着他，直到他

走上羊肠小道，消失在浓密的灌木丛中。然后，她一个人继续向前走。

她能够看见远处来福村那低矮的屋顶和架在河上的木吊桥了。她知道，这个村庄已经没有人家了，农民们或者住在山里，或者去了东固，河谷里只有白军守卫着这座吊桥。

当她走近吊桥时，显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桥上，十几个士兵注视着她。两个哨兵握着枪，其中一个戴了三只金戒指。其他人没带武器，正蹲在地上摇铜板。当她走过来时，他们都站起来了。他们都是老兵油子，脸上一副老于世故的神气。一见他们，她的心似乎就要停止跳动了。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一个哨兵粗声粗气地喝问。

“我叫兰英。我是从东固逃出来的，准备到吉安我丈夫那里去。我丈夫害怕赤匪。这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她将一只封面上印着红框框的长信封递给哨兵。一个哨兵接了过去，但是没有看。另一个哨兵挤过来，取过信封，放在手上颠来倒去，然后取出信，装模作样地阅读起来——虽然他们根本就读不下来。

“山里有赤匪吗？”一个哨兵问道。

“我不知道。也许有，所以我丈夫才叫我去吉安。”

一个士兵装出一副正在读信的样子，其他士兵则咧嘴大笑起来。前者开始读出一些淫秽的词句，而且越读越下流。姑娘的脸烧得通红，她用手掩住面孔。

“这不是我的信！”她叫道，“把我的信还给我。”

一个士兵走过来抓住她的手臂，她挣开了。

“你的裤带为什么这样紧？”他一边问，一边伸出手臂

搂住她，在她的唇上猛地吻了一下。其他士兵吼了起来。兰英挣脱出身子，朝这个士兵脸上猛抽了一记耳光。

“你得让我们相信你以前不是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士兵怒气冲冲地宣称。

“跟我来吧，”一个哨兵说着，冲她咧嘴一笑，“我可以在岗亭里读读这封信。”他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朝通道后面的一座小岗亭拖去。她极力反抗。其他士兵跟在后面哄笑着，又有一个士兵伸出手来拖她。

岗亭里，士兵们争执着谁应该先占有她。在极度恐惧之中，她看见他们开始扔钱币定先后，她觉得自己的喉头阵阵发紧，嘴唇就象羊皮纸一样干燥。

她开始与一个朝她逼来的上兵搏斗。后者把她的衣服从身上撕下来，将她剥得赤条条的，其他士兵站在旁边放声哄笑。她奋力反抗着。可匪兵抓住她的手臂，狠劲一下扭到了背后。她的手臂及全身一阵剧痛，接着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了。朦胧中，她觉得有人扯散了她的发髻，她立即本能地抓住那支重要的竹发针。接着，黑暗完全笼罩了她，她昏迷过去了。

匪兵们轮奸了她。她四肢分开躺在岗亭干燥的地面上，头发乱成一团，上面全是泥土。她的一只手臂被扭断了，嘴唇周围全是鲜血。

一个匪兵死死地盯着她那赤裸的身子和惨白的面孔，他的眼光落在她那隆起的腹部上。她体内的胎儿正在蠕动，似乎在强烈抗议匪兵们的暴行。接着，胎儿的蠕动停止了，就象死了一样。

一个哨兵走过来，踢踢她的身子，看她是否还活着。接着另一个匪兵过来，取乐似地踢着她的肋骨。但她躺在

那里，一动也不动，血在她的嘴唇边凝住了。

“不能让这具尸体摆在这儿。”一个匪兵说。

他们捡起她那被撕碎了的衣服，胡乱地绑在她的身上；然后又漫不经心地抓起竹发针，插在碎布条的接头上。接着，一个匪兵抱着她走到河岸边，将她扔进河水中。她的身体在河中溅起很高的水花，然后缓缓地朝下游漂去。有两次，尸体浮上了水面，长长的黑发漂在水中。

匪兵们站在桥上弯腰注视着。当尸体在水中消失之后，他们便转身走开了。哨兵又回到了桥头的哨位；其余的匪兵又一屁股蹲在地下，继续摇铜板。

弟弟在北去的山道上出现了。他开始沿着一座小山脚下的小道前进，刚刚走了几步，小山上传来了一声喝令：

“站住！”

他抬头望去，只见一个白匪军官和五个士兵正向他走来。

“你是干什么的？”军官用冷酷的声音逼问。

“我的小名叫来雨。我要去乡铺的集市上卖鸡蛋。”

“你是从东固下来的吗？”

“我去东固买鸡蛋，那里有很多鸡蛋。”

“东固有多少红军？”

“我不知道，我不是找红军的。”

“跟我来，你这个说谎的小赤匪！这个星期你是第二次从东固下来了。”

孩子被匪兵们围在中间。他镇静地走着，头扬得高高的，黑黑的眼睛闪着机警和无所畏惧的光。白匪正押着他往只有白军而无一村民的来福村走去。他们走过肮脏的街

道，穿过一扇大门，跨进一个铺着石子地面的院子——许多匪兵正坐在院里的石凳上。他们进了一间屋子。

刚进来的白匪军官和其他几个正在抽烟的军官交谈起来。四个军官正坐在靠窗口的小方桌旁打麻将，肘旁放着一小堆银元。

两个白匪军官开始审问来雨了。正在打麻将的军官们一边听一边抽着烟，烟头扔得满地都是。来雨重复了自己刚才说过的话，并且声明：“我根本不知道东固红军的任何事情。”

“没有赤匪的准许，你怎能在东固出出进进呢？”一个军官暴怒地喝问着，走过去，将孩子手臂上挽着的鸡蛋篮一把夺了过来。

“我只是个买鸡蛋的。”他回答。

一个士兵走过来搜查他。孩子的腰带被解开了，一节小小的铅笔头和一卷薄薄的竹纸露了出来。

白匪军官脸色发青。“你这个赤匪的探子！”他走过来，向着孩子的脸部狠狠地打去。来雨摇晃着稳住身子，直直地站着，一声也不吭。院里的匪兵都挤过来站在门口看热闹。

“毙了这个造反的龟孙子。”坐在麻将桌边的一个白匪军官说道，他的口气就象将一块麻将牌扔上桌面那么漫不经心。

来雨扫视着四周敌人的面孔，他看到了挤在门口的士兵。他想，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当他们知道人民为什么斗争的时候，就会逃到红军那里去的。

他转身朝军官们喝道：

“你们才是土匪呢！你们是人民的敌人。你们杀害了我

们的父老兄弟，烧毁了我们的房屋和庄稼。你们是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住嘴！”一个军官一拳打在他的牙齿上，打断了他的话。来雨只觉得两眼发黑，什么也看不见，一股又热又咸的东西流满了口腔。他伸手去摸，手上沾满了鲜血。他听见白匪军官下达了命令，然后有人抓住他的手臂，他再一次被押上了那条肮脏的街道。突然，他发现自己正站在村墙外一个小小的坟堆上，他面前是一个班的匪兵，他们的枪口正对着他的胸膛。从他们的头顶上，他看到东固绿色的山峰。工农红军就在那里，他的父亲——一个红军指挥员——就在那里。

“红军万岁！”他用尖尖的童音高呼着口号。

枪响了，这个瘦弱的褐色的躯体急剧地颤抖着，倒在地上，好象永远永远地睡着了。鲜血在他的身下流淌，渗入干涸的坟地。

士兵们都立正站着。一个士兵一转头，正好与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的目光相遇，他们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恍恍惚惚的表情。还有一个士兵死死地盯着孩子的尸体，只觉得喉咙一阵阵发紧，好象被吓呆了。

士兵们又回到那个院子里。队伍解散了，他们坐在石凳上，回避着其他人的目光，盯着脚下的石板出神。过了很久，一个士兵低声问道：

“你们听见他喊什么了吗？”

“听见了——他们都这样。”

“他不怕死。”

“不怕死，他们都不怕死。”

其他士兵都屏住呼吸，默默地听着。

“为什么红军都不怕死呢？甚至连他们的孩子也这是样。”

“因为——因为——哦，你也听见他喊了些什么。他说我们是罪犯，是地主和帝国主义的走狗。”

一个白匪军官听到了士兵们的低声议论。他走到门口，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薄薄的嘴唇现出凌厉的线条。说话的士兵站了起来，示威似地提了提裤子，转身走出了院子。另一个士兵忙起身跟着他往外走，好象这是一种迫切的生理需要。军官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离去，然后扫了一眼其余的士兵，怒气冲冲地走进屋子。

窗旁，四个军官还在打麻将。一小堆银元摆在他们的肘边。他们抽着香烟，烟头扔得满地都是。

八 蒋介石夫人与萧红

蒋介石夫人进城治疗背部的一处旧伤时，我首次在她的姐姐孔祥熙夫人的家里见到了她。在此之前，几个外国人曾经设法在蒋夫人和我之间安排了一次会晤，可我一直不乐意接受她的随从事先已经安排好的“夹道鞭打”。有一次，在她的随从们不在场的情况下，我和她见了面。我发现，她很有教养、情趣高雅，而且聪明过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性。她打扮得优雅大方。这是需要花很多钱的，只有富有的中国妇女才能这样修饰自己。我觉得，她的精神有点忧郁。她是一个精明、完美而自信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的另一个姐姐孙中山夫人变老了，也不如以前漂亮了；而蒋夫人却愈来愈自信，愈来愈有权势。

住在香港的埃米莉·汉恩刚刚写完一本书，专门介绍宋氏三姐妹。当然，应该有这样一本书宣传她们。然而与某些外国人的看法相矛盾的是，她们并非绝无仅有的有才干的中国妇女。我认为，只对她们进行公开宣传是不恰当的。我常常想，如果宋氏家族也象绝大多数正在战火中受煎熬的中国人那样，出生于愚昧、贫穷的环境之中的话，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起那些在军队和人民中服务的中国妇女，她们有的是医生、护士，有的做政治工作或教育工作。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她们仍然坚持工作，她们的力量和才干与日俱增。我也想起那样一些人，她们青春的花朵在战火中凋谢了，她们在默默无闻的岗位上献出了自己

的生命。

一种新型的中国女性，正在许多方面远远地超过美国女性。她们正在战争这一残忍的铁砧上经受锤炼。一位这样的妇女曾和我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她的名字叫萧红，她的命运十分典型。一九三一年，当日本人首次侵略满洲时，她从那里逃了出来。她不仅逃出了日本人的手心，而且逃出了富有的双亲的手心——她的父母打算将她嫁给一个由他们选定的男人。她每每赶在日军攻势之前，先在北京然后在上海、汉口和重庆生活过一段时间。正是鲁迅，将她的第一本小说《生死场》介绍给了中国民众。鲁迅说，这本书是中国妇女所写的最有影响的现代小说之一。在这以后，这个姑娘又出版了三本书，包括她住在我这里时^①完成的一本战争题材的小说。象大多数中国现代女作家一样，她生活在贫困之中。她们挣的钱只能使她们的生活维持在苦力阶级的经济水平。于是，萧红象她的许多同事一样患了结核病。我送她进了奎因·玛丽医院。在香港陷落之前，我一直负担她的所有费用。日本人占领香港之后没过几天，她就去世了。她当时只有二十八岁。

日本人已经懂得了应该如何对付中国人。他们在香港狂欢一番之后，便开始玩弄政治手腕。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好象他们正在把中国人民从白人帝国主义者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因此，当萧红的丈夫^②要求将她的尸体火化，并将骨灰带回上海，安葬在她的导师鲁迅的墓旁时，日本人竟然同意了。日本人的策略在某些方面相当高明，

①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二年，史沫特莱居香港。其间，萧红曾在史沫特莱处生活，直至逝世。——译者

② 萧红的丈夫萧军，是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作者注

这就极大地削弱了英国政策在香港的影响，以致许多在香港的中国人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生活而不愿返回中国大陆。

九 我的中国儿子

当我首次到达新四军挺进支队^①时，一个小鬼被指派来充当我的服务员。和我一块来的一个女记者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这是游击队的惯例了，我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个应该解决的老问题——不仅有一个孩子在为我服务，而且有一批孩子在流血牺牲。

在人民革命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都有孩子们参与。他们参加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参加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当十年内战于一九二七年在中國爆发的时候，正在发展中的红军就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成千上万的少年加入了红军的队伍，有的甚至是全家男女老幼都和战士们一起战斗。

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新四军中。在这里，孩子们做一些轻松的工作。例如，每天早晨打开水，给军官或政治领导人打扫房间、送信，等等。每天，他们用很多时间读书、写字或学习其他功课。一般来说，这些孩子分为卫兵和战士两种。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战场上的指挥员。他们将一种全新的力量带入了中国社会。这种力量在战争环境中增长，牢实地植根于自觉的革命意识之中。

孩子参战这在许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令人痛心的现象，然而我看不出这些孩子还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军旅

^① 即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一九三九年六月成立，同年十一月改称挺进支队，司令员为李先念同志。——译者

生涯对于孩子们来说的确太残酷了，但是他们在工厂或者小作坊的命运比这还要悲惨得多。除了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以外，在席卷全中国的凄风惨雨中，孩子们是首当其冲的受难者。

我曾多次听在中国的外国人说，游击队的小鬼是军官们出自同性恋的目的弄到军队里来的。这在一些有病态心理的人们中广为流传。也许我这个人太天真了，以致受骗上当。然而，军队中却没有几件事情能够瞒得住人们的眼睛。军人是在一起生活的。事实上，军队生活就象是一只摆在围观者中间的巨大的金鱼盆，完全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这里绝对不存在任何一桩士兵们不会加以议论的事情。战争使他们说话非常直率，即使这一个人向你撒了谎，那一个人也会来告诉你真情的。

指派给我的小鬼是游击队的所有小鬼中的一个典型。他名叫沈国华。虽然他说自己有十一岁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可他看上去要年幼得多。他以中国孩子那种令人惊奇的聪明告诉我：他之所以看上去这么小，是因为他从前是一个小要饭的。那时他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还常常生病。他解释道，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他还很小。土匪袭击了他在河南的家，烧了他家的房子，杀了他的父亲，伤了他的母亲。他的两个哥哥“当兵吃粮”去了。这场灾难之后，他只好以要饭为生，养活自己和自己的母亲。

他不记得自己当时几岁了。他母亲叫他端一只碗，站在有钱人家的门口。于是，他趑趄趑趄地走到一座大房子前面，站了整整一天。他既不知道怎样哭泣哀求，也不知道应该用泥块砸自己的头，所以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只

是在那天天快黑的时候，一个从大房子里出来的男人发现了他，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家。国华告诉他，他们家的房子已经被火烧了，他父亲被人杀死了，他母亲受了伤，他是出来要饭的。这个男人给了他几个铜板，让他走了。

下雪了，北风怒号。女记者和我们的两个小勤务兵常常整天整天地呆在我的房间里，因为我能为他们提供炭火。在游击队里，这种人是不会多的。象游击队的每个战士一样，这两个孩子身上也有虱子。一天，我决定消灭它们。我的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一只小木盆。当两个孩子在小木盆里洗澡时，我将火钳放在煤火里烧得通红，然后用它去烫他们那用水淋过的军服的内缝。国华洗完澡之后，天真地走过来，站在桌边瞧着我，谈起了他参加游击队以前的生活。

“老百姓冬天都生虱子。”他说，“当我讨饭的时候，当我为大地主干活的时候，也生虱子。如果你身上只有几只虱子，你就不得不整天捉它们。可如果身上虱子多了，也就不觉得痒了。不过这样一来，你就会得一种永远也好不了的头疼病。昨天，又有一个战士因为这种病死去了。断气的时候，许许多多的虱子从他的身上爬出来，直往稻草里面钻。”

医疗措施的极度缺乏，国华完全不以为然。他说：他还是一个小乞丐的时候就常常生病。每当这时，他总是随便找个地方躺下，直到感觉好些了。有时，人们把狗放出来咬他。一只狗曾经咬伤了他的腿，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痕。

“我怕狗。”他说，“我最怕狗追我。”他的左颊有一块伤疤，不过这是土匪烧他家时留下的。

因为没有时间概念，国华不知道自己当了多久乞丐。

他曾经看着有钱人家的小孩去上学。他也想上学，可没有钱。他在泥地上照着废报纸比比划划，学会了书写一、二、三等简单的数字。但是“四”以后的数字就很难写了。他请人家教他写自己的名字，可他们都笑话他，说一个小乞丐没有必要学会写字。只是参加了游击队之后，他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他六岁的时候，母亲请一个小地主为他作保，让他替一个大地主放牛。他劳动一年，除了食宿及偶尔一两件地主儿子穿过的旧衣裤以外，这个地主给他的报酬仅仅八毛钱。每年正月他领到这八毛钱回家，总是交给母亲。而母亲总是用这笔钱买布做鞋，让他穿着度过寒冬。

我替国华烫死虱子之后，他穿上干干净净的军装对我说：“你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

我将他拉到怀里，替他扣好衣扣，梳好头发。我这样做使他有点尴尬，因为还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对待过他。他是来照料我的，没想到我会照料他。

军队对于国华来说就意味着一切，军队就是他的耶稣基督。军队告诉他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绝对地信任。他解释道，他在军队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到现在才一年，因此他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学过。听着他的谈话，看着他那忧郁的小脸蛋，女记者低声朝我叫道：“这是怎样的经历呀！”

国华说话的时候，外面的风渐渐小了。他走到窗前，透过窗户纸上的小孔向外看去。然后，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暴风雪持续不了多久了。他为地主干活的时候曾多次观察过暴风雪。他知道，每当这种时候，暴风雪就快要住了。

我们问他是怎样参加游击队的。他说，他曾经到过平

汉线上的确山。当时，一支军队正打确山通过。突然，他看见自己的一个哥哥在士兵的行列中。不过，这是他的“坏哥哥”。他的“好哥哥”在引发战争的马可·波罗桥战役^①中牺牲了。他的“坏哥哥”和他说了几句话，可没有给他或他们的母亲一个钱。他指责国华是一个傻瓜，因为他干一年活才挣八毛钱。他劝他另找一个挣钱多的活干。

从士兵们那里，国华听说了八路军。士兵们都说这是一支好队伍，是穷人的队伍。在八路军里，军官不打骂士兵，每一个人都要学文化，还有俱乐部、歌咏队，等等。国华问他们，八路军在什么地方？他想去找它。因为他是穷人，愿意参加这支穷人的队伍。士兵们都笑了，告诉他，八路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于是，他跑到街上去问警察。可警察说八路军是土匪的队伍，他动摇了。

不久以后，他碰上一个穿着破军装的长胡子老兵，便向他问起这个问题。这个自称王老汉的老兵说：国华人太小，不能当兵。而且八路军在北方，离这里有几个月的路程。老王又说，他本人就是从一支穷人的队伍里来的，这支队伍就在附近，这就是挺进支队。听说国华要参加游击队，老人笑了。“你知道吗？”老人说，“游击队生活很苦，缺吃少穿，整天行军打仗，有时连一个铜子儿也得不到。”

整整一天，国华一直跟在王老汉后面，并且还不断地为自己解释：只是因为吃不饱饭和经常生病，他才长得这么矮小；他并不想发财；他可以走很长的路，可以背很重的东西……在这里，地主的狗腿子老是打他，叫他替他们干很多活；没有人教他写自己的名字……

^① 此处所谓“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当指卢沟桥；所谓“马可·波罗桥战役”，即卢沟桥事变。——译者

整整一天，王老汉的耳朵终于让国华磨软了。他对国华说：“你可以和我一块儿走，去过游击队的生活。”国华跟着王老汉翻越了一座座大山。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一个勤务员。

女记者常常和两个孩子坐在一起，帮助他们学文化。每个孩子都有一本由游击队自己编写和出版的初级教材。课文一开始总是教“男人”或“女人”这几个字，接着是“工人”、“农民”、“士兵”，然后是自己军队的名称、日本军队的名称，以后就讲遣词造句了。每页课文的下方都有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例如：

农民种的粮，工人织的布。为什么农民吃不上自己的粮，工人穿不上自己的布？

为什么富人和穷人，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

为什么现在富人和穷人都反对日本人？

什么东西妨碍人类互相信任？

为什么日本军队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军队？

……

我觉得，对于八路军和新四军来说，这些问题可以说明反抗与斗争的重要意义。

国华不止一次对我说：“等我长大了，我要去当骑兵，杀日本鬼子。”每次听他说这话，我都禁不住想到虱子和伤寒。我想，不知他能不能活下去，长大成人，领着穷人斗争。

不久，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机会——和一个排的战士一起，去一个驻扎在汉口以北湖区的作战部队。女记者决定和我一块去。我们都觉得，带我们的小鬼一块去太危险。可是，一想到要将他们留下，不时地折磨他们的虱子及回

归热病的阴影，就在我脑海中出现了。当我把自己要走的消息告诉国华时，他好不容易才没有哭出来。我受不了了，便写了一张条子给游击队的指挥员，请他们答应这个孩子和我一起去。国华拿起这张字条，象闪电一样奔出了房门。可后来我听游击队的指挥员说，国华并没有将这封信交给他。国华走进指挥员的房间，敬礼之后说：外国同志希望他和她一起去作战部队。指挥员大吃一惊，可孩子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争辩说，他常常整夜整夜地和部队一起行军，还背着很重的东西。不仅如此，他还说，外国同志需要他，因为只有他才知道外国同志的一切习惯和需要。

指挥员回答说，如果外国同志真的需要他的帮助，他当然可以同去。孩子要求指挥员把自己的允诺写下来，然后便拿着这张批准书，飞快地跑回了我的住所。我很惊讶，但又觉得，对于可能发生的事情，军队是不会不了解的。

就这样，我带着国华一起踏上了去湖区的路。外出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在离公路约五英里远的一个村子里停下了。我们计划于午夜时分在此处通过公路。一队尚无武器的志愿参军人员，在村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还有许多带着背包的旅行者也在这里等着我们。因为日本人常用这条公路往太行山前线运送援兵，所以他们在公路沿线的所有大村庄都驻有军队。

夜深了，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排队出发了。许多农民赶来送别自己志愿参军的亲人。我记得，一位老大娘站在一个小土包上，泪水不断地从她眼里流出来。一位怀抱孩子的青年妇女跟在一个男子身边，一边跑一边大声说：“只要有会机，就回家来看看。”走到村外，我们又听见一座房子里传出一个妇女刚强的声音。她叫着一个青年的名字，

朝我们跑过来。我们正在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可她却赶上了我们，跑进了队伍。她逐个地审视着男人的面孔。我们得知，她的儿子早已跑出去参加游击队了，她想找到他的行踪。但是，我们的行军队伍里没有一个人回应她的呼唤。我们离开她很远了，还听见她的哭声在夜空中回荡。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走到一个村子的围墙外面，准备从这里穿过公路。正在这时，队伍突然在行进中停住了脚步——就在我们前方约一百码处，十来个背着步枪的日本兵正在一座房子前面围着一堆篝火站着。只见几个日本兵从屋里走出来，将手中的桌椅扔进火中，然后站在一边，十分惬意地烤着火。

我们退到村子围墙的后面。游击队的领导人聚在一起低声商量对策，女记者和我也参加了。他们打算消灭日本人，我和女记者表示反对。我们争辩道，这里距离一处日军驻地只有一英里，他们会赶来从背后袭击我们的。我们还指出，我们既不知道前面那座房子里还有多少日本人，也不知道这些日本人拥有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而我们自己，只有二十五支步枪、一挺机关枪，而且机关枪仅有两打子弹。

最后，我们说服他们做一个小迂回，在距这里几百码远处穿越公路。女记者和我都骑在自己的马上。正当我们接近公路的时候，传来了正在向我们驶来的汽车的吼声。立刻，一声急促而低沉的命令传遍了整个行军行列：“全体跑步穿越公路，非武装人员进入小山隐蔽。”我看见国华小小的身影在我前头箭一般地穿过了公路。在黑暗和慌乱之中，我骑的马冲到一座破败不堪的矮桥旁边，蜷缩着身子跳着脚。我们站在路上，人们正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冲过来。我的马夫抓住马缰，朝庄稼地里飞跑。在我前头

是三个身穿长袍的新志愿兵，我还很少见到有人跑得象他们那么快。我的马夫一边奔跑，一边紧张地低声叫着：“快踢马！快踢马！敌人来了。”

我们在黑暗中跳过一道土堤，穿过一片农田之后，我们身后开火了。子弹嗖嗖地射向星空，手榴弹爆炸了，机关枪不停地哒哒响。我们听见敌人卡车的引擎嘎地一声停住。但不久，卡车又吼叫着顺着公路远去。

“别跑了！”我朝人们叫着，“敌人不会来了，再跑我们会迷路的。”

“快踢马！”我的马夫在我后面气喘吁吁地叫着，还在往前跑。我开始有这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象一个懦夫。我们抛弃了自己的队伍。而在我们这群人里，我是唯一一个带着小手枪的人。我从马上跳下来，和胆战心惊的马夫争执开了。

“我们必须回去！我们必须找到自己的队伍！”我叫着。

透过他那艰难的呼吸声，我听见子弹还在唱着奇特的歌。

“鬼子！鬼子！”他喘着气说，可不再和我争了。我拉起他的手，我们将马牵到一个有钱人家的高高隆起的旧坟后面。这时，已经有两个志愿当兵的人失踪了。

战斗已经结束了，四周死一般寂静。空中没有月亮，只有几点微弱的星光。我的马开始吃起我们脚下的青草了。剩下的一个志愿入伍者低声道：“你的马是白色的，敌人会看见它。它在吃草，敌人听得见嚼草声。”他嘟囔着，转过身去，在黑暗中消失了。

此刻，我的马夫倒很镇静，他低声道：“现在怎么办？”

“等待。”我回答。我将他留在坟包后面，自己爬上坟

顶，卧倒在地，在黑暗之中观察动静。四野一片寂静，路边逶迤的小山在黑暗中隐约可见。我竖起耳朵捕捉人声，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我走下坟来，说：“我要给游击队发信号。”

“不行！不行！”马夫叫着，“鬼子会知道的。”

“我必须发信号。”我不顾一切地说。我再次爬上坟顶，躺下来，举起双手，轻轻拍击。但是，毫无反应。我又试了一次——这次击掌的声音响了一点，身后便传来了马夫的抗议声——但仍然毫无反应。我再次击掌，声音又大了些。于是，远处传来了小心翼翼的回应声。我又试了一次，又得到了对方的回应。我一只手拉着马夫，一只手拖着马缰，朝回应我掌声的方向走去。马夫一路上说个不停，“这也许是敌人！”我们一边向前运动，一边谨慎地不时发出信号。回答的掌声越来越近了。我们停住脚步，退到马后。我拔出自已的手枪，打开保险，等待着。

黑暗中，在我们前面出现了三个黑影。“口令！”他们尖声喝问，步枪直对着我们。

“笨蛋！是我们。”我的马夫狂喜地叫着，朝他们跑过去，搂住了他们的脖子。

三个游击队员将步枪往肩上一甩，大声笑着，猛拍了我几掌——几乎将我打倒在地！

“我们找到他们了！我们找到他们了！”他们挥舞着双手叫着。我们从一大片庄稼地里走过，他们中的一个人欢快地吹着轻柔的口哨。突然，他大笑着说：“啊哈！我们的手榴弹正巧落在卡车上，炸得鬼子人仰马翻。”他又朝另一个人说：“你听着，记住——卡车跑的时候，你不要对着它扔手榴弹，要扔在它前边。我以前不知道，结果让头一辆卡

车溜了。”

“他妈的！”另一个游击队员诅咒道，“我们只有一挺机关枪，可它偏偏又卡壳了。它要晚点儿出毛病就好了。”

诅咒着机关枪，说着粗话，我们终于到达了离公路三英里远的一个集市。日本人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但是没有驻扎军队。傀儡政府中全部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个政府的全体人员都出来欢迎我们，它的首脑站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兴奋地说个不停。

当我们走进村子时，我惊奇地看见，国华象一个迷路的孩子一样站在路旁。他一看见我便跑过来，用两只小手攀住我的双臂。他默无声地站着，两眼盯着我的面孔。当“跑步穿越公路”的命令下达时，他和女记者及一个青年诗人——这个诗人名叫罗凡，后来成了我的助手——一起跑开了。但是，一知道我失踪的消息，他便在黑暗中到处乱跑乱叫，四处打听我是否让日本人捉住了。女记者拉着他的手，叫他镇静。可他说，他一定要去找外国同志，因为外国同志只会回答他本人的呼唤而不会答理任何别的人。当人们对他说他还是一个孩子，会迷路时，他停止了叫喊，瞧着四面的小山和树林，答道：“我要去找她，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回来的。她到我们部队来时首长就叫我为她服务，告诉我必须好好照料她。”

浓雾从湖区飘然而来，朝汉口北面及西北面蔓延而去，大地白茫茫的一片。黎明时分，我们开始穿越浓雾区。我们从一个个村子穿过，这些村庄都空无一人。村民们以为我们是穿着中国军服的日本人，因此都跑光了。当曙光初照、浓雾消散的时候，我们进入了湖边的一个集市。集市上只留下了三四个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他居民

全都划船到远远的湖心去了。一位老大娘提着一面大铜锣，一边敲一边大声朝湖里的人们叫喊：“回来吧！回来吧！”

居民们都回来了，他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我们周围。当他们看见我时，他们的高兴劲儿达到了顶峰。他们成群地挤在我身边，我听见男人们正试图判定我的性别和国籍。一位妇女害怕地把自己的小孩拉回身边，说：“她长着一双猫眼睛。”

我的小国华忍无可忍了。他站到他们面前大声叫道：“她长的不是猫眼睛！她是女人，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帮助我们的伤员。她在丁家桥发现了一位伤员，就给他喂饭，替他洗澡，帮他做一切事情。”

人们将目光转向我，惊呆了。我的“儿子”还不肯住口。“看看她手上的绷带吧，”他叫着，举起我的伤手，“这是烫伤的！当时她正端着一锅热水替一个负伤的战士洗澡。她是我的父亲，也是我的母亲！如果你们谁有病，她也会照顾你们的。”

当我决定离开挺进支队的时候，伤寒病和回归热病的阴影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决定将国华收为养子——如果游击队和他本人不反对的话。当然，我内心也有矛盾，因为事实上象国华这样的孩子多得数不胜数。不过我已经得知，在中国西部，一位研究儿童教育的美国教授建立了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重点是自然科学。这里的生活是严格的，孩子们要完成自己的一切工作。但相对来说，在这里花不多一点钱孩子们便可以吃得好，穿得暖。我问过多次，由一个外国人带大一个中国孩子是否合

适——也许，这样会使他脱离自己的人民吧？然而，每当我想到自己有可能将国华送到国外学习科学知识时，我便禁不住让自己的思想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但是，我自己的生活还不安全、不稳定，我有采取这一行动的胆量吗？不过，我还是要试试。

于是，我去找挺进支队的司令员李先念。当时，许多人正坐在那里和他谈着我想收养国华的事情。李先念过去是一个木匠，后来成为一位红军指挥员。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人民，生活都是艰苦的。在他看来，个人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当他问我为什么要收国华为养子时，我试图从“科学”的角度向他说明理由。我说，这孩子头脑很灵活，适于从事科学工作。我叙述了他对虱子和暴风雪的观察，并且说他还可以根据夜空的星星判断方向。李先念说：“好吧，如果您希望如此，而且孩子本人也同意，您可以收他为养子。”

这时，一个倚着门框站着的身材高大的小伙子说：他能象国华一样做每一件事情。而且他觉得，有关虱子的事他知道的肯定要比国华多。他问：“为什么您不将我也收为养子呢？”李先念淡淡一笑，补充道：“将所有这些小鬼都收为养子，对您来说倒是一个好主意。”谈话变得有点不顺利了。

无论如何，这件事在国华看来是很严肃的。他向我询问了中国西部那所学校的情况，说他害怕那些有钱的孩子。他解释说，他是新四军的人。我争辩道：“你可以到学校呆一个时期，然后再回部队，把你学到的知识教给其他人。军队也需要教员。”他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请求我让他和其他勤务员谈谈这件事情。第二天，他和另一个勤务

员一起来了，并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我。

“我们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留在前线。”他说，“等到胜利之后，您再收我作您的养子吧。”

我不可能动摇他的决心。

在离开湖区之前，我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加入了挺进支队的儿童剧团。这个剧团是由一个青年女教师负责，为士兵和民众服务的。这里半天学习，半天写作和排演爱国戏剧、歌曲及民间舞蹈。

当小船载着我驶离湖岸时，我久久地看着国华。他和两个孩子站在湖岸上，湖水打湿了他们的衣服。他朝我喊着，挥舞着双手。然后，他默默无言，一动不动地站着，站着，直到我的小船消失在茫茫水雾之中……

十 贵清、梁香和木子 小姐的故事

当我在北京给我的教授朋友讲完贵清的故事以后，他宣称，作为中国人，他并不认为这个故事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是今天我国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中的典型。”他说，“贵清是被爱情断送的。对他来说，他个人的感情就是他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当然，知识分子除了感情也就没有别的了。甚至革命事业，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也只是一种感情；而不是象对民众那样，是一种生死攸关的需要。贵清没有想方设法自杀我感到很奇怪。——也许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做的足够勇气。”

是的，教授说的是对的。我还记得发生于满洲和华北地区的那些自杀事件——男孩子和女孩子以身殉情。在沈阳，一个为父母所迫不得不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结婚的姑娘跳了江。一周之后，在北京，一个男学生因同样的理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乎每天都有青年男女因爱情受挫而自杀。他们太软弱了，不敢公开与他们的封建旧家庭作斗争；他们太糊涂了，不敢公开向束缚他们的囚笼宣战。于是，他们只能以死亡来结束自己所受的痛苦。

然而，贵清与别人不同，他没有自杀。他被爱情断送了。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贵清十八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就设法为他娶了一个乡村姑娘。贵清是在河南长大的，先后在一家私塾和小城里的一所旧式学校受过教育，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作孩子的违反父母的意愿拒绝成亲。小梁香（即父母为他选择的那个姑娘）也是一样。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玩过游戏。那时他们觉得，姑娘结婚以后就应该去丈夫的父母家生活，象奴仆一样地服侍他们，只是出于命运而不是出于权利，幸福才会来分担她肩上的重担。

贵清和小梁香成亲三个月之后，贵清的父亲便要送贵清去东京留学。他认为，商业教育会使他的儿子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出色的大商人。贵清的父亲鼻子长得挺长，人们都说这在男人意味着发财致富。他的岳父母当年选他作女婿时，这鼻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成为富翁。甚至二十年过去了，他所拥有的财产还只是与他家住宅相连的一个乡村小铺以及城里一家铺子的一部分股份。经常进城使他接受了许多“高超”的思想。他希望自己有一个才华横溢的聪明儿子，让他接受新式教育，将来在自己的故乡成就一番事业。他怀着这一愿望，买了一个歌女作填房。如果发了财，他还会买许多个，而且个个都要年青漂亮。他要把贵清送到东京去，让儿子去实现他本人未能实现的宏伟目标。

但是，贵清更象他那温良的小个子母亲，他并不想去学做生意。要他去东京，他的心情是沉重的。小梁香的心也同样沉重。她现在已经是他家的媳妇了，家务劳动的负担落在她的肩上。她做梦也没有想过，作媳妇会这样辛苦。

她很苦恼，因为作为晚辈，她每天必须向七姑八姨、祖父祖母请安，因而她每天都要忍受长辈们吵吵嚷嚷的指手划脚和吹毛求疵。她的公婆都是旧式家长，她得忠实地服侍他们。甚至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她也不能坐下，而只能站着等他们吃完。有时，贵清的父亲到城里和他的男朋友女友聚会作乐，深夜才回家，小梁香还得从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他吃饭时，小梁香还得静静地站在一旁侍候。夜里，她常常紧紧地躺在贵清身边，哭得喘不过气来。终于，贵清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忍受这一切了。

贵清发现，他父亲在小铺里装饼干盒时，下面放的总是细碎发霉的饼干，上面盖的却是一层又大又圆又新鲜的好饼干。农民们都很朴实，不回到家里，他们是察觉不到这之间的区别的。这天，贵清去找父亲。他恭敬地说，由于活儿太重、营养不良和待遇的不公正，梁香近来瘦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他请求父亲以后不要这样待她了。可他父亲唯一的反应就是怒气冲冲地转过身去，一字未吐便离开小铺，一个人扬长而去。儿子为媳妇求情，使他厌恶万分。

因此，贵清在东京学习时常常觉得很为难。他妻子有时偷偷跑出去，花几个铜板，请人替她写信。有一次，还亲手给他写过几个笨拙难看的字。妻子的信总是在他眼前晃动，诉说着她那痛苦而单调的生活。这使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因为他并不能帮她什么忙。一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抗议信。可这以后，他再也收不到妻子的信了。父亲只给他回了一个简短的字条，字条上写道：企图教训父母，简直是不知羞耻。

贵清只能在他的同窗好友中寻求安慰。他知道，他们

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比他更多的烦恼。与他同屋的一个姓李的同学，也是河南人。虽然只有二十四岁，可他已经四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妻子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无知妇女，没有愿望，没有思想，没有任何抱负。她只知道听从他的指令，象一头不会说话的畜牲。贵清的朋友们还讲了许多这类事情。旧式妻子都认为，她们的主要职责就是生儿子，就是服侍她们的丈夫和丈夫的父母。此外她们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贵清的朋友们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和讨论国外各种传播新思潮的书籍。在他们的影响下，贵清开始留心观察发生于祖国的革命运动。

关于祖国的知识象汹涌的洪水一样冲击着他的心灵。正是这一年，革命军从广州开始了北伐。无数优秀青年在战场上牺牲了，但这一代价却换来了千百万中国民众的觉醒。

中国革命在日本的工人和革命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那里“危险思潮”首次被表达出来了。惊奇之余，贵清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祖国的革命对于日本人民来说，比对自己及许多富有的中国同胞更有意义。

数以千计的工人群众打着“中国革命万岁”、“胜利属于中国革命”、“胜利属于世界革命”等横幅，涌上东京街头示威。日本警察采用各种手段镇压这些示威者，殴打、逮捕，甚至囚禁他们。许多日本大学生也被捕了。他们在这里或那里被带走，从此就在人们眼里消失了。贵清常常去参加公开的群众集会，警察的扭打、搜身，甚至要逮捕他的警告，都很难阻止他。

贵清还经常偷偷地穿过警察的封锁线，去聆听日本工人和旅居日本的朝鲜人、中国人发表的充满激情的演说。

有时，日本发言者似乎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他们妒忌中国革命。贵清就曾听到一个日本人在演讲中这样说过：“日本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国是一个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社会，然而我们的中国兄弟却走到我们前头去了！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呀，同志们！”

在东京，贵清与许多祖国来的留学生交谈过。许多有钱的学生仇恨日本的工人和革命学生，说他们是危险的共产主义者。危险？对谁危险？——渐渐地，贵清的心中充满了疑问。他不知不觉地从一个观点到另一个观点反反复复地思索着。

但是，当他认识了隔壁的一位日本姑娘以后，新思潮对他的影响也就不如以前了。这是由他刚来东京时买的那把日本小提琴引起的。虽然贵清的父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狡猾而能干的商人，但贵清对这一职业却没有什么热情。他买了一把小提琴，他在这方面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学业的兴趣。一天，他听到隔壁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便放下自己的提琴仔细聆听。然而，隔壁的琴声也停了，好象演奏者也在倾听。当他重新开始拉琴时，对方的琴声也响了！这桩事情似乎比中国革命还有趣。于是，他每天观察隔壁的屋子。他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隔壁住的是一个女学生和她的家人。

终于有一天，他见到她了。她站在离他不远的走廊上，身材小巧玲珑，皮肤洁白细腻，眼睑细长，眸子又黑又亮，一条粗大的黑辫子搭在背后。风吹过来，压弯了她面前的赤杨树，她用和服的长袖带住树枝并将树枝提起，衣袖就象小鸟的翅膀一样舒展开来。她的和服的底色是草绿的，上面配着鲜亮的红色条饰，领口处还有一个夺目的

小红点。贵清注视着这个日本姑娘，觉得她是自己从未见过的最可爱的人。

姑娘知道他在注视着自己，害羞地瞧了他一眼。姑娘无疑看出了他脸上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所以没有跑开。姑娘甚至比她更勇敢、更摩登，她先开口了。“您的小提琴拉得真好！”她笑咪咪地说。贵清还在兴奋地注视着她，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

此后，和这位姑娘见面的办法就多了。有时，计划周密地在街上和她“偶然”相遇；有时，在花园附近“突然”发现她坐在长椅上。他不再认真学习，不再关心祖国的革命，而是费尽心思地考虑与姑娘见面的方法。他听说姑娘名叫木子，刚刚高中毕业。姑娘的父母很不高兴他们的交往。因为贵清是中国人，而在他们这个阶级的日本人看来，中国人都是下等人。木子小姐可不这样看——不，当然不，她是一个现代姑娘！

贵清爱听姑娘那低缓而甜蜜的声音，这声音将他心中的一切杂念一扫而空。姑娘象日本的绝大多数女性一样，十分温顺。她拒绝了父母的旨意，偷偷跑出来和贵清相会。每当这时，贵清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日本学生。因为，中国学生看望日本姑娘，警察常常会出面干涉。

开始，贵清并没有告诉姑娘他已结婚了。随着这快乐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自己几乎都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正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爱上了木子小姐时，他的婚姻便清晰地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他很清楚，木子小姐也爱他。有时，他故意穿着自己的中式服装和姑娘一起在公园里散步。每当警察叫住他们，查问贵清是什么人时，姑娘总是怒不可遏地痛斥警

察，并且毫不在乎过往行人的不赞成态度。

贵清还用其他办法检验过姑娘对他的态度。他曾经领着姑娘参加过他的同胞们的集会。姑娘越听越有兴趣，越来越赞成所谓“危险思潮”了。她总是那么心甘情愿而且毫无疑虑地随他去参加集会，几乎被她所听到的观点迷住了。贵清不自觉地开始考虑——他俩是否能够象这样生活下去。他们可以一起回中国去，那里正在进行革命。可是，贵清立即想起了梁香——象奴隶一样服侍他父母的梁香，正期待着他的保护。

一个没有演讲活动的黄昏，贵清和木子小姐在公园的老地方会面了。当木子小姐的脸转向他时，已经做出的将梁香之事告诉她的决定，几乎立即在他心中取消了。但他还是强迫自己开口了。……两个人在寂静之中站了很久很久。突然，木子小姐朝贵清微微鞠了一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几个星期过去了，他们甚至连一次偶然的会面也没有。贵清天天夜不能寐，他常常在他们曾经约会的公园里徘徊，他的小提琴也没有引起隔壁的共鸣，他的生活变得象贫瘠的沙漠一样乏味。祖国的革命在他心中淡漠了，他仅仅生活在自己个人的悲惨世界里，孤立无助，没有希望。

就好象有人早已为他写好了人生的剧本，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向他走来。似乎是为了使他摆脱困境，他父亲来了一封召他回家的电报，说他母亲病了。于是，他执行了父亲的指示。反正他已经全无一点自己的愿望了。

当他到家的时候，他母亲却亲自在门口迎接了他。从母亲这里他才得知，小梁香病故了。她是四个月以前死去

的，现在坟上已经长出了青草。家里人甚至没有将梁香的死讯告诉他。他父亲这次叫他回家，仅仅是为了给他续弦，因为家里需要一个媳妇来干梁香曾经干过的苦活。贵清受到极大的震动。当他和木子小姐在一起消磨时光的时候，在他的严厉而自私的父亲的驱使下，他那瘦小的妻子已经被活活累死了。

但是，贵清已经不同于以前了。在东京，他毕竟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已经认真地甚至是悲剧性地获得了自己的新思想。况且，他们已经断送了他妻子的生命。于是，在他父亲面前，他爆发了——他说的话，完全不象一个中国儿子对父亲说的话。生活的悲剧似乎缠绕在他的周围，而他面前的这个人似乎应该为此负责。终于，他爆发了：“我决不会再娶一个妻子，让她为你当牛作马直到死！”

他的话音还没有落下，他父亲就给了他一记沉重的耳光，然后抓起拐杖使劲朝他头上打去。

贵清醒来时，看到他的母亲正泪流满面地弯腰站在他面前。这以后他躺了一个月，总算恢复了健康，可以重新走动了。他正式要求父亲同意他重返东京。作为回答，父亲从店里的货架上取下了一条手帕。手帕里面有几封信。贵清一见那出自女性手笔的日文，就知道这些信来自何方。所有的信都已经启封了。儿子知道，父亲已经从城里请来朋友，帮他把这些信读过了。贵清走过去取信，可他父亲转身将它们扔进了火盆，还站在一边等着，直到全部信件及其所记载的珍贵秘密燃成了灰烬。儿子站在一边，脸色惨白。然后父亲向儿子宣布，他必须再娶一个媳妇，否则就别想再出去学习。而且，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他再去东京了。

贵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制定了自己的出走计划。他去附近的小城找到父亲的两个商人朋友。他们都知道，虽然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从家里逃出来过，但绝不能因此说他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他们对他说，他父亲需要一笔钱。他们将钱交给他，他在借条上签了字。当天晚上，带着三百块银元的现金，贵清乘坐三等列车踏上了去东京的路程。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以外，他没带任何行李。

到达东京的当天，他从姓李的同学那里得知，木子小姐一家突然搬走了，没留地址。小姐的父母为她安排了一桩婚事，可她拒绝了。这引起了人们的毁谤。有人告诉李说，小姐一家已回家乡去了。

下午，贵清上了去木子小姐家乡的列车。在木子小姐的家乡，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木子小姐，然而结果却令他失望。他又回到东京寻找。他先去了警察局，然后又去了木子小姐曾经就读的学校。一个女学生向他提供了唯一一条线索。这个女学生说：木子小姐已经从李那里知道了他妻子的死讯。当她父亲强迫她结婚时，她给他去了几封信，但却没有回音。于是，她病了，住进了医院。

贵清找到了这家医院。一个护士告诉他：木子小姐的确在这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她因精神崩溃而非常痛苦。她哭得很伤心，她的父母和医生都受不住了。她不断呼唤着贵清的名字。伴随着的，还有另一个最亲切的仅仅在爱人之间交流的词——“生命”。她总是叫着：“啊，我的生命！啊，我的生命！”可是，护士也不知道这家人现在搬到什么地方去了。护士请贵清留下来谈谈，因为这是一个少有的闲聊机会。但是失望象乌云一样笼罩在贵清的心头，他转身走了。

这之后一连几个星期，贵清一直在寻找木子小姐。他抱着侥幸心理，在每一条街道上穿行，观察着每一个来往的姑娘，搜寻着每一条僻静的小巷。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与这个寻找日本爱侣的中国人作对。他常常远远地看见一个小小的倩影，风儿卷起了和服的长袖，然而每次急匆匆地跑过去，无不失望而返。

希望在他心中慢慢地破灭了，就象泉水在泉眼里枯竭了一样。一天，他走进一个小酒店喝酒。狂饮之后，他迷迷糊糊，忘乎所以，心中充满对自己和别人的痛恨。此后，他常常因喝醉酒而象死人似地躺在路旁，只觉得人力车和汽车正从自己身边驶过。他每天醉醺醺地打发着时光，浑身脏透了也不洗一洗，钱就象沙子一样从他的指缝里流走。对于他这个内向的青年人来说，人的世界及其所有的一切原则全都变成了一片空无。

贵清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酒徒。当他清醒的时候，朋友们总是严厉地批评他：“每个人都知道，日本人瞧不起中国人。可你竟为一个日本姑娘失去了理智。这难道不是一种羞耻吗？”人们和他谈着中国革命的命运，谈着已经发难的反革命。他们问道：“现在革命者正在惨遭屠杀，你难道不应该抛弃一切糊涂的个人感情，去参加日本工人和学生的群众大会吗？你难道没有责任反对白色恐怖吗？”

贵清静静地听着这些诚恳的劝告，他那糊涂的脑海里掠过一丝骄傲——人们都在谈论他，他竟然在他的朋友和同胞中引起了如此的关注。他从来没有清理过自己的思想与行动，他让自己的个人感情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直接导致了自我的毁灭。有一次，李和另外两个朋友约他一起去城外划船，再次开导他。他突然站了起来，二话不说

猛地跳入水中。一个朋友赶忙跟着他钻进水去。可他死意已定，坚决拒绝朋友的搭救。只是当别人用桨朝他头部猛击一下使他昏迷过去之后，他才被活着拖上湖岸。

这以后不久，日本军队侵占了山东，轰炸了济南。这一消息以及朋友们在抗议集会上的发言，使贵清的头脑清醒过来了。他对这些日本人有着刻骨的仇恨，是他们夺走了他的木子小姐；现在，又是他们轰炸了中国的城市。一种超出他对木子小姐的爱情的强烈感情，支配了他的行动。从这一时刻起，他不再喝酒了，就好象长期患病之后突然复原了一样。

举行群众集会的时候，贵清站在会场的最中间。大厅里，舞台上，到处都是日本警察。然而，发言者一个接一个地走上前去。首先发言的是一个中国人，他代表各派中国组织结成的大同盟；接着发言的是日本人，他们满脑子的“危险思潮”；最后一个朝鲜人，两个日本警察就站在他的两侧，可他发言如故，并且始终将他自己绷紧的面孔朝向听众。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会后警察会跟踪他们，甚至会在街上将他们打得不省人事，然后囚禁起来。

集会刚刚结束，手无寸铁的听众还没有散去，警察就前来袭击了。在警棍的殴打下，男男女女四下逃散，受伤者躺在街上鲜血直流。贵清负了伤，衣服被撕成了破布条，他正竭尽全力试图从人行道上爬起来。两个朋友看见了，赶快跑过去，将他架在肩上，拖离街道，放在花园里的一棵树下。他们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过了好一会，才把他送进一家小酒店。

“他又喝酒了？”店主问道，朋友们连忙点头认可。他

们擦净了贵清脸上的血迹，把他从昏迷中唤醒。

随后的一周中，朋友们竭力劝贵清离开日本。“和我一起回国吧。”一个学生说，“我再也不在这个国家学习了。”于是，贵清和他的朋友离开东京回国了。一个日本间谍对他们很感兴趣，紧跟着他们到了北京。

现在，贵清在北京生活。他是一个文弱的青年，但仍然有着一种坚强而执着的男子气。他只有身上穿的这一套衣服，两条长长的衬裤腿拉下来包住脚趾就是袜子。他的床是由三块木板钉成的，上面放着一床棉被。他每天靠小米粥腌咸菜充饥。他的朋友和他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娱乐，乘公共汽车在他们看来都是一种奢侈。宣传“危险思潮”的杂志和书籍在他们中间传阅。这种思潮绝不能与那些儿戏般的“新观念”同日而语，它的出现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贵清和他的绝大多数朋友都充分理解这种思潮的意义；也完全清楚，如果他们的行动被人发现他们将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贵清常常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交谈。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人严谨，头脑清醒，明确自己所要走的道路。但贵清和他们不一样，他总是屈身坐着，双手搭在膝上，谈着压在他那年青的心灵上的种种事情。

“我常常睡不着觉。”他说，“我的路太窄了，而且越走越窄。我看不到自己的出路。我没有钱读书，也没有受过职业培训。成千上万受过训练而且很有经验的人都还没有工作呢……如果我同意和父亲为我选定的姑娘结婚，我就可以得到父亲的帮助。可我怎能向他屈服呢？我恨这个自称是我的父亲的人！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巨大的包袱，正拖着我们这些年轻人走向深渊。我知道许多年轻人就是这样毁

灭了。你可以说我们应该承受这种命运，也可以说我们应该去抗争。可是在我的家乡，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抗争。这不应该责怪我们——这是整个制度的责任。”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摧毁这个制度吧！”一个朋友愤然打断了贵清的话。

贵清审视着自己那女孩子般纤细无力的双手，似乎在研究它们是否具有摧毁“制度”的能力。

“怎么办？”他茫然地说，“我看不到出路，我的道路越来越窄，我的心灵受到了创伤，我的记忆力不行了，我的神经也受了刺激。现在，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出路。我所知道的只有一点——我永远不再结婚了。我必须寻找一条为祖国工作的道路。”

“为祖国！为祖国！”有人插话说，“你指的是谁的祖国？是群众的还是统治者的？是人民的还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的？你是一个无用的知识分子，毫无用处！我们的道路很明确，十分明确！这里只有一条路，你知道它是什么——尽管我们不敢把它说出来。没有其他道路可走了。你已经在其他道路上摸索过了，结果却陷入了个人感情的泥坑。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往前走呢？”

贵清语无伦次地答道：“是的，你说得对。你常常是正确的，可还是……”他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

贵清的朋友们投入了自己的事业，他却独自沉浸在个人生活的空虚之中。每当日本女性从他身边经过，他总是死死地盯着人家，好象还在寻找木子小姐。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日本姑娘。一个朋友对他说：“她很美。”出自一种深深的信念，贵清答道：“不，她不美——她所有的只不过是一种死气沉沉的美，她的和服也不漂亮。……哦，有

时候，日本姑娘穿一种草绿色的和服，袖子上带有红条饰，领子上装饰着红点点。轻风吹起了和服的长袖，就象小鸟鼓动着翅膀……”

十一 献身之路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的历史舞台上，一位妇女的形象一再显现在我们面前。

乍一看，她十分娇柔，她的手就象孩子的小手一样软弱无力。但是当你仔细地观察她时，就会发现：她那苗条的比一般姑娘略高的身材，因为经常参加体力劳动而显得挺拔、结实。不过，她那双手倒是十分纤细。她那光滑黑亮的头发，有时剪得象男孩子一样短；有时又留得长长的，用一只细长的绿发卡束在脖子后面。她有时穿着一身士兵服，有时穿着一条褪了色的棉裤和一件大众化的女上衣，有时则穿着一件贵妇人穿的精美的丝绸旗袍。

现在，她穿着一件从颈部一直垂至踝部的丝绸旗袍。当她把头转向我们时，我们发现她的面部表情十分生动。与她的服装不协调的是，她既没有那种娃娃式的漂亮，更没有那种统治阶级妇女脸上常见的冷漠、残酷和自私。这张脸是这样的容光焕发，两只眼睛甚至整个面孔都表露着一种活生生的满怀信念的激情；这张脸显示着过人的聪明，又黑又亮的眼睛观察着、体会着周围的一切。发自这座伟大的历史舞台的每一个声音，出自这个美丽的女性的每一个行动，都表现出了爱和激情的力量，表现出了对其目标的坚定信念。

在旧中国的封建舞台上，许多男人常常昂首阔步地表演着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也许，这位妇女也能象他们那样

谈谈自己吧？真走运，也许是害怕悲剧性的往事压倒自己并使自己的声音永远沉寂下去，这位妇女迫不急待地开腔了。那么，就让我们洗耳恭听吧。

“我叫张小红，一九〇二年出生于香港一个十分富有的名家望族。这个大家庭的所有财产都是我的祖父挣来的。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了，便不得不承认鸦片进口合法，不得不交付大宗赔款，不得不做出大规模的领土让步，不得不将香港割给英国。在这之后几年，英国雇主主动给了我祖父一笔钱，并对他表示信任，希望他帮助他们开发新的殖民地。我祖父接受了这笔钱。几年过后，我祖父财产的价值达到了一千万两银子，包括股票、土地、房产、货栈、商店、码头、赌场和鸦片交易等等。

“因为家庭出身十分贫苦，我的祖父没有受过封建主义的教育。又因为长期以来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密切接触，使他在许多方面受到了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社交方面，他还保留了不少封建主义的习惯。他把这些东西与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结合起来了。运用这种新的方式，他拚命地为自己的家族从出现于他的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男女劳动者身上榨取财富。

“因为财大气粗，他得到了中国南方许多旧式人物的尊敬和赞赏。然而，他的一些新思想，例如让自己家里的女孩子受教育等等，却常常遭人非议。幸运的是，我和我的姐妹们都获准受了教育，我们家的某些男人还被送到国外留学。但是，这些自由主义思想仅仅存在于我祖父自己的家庭中。对于别的家庭或者广大民众来说，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象他的英国合伙人一样，他也用鸦片毒害了

许多人，他还将一些男人和女人卖为奴仆。

“我的祖母是一个十分精明能干的旧式妇女。除非大量金钱是通过她的指缝流入家庭钱柜的，否则她对家里的财富永远也不会觉得满足。清王朝倒台之前不久，我祖父去世了，我的祖母差不多成了全家的最高权威。这是因为，虽然我的父亲作为长子应该保持自己作为一家之长的地位，可他却沉溺于吸食鸦片之中，除了自己的嗜好之外几乎什么事情都不管。我的母亲是一家大盐商的女儿，既精明能干又雄心勃勃，她是我祖母的得力助手。

“我有两个姐姐、四个哥哥，可我母亲似乎更喜欢我这个最小的孩子。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在中国，即使是一个足部畸形的儿子，也要比一个具有‘十八罗汉’式美德的女儿更有价值。让一个女孩子受教育，无异于为他人作嫁衣裳。

“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大家庭的一个男人从国外回来，在香港办了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他说服我的母亲和祖母让我去上学，为其他女孩子领路。这一举动引起了一场大骚动，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英国，当时都不允许男女同校。

“就象某些外国商人和华南的中国商人一样，我的家庭在一些方面充满着现代思想，但在另一些方面又保留着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东西。这一切都来源于一种唯利是图的商业意识：赚钱就是生存的目的，就是值得珍视的事业，就是众人都要顶礼膜拜的上帝。赚钱可以说明一切、解释一切。除此之外，生活中的任何其他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的祖母所参与的奴隶买卖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

了深刻的记忆。我说过，除非金钱从她的手中经过，否则她永远也不会感到满足。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她所卖的奴仆通常都是一些被称作‘妹仔’的女孩子，这一称呼就意味着家庭苦役。有些中国人和英国人为了给自己留面子，把她们称为‘养女’。

“‘养女’这个词是中国多种多样的伪善字眼之一。‘妹仔’就是奴隶，买进卖出都是为了赚钱。她们的主人掌握着她们的生杀大权。出于主人一时的喜好，她们可以在任何时候被转卖到任何地方：她们可以作为工人送进工厂去为她们的主人挣钱；她们可以作为妓女任人摧残；她们可以作为小妾卖给那些有钱有势的下流男人。这些姑娘都是中国南方各省农民的女儿。农民们太穷了。除非这些姑娘得以出嫁，否则她们的父母就只能把她们卖掉。

“在华南和香港，即使是中等人家，也差不多都有一个或几个年轻的女仆——她们要完成一切沉重的家庭苦役。那些漂亮的姑娘，通常被高价卖给富人作小老婆。还有一些姑娘被卖到广州、澳门、香港及其他南洋城市的歌舞厅或妓院当妓女。此外，上海和华北一些城市的有钱人也到广州搜寻漂亮姑娘作小老婆或妓女。

“我家所有的佣人都是‘妹仔’，我们自己的生活就依赖于这些女奴的劳动。不仅如此，我家还是买卖女奴的场所，我的祖母就做这种买卖。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幼童的时候，就常常站在祖母身边，看着男人们挑选那些姑娘。这些男人中，有来自广州的肥胖官员，有腰缠万贯的商人，还有这些商人和官员的道貌岸然而又懒惰成性的公子哥儿。他们都是来找小老婆的。有时，也有个别的男人或女人来找家庭女仆。每当这些人身着精美的丝绸长袍来到我家

时，家人总要端茶倒水，我的祖母总要对他们那可敬家庭的昌盛和家人的健康表示关心。

“当他们讲明来意以后，姑娘们就被带进来了。在这种场合下，她们都穿得很漂亮，美丽的脸蛋上都涂脂抹粉了一番。但是，买主都是十分精明的生意人，谁也别想让他们上当。他们常常强迫姑娘们脱下宽大的长裤或旗袍，以便察看她们大腿的肤色。这些男人还常常拿衣服蘸上水，擦去姑娘们脸上的脂粉，以确定她们的皮肤是否真的很好。他们还不时地用手去触摸姑娘身体的各个部位。

“中意之后，这个男人就走近这个姑娘，道貌岸然地冲着她咧嘴一笑，问道：‘你愿意作我的姨太太吗？’姑娘的头低垂在胸前，答着‘愿意’，可大颗的泪珠却从她的眼里滚了下来，悲戚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泪痕。这时，姑娘便退了下去，买主就开始与我的祖母讨价还价了。他们总是坚持要证明他们买走的姑娘是处女，并说：如果第一夜过后他发现她并非处女的话，他就要把她退回来。

“有些人说，娶姨太太是为了寻求爱侣。因为，第一个妻子的存在是维系家庭的传统方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列祖列宗；可小老婆却可以提供爱。但是我要问——爱？爱谁！小老婆不过是买进卖出的奴婢。如果主人愿意，如果主人破了产，如果主人需要钱，掌握着她的命运的他，就可以随时将她转卖出去，或者将她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某一个下属。爱？走投无路的穷家女子被富人买下来，这就是我国统治阶级所谓的爱！然而，即使对于买下这些姑娘的人来说，这种爱也仅仅意味着肉欲。

“您以为我是在说黑暗的年代，在说过去的岁月，在说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童年时期那些死亡了的、过去了的

习俗吗？不，我说的就是现在。因为，在今日中国的东西南北，穷人的姑娘还在被人卖为奴婢。我的祖国更深地陷入了贫困和被奴役的境地，奴隶买卖的基础因而也就更为牢固了。无论在南京、广州还是北京，各式各样的政府中的最高级官员和军事将领，都有自己买来的小老婆。为外国人如此欣赏和支持的蒋介石，也只是为了和一个女人结婚以利用她和外国的关系来建立自己个人的政治统治，才‘休’了自己的四个‘妻子’。

“我是富家的女儿，享受着金钱所能买来的各种各样的舒适与安逸。我的母亲爱我爱得要命，她保护着我，为我筹划着锦绣前程。可是，甚至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如果我生为农民或其他穷人的女儿，就象我家厨房的那些姑娘一样，就象在我祖母手下通过检查的那些姑娘一样，我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命运呢？即使作为一个幼童，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姑娘们在被出卖的过程中面对那些有钱男人说‘我愿意’时流下的眼泪。在我童年的幻想中，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为一个正在为所有女奴的解放而斗争的强大军队的首领。

“童年的时候，我也听说过买卖男奴隶的交易。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被绑架的，还有一些人则是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骗到船上去的。有了这些借口，那些‘感伤主义者’也许就可以心安理得了。经常被用来对付那些身强力壮的农民的借口，是所谓‘契约劳动’。华南的贫苦农民、工人和退伍军人都被诱惑来了。而诱惑他们的，不过是每月高薪的许诺和大富大贵的传闻，甚至仅仅是填充他们那空空如也的肚皮的一顿饱饭。他们被成千上万地征募来，送往英国、荷兰、法国的南亚殖民地，在那里的种植园和矿山

干活。

“人们常常听说，去南洋的中国移民都发了财。实际上，发财的人屈指可数；而成千上万的人却在贫困和绝望之中，在工头残酷的鞭笞之下死去了。他们寄了几个钱回家，经年累月或许有上百万元。可是，我国被迫到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寻求生计的却有好几百万人。也许，他们每月能从自己那微薄的薪金里省出三四块钱寄回家来；也许，这些钱可以积成百万之数。然而，对于他们每一个个人来说，这钱却是多么可怜的一点收入啊！”

“我可以让您更详细地了解，今天这些劳工是怎样被送到南洋去的。在香港，有一家荷兰大交易公司的分支机构，它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锡矿提供劳动力。这种矿物质对人的健康非常有害，以致于劳工在这里干上短短几年就会死去。于是，这家荷兰公司每年都要两三次地派中国劳工征募人员去广东宣扬大富大贵的神话，说那些发了财的人正盼着其他人也到荷兰东印度公司去捞一把。劳工征募人员的酬金是按人头付的，他们和中国官员们一起分享这些钱，因为后者认可这种征募的合法性并发给被征募的牺牲者以通行证。

“成百上千的应征者被用船运到香港。荷兰公司在这里对他们进行体检，看他们的胸膛是否宽阔，手臂和身体是否强壮得足以从事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无人愿干的活儿。这些人被塞进连牛栏马厩也不如的货轮之后，货轮就从香港启航了。到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码头以后，这些人被赶上岸去，关进监狱。在这里，用荷兰文写成的契约被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连自己祖国的语言都读不来，当然更不可能读懂荷兰文了。正因为如此，劳工们在这一契约面前总是

束手无策。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一旦将自己的手印按在这种契约上，就要失去长达十年的人身自由。

“这纸契约将迫使劳工在锡矿干上十年的苦役，其报酬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发的一份工资。在中国的时候契约是不会摆在劳工面前的——绝不能让他们有选择的机会。然而现在，只要劳工们拒绝在上面签字，荷兰人就宣称：他们必须向公司赔偿膳食费和到这里来的路费；他们还必须立即离开这个国家，而且要由自己支付回中国的路费。如果劳工们仍然不肯就范，他们的荷兰新主人就用鞭子踢他们，用鞭子抽他们——这些手段的使用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绝望之中，大多数劳工都会在契约上签字的，因为他们既贫穷又无知。然而有些人，比如荷兰人称为‘坏分子’的退伍军人，无论如何也不肯签字，因为他们实在不愿意再去送死。

“接着，劳工们就被送到锡矿去了。矿山死的人很多，以致于一年之内要两次补充新人。一些试图逃跑的人被逮住送往法庭审判，他们面前的法官不是别人，而是矿山的老板。对他们的惩罚有鞭笞以及延长奴役合同等等。

“今天，南方的奴隶主不仅有英国人、荷兰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而且还有中国的百万富翁。这些中国人的父辈或者劳苦一生，或者通过各种非同一般的狡猾手段积累了大宗财富。他们已经加入了白人种植园主和矿山主的阶级阵线。种族界线消失了，出现的是严峻的阶级阵线。南方的财富吸干了工人們的鲜血，它完全是建立在工人們的尸骨之上的。

“……我已经从我个人的故事上扯开了。我想，这个有关人民被奴役的故事同样会使您感兴趣的。因为它是人

类的无数暴行之一，它唤醒了我对自己责任的意识，它在我面前揭示了统治阶级的真面目。

“我告诉过您，我的家庭是封建主义实际与资本主义意识的大杂烩。一旦这两种剥削方法结合起来，就能从落入其势力范围的人们身上榨取更多的财富。我恰恰在这样一个时代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我能够上学读书，能够享受以往任何时代的姑娘和其他阶级的姑娘所不能享受的许多权利。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清王朝就已经被推翻了。新思潮的洪流涌进了我的国家，男人们都剪掉了辫子，女人们也不再裹脚。我自己的脚也不再裹了。

“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是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开始的。当时我十六岁。我的一个姐姐已经结婚多年了，那时她正住在广州，她的丈夫是广州的一名高级官员。我姐姐是幸运的，因为他丈夫的家庭住在汕头，她在广州可以有自己的小家庭。但她又是十分不幸的，因为她的生活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生孩子。她每年生一个，现在已经是七个孩子的母亲了。孩子不断出世，留给她的却是越来越弱的身体和越来越深的失望。她丈夫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消磨在出席官场宴会、赌博和与歌女厮混之中。

“我母亲让我去广州上中学，和我姐姐住在一起。我在广州生活的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帝国主义列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的朋友，暗地里却支持日本，按其强加给腐败的旧北京政府的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侵占中国的领土。国立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授组织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强大示威，这场运动迫使中国代表退出了巴黎和会。

“然而，对于中国的青年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来说，五四运动的意义更多地是政治上的。它与俄国十月革命接踵

而至，带来了对一切社会价值的重新发现，向青年知识分子宣判了封建意识的死刑。在广州，学生们比在英属香港更自由、更活跃。我也被这场运动陶醉了。它就象一股清新而强劲的春风，吹进了一栋腐朽而古老的房屋。

“指导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学生的是《新青年》杂志，它把新的知识传进了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就是它的编辑^①。通过这个杂志，我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对社会科学的认真钻研。当时，我是十分激进的广东学生会的领袖之一。

“就在那一年，我们广东学生为穷孩子开办了学校。从这时开始我认识到，对于穷人，不能仅仅可怜和同情他们，而且还必须把自己的知识教给他们，为他们服务。这是因为，我自己在生活中所享受的一切，都来源于他们。随后的两年里，我几乎花了自己的全部课余时间到工人夜校当教师。我从来不觉得累，因为前来求学的工人就象在干旱的沙漠中寻水一样。

“在我生活中的这一时期，不仅有为了伟大的目标而进行的艰巨的工作，而且还有和我家庭的斗争。除了我那两个婚姻不幸的姐姐以外，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人都试图迫使我马上结婚。不仅我的母亲泪流满面地请求我，而且我的哥哥、叔叔、伯伯、舅舅、姑妈、姨妈、堂表兄弟姐妹以及其他所有亲戚都来劝我。差不多有上百人致力于这个目标：用和某个年轻的百万富翁的婚姻束缚我，把我从‘危险倾向’中挽救出来。我多次拒绝结婚，但母亲却总是去搜寻那些她认为会使我愉快的年轻富翁。我每次回到香港，

^① 指陈独秀。——译者

家中都充满着悲哀与斗争；我的亲戚们每次来广州姐姐家及他们写给我的每一封信，也都会给我带来新的痛苦。

“但是，我坚决拒绝结婚。我决心去学习，将来作一个医生，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服务。和家庭的这场斗争是我和封建影响进行的第一次大斗争。这是一场可怕的斗争，两年多的时间里，压力从四面八方向我紧紧逼来。

“我十八岁的时候，我的大姐和北京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结婚了。她偷偷给了我一笔钱，叫我逃出广州到北京投奔她。一天，我从广州到了香港，在那里上了一条船。没有让家里知道，我就动身了。此后多年，我一直没有回过家。到北京后我给母亲写信，向她要钱学医，并威胁说：如果不给我钱的话，我就再也不见她了。终于，母爱占了上风，她让步了。

“在北京，我考上了著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学医的同时，我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读了许多书，还和《新青年》、《创造社》等出版物的作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创造社》这个刊物是由上海一个新文学团体出版的，该团体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紧张的工作把时间挤得满满的。随着医学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最严重的疾病都是社会性的疾病，它们只有在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可能被消灭。

“五卅运动开始的时候，已是我在北京上学的第五个年头了。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的英国警察对学生和工人进行大屠杀，这场运动便随之兴起了。与五四运动相比，这次大屠杀更深刻地向我们揭示出，帝国主义是中国进步的最大障碍。我们下决心要铲除这个障碍。在工人的罢工和学生的罢课中，在席卷全国的抵制英货运动中，我变

得非常活跃。然而第二年，敌视中国进步的反动势力又重新猖狂起来，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出最后通牒。我国统治者不仅在这个通牒面前战战兢兢，而且还开枪射击反对它的广大人民群众。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中国警察屠杀了许多游行示威抗议通牒的学生。

“屠杀开始的时候，我正在参加示威游行。警察举起步枪向集会的群众射击——当时参加集会的有几千名学生（包括儿童）。人们逃避弹雨时，警察就从背后向他们射击。一时间，我直直地站在那里动弹不得，只见警察举枪朝奔跑的青年开火，接着放声狂笑，然后又举枪射击。他们瞄准以后才朝人们开枪，就好象打鸟一样。眼前发生的事情是那么难以置信、那么惨无人道、那么野蛮残酷，以致于我都不能举步逃离现场了。

“后来，我试图转身逃跑，可又步履艰难。我倒下了，我发现自己倒在一个姑娘的身上。鲜血象一条暗红色的小河，从她的脖子上缓缓流出。这时，不知什么东西沉重地落在了我的身上，把我压向身下的尸体。我根本不能动弹，只听见几声痛苦的呻吟，只觉得我身上的躯体在战抖痉挛，一股温湿腥臭的液体流遍了我的全身，透过了我的衣服，滴落在我的脖子和脸上。接着，我听见步枪射击的砰砰声和男男女女的尖叫声。我高声叫着寻求援助，心里有一种极度无力与极度恐惧相混合的感觉。我昏迷过去了，直到一个急急的声音把我唤醒。我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寝室里，几个年轻的女同志正在替我擦血，一个医生正在检查我的身体。

“在这场大屠杀中，我同学的尸体救了我的命。我只是手臂上端受了一处枪伤，当时都没有感觉到。这次大屠杀

向我们揭露了中国进步的又一个敌人——军阀和官僚。

“这一年春天，经过六年的学习之后，我终于成了一名医生。我曾经打算去国外继续深造，可是革命运动正走向高潮，革命军队正准备离开广州北上征讨军阀。于是，我迅速离开北京，前往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我离开广州来北京学医的时候，伟大的香港工人总罢工已经爆发了。它使英属香港陷入瘫痪之中，它体现了工人阶级不可征服的力量及其在中国革命中所必然要起的历史作用，它在高踞于我国各大城市之上的中国统治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心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怖和仇恨。罢工期间，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在广州城内外修筑了现代化的通道，使得这个城市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

“我发现，广东全省的几百万农民都已经组织了自己的农会。他们正在抛弃由地主和高利贷者结成的旧式的封建锁链，以及由军阀和官僚结成的现代的手铐脚镣。农民造反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第一次。但今天，他们破天荒地在一个具有明确的社会纲领的革命党领导之下，为了自己的解放奋起了。这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它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了。两年前，它还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

“由于以上种种进步和发展，很久以前我就已经认识到了：童年时期我那率领一支军队去解放奴隶的幻想，不过是一个孩子式的梦。因为这需要一个社会制度，一个解放全中国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制度。我曾经渴望解救的那些年轻的女奴，已经获得了人的尊严。现在，买卖她们是一种以死刑作为惩罚的犯罪行为。而且，男人们也不再需要签订契约，到殖民地奴隶主的种植园和矿山送死去了。

“但与此同时，当我经过香港的时候，当我回家作短暂

探访的时候，当我在广州逗留的时候，我意识到，革命正面临着极其危险而可怕的形势。因为，工人和农民的组织是不成熟的，他们还没有全面武装起来；而封建商人和旧式官僚阶级以及出自这些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在竭力争取每一种可能性，以重新获得他们失去了的权利，并镇压正在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

“我本人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据我自己的愿望，按照党的指示，我参加了‘铁军’的医疗队。我剪短了头发，穿上了军装，作为一名女革命者，参加了从广州向长江流域的进军。

“我们这些经历过中国大革命的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百万劳苦工农迸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多少个世纪了，他们衣不蔽体，在重压之下直不起身来。现在，几百万农民站起来了，他们挺直了腰杆，开始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他们在革命军中作战。他们担任向导。他们长久地等在革命军经过的道路旁，无偿地为我们的军队提供食物和开水。他们不再交租，也不再借高利贷。他们取缔了一切非法税务。在许多地方，大地主的土地被他们没收了，反动绅士被逐出家门。除了对革命军队的直接支援以外，整个中国南方还掀起了一场伟大的农民运动。千百万农民面对面地与旧军阀、土豪劣绅作斗争。他们并不是坐等革命军的来到，而是随着我们进军的消息举行各种集会，发动向反动势力的猛烈进攻。

“我所在的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铁军’，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知晓。我们的指挥官有许多是共产党员，后来他们忠实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成为今天中国中部的工农红军的领导者。我们的部队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为此感

到光荣。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抵挡我们。我们和那些攻占汉口和汉阳的人们一起攻下了武昌。我的身体变得强壮起来，无论在检疫所工作还是在战场上运送伤员，似乎都有无限的精力。我亲手为几百个牺牲了的中国最优秀的青年合上了眼睛。注视着为革命献出了生命的每一个人，钢铁般的信念更加深入了我的身心。过去常流的泪水干涸了，升腾起来的是无穷无尽的革命热情。

“我们的队伍继续向南昌挺进。就在我们驻在南昌的时候，反革命政变^①突然爆发，可怕的白色恐怖开始了。军官中有地主豪绅的儿子，有出身于职业军人家庭或城市资本家家庭的。从一开始，他们就害怕和仇恨工农力量。当群众开始自己解放自己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军官和地主豪绅、城市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来维护旧秩序，扼杀新秩序。

“这些军官特别仇恨给普通士兵以人权的政治委员会。当军官们被迫参加每周举行一次的官兵会议时，普通士兵有权要求他们解释或说明金钱的开销，有权问他们士兵应得的军饷为什么没有发放。军官们由此贪污发财的所有特权，都被铲除干净了。

“这样一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它是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力量和革命力量进入了公开的决战。蒋介石通过大规模屠杀工人和知识分子，在上海开始了白色恐怖。接着，白色恐怖推向了敢于抬头挺胸的农民，成千上万刚刚组织起来而装备尚差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了。所有的反动封建势

^① 指“四一二”政变。——译者

力卷土重来，中国大地染成一片血红……

“革命力量奋起捍卫革命，我们在南昌举行了反对反动派的起义。起义失败后，在队伍中的共产党员军官领导下，我们一路行军，直穿江西，奔向汕头。我们希望攻占汕头，然后攻占广州并使之再次成为革命的堡垒。但是，革命太年轻了，反革命的力量由于帝国主义的积极支持而十分强大。汕头的战斗我们失败了。在这场战斗中我发现，放下药箱，拿起步枪是十分必要的。我觉得自己了解反动派所能干出的一切，因为我本人就出身于反动统治阶级之列，来自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之中。虽然我对伤员尽过自己的责任，但一时间这不再可能了。我投入了战斗，我带着刻骨铭心的仇恨投入了战斗。

“失败是暂时的。我们的队伍退却了，分散了，一部分人进入了福建和江西，还有一部分人进入了广州。我打扮得象个时髦的贵妇，在广州住了下来。一段时间内我有些犹豫，觉得一旦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有所放松，人民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还是有可能出现的。但是，广州公社的被镇压残酷地驱散了我心中最后的幻想。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的工人农民举行起义，以极小的牺牲建立了广州公社。几名士兵以中央银行为隐蔽所抵抗起义队伍。在把他们驱逐出为炮火所摧毁的银行时，周围的几栋建筑物烧毁了。战斗结束后，公社开始组织工农革命政府——中国人民新的自由社会的核心。

“三天之后，在许多外国人和一些最封建的中国官员的指挥下，反动军队占领了广州。他们还得到了停泊在珠江的外国军舰的支援。公社被颠覆了，对人民的屠杀开始了。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推翻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的时候，大屠杀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以往任何世纪对造反的农民群众的大屠杀，成吉思汗在征讨中对他国人民的大屠杀，其残酷程度，都根本不能与白军在封建官僚的指挥下对广州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大屠杀相比拟。

“广州全城都让战火摧毁了，街上被杀的工人、妇女和学生数以千计。白军军官杀害了他们所遇到的每一个工人和学生。有时，他们用绞索套住受害者的脖子，然后朝这些人的头部开枪；有时，他们把受害者捆绑起来，强迫这些人跪下，然后砍头、刮肉。每个留童子头的姑娘被抓住后，都被剥得赤条条的当场轮奸，然后被他们从大腿开始将身体撕为两半。这些受害的姑娘一般不超过十五六岁。官员们对来自香港的英国记者发表谈话时说：‘留童子头的姑娘最坏，她们最狂妄，什么人都敢顶。我们已经杀了她们几百个，不杀不行。’

“受害者的尸体堆得象屠宰场。一天，四千名犯人被押到城外，全部用机关枪扫死。在场的有外国帝国主义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这些人以尸堆为背景，笑哈哈地摆着姿势拍了许多照片。苏联领事馆的五个官员被捕了，他们被押着游街，口袋里的钱被人抢光了，脚上的鞋子被人脱走了。最后，反动派杀害了他们。其中一位妇女是被残酷地折磨死的。一根巨大的钉子从阴道刺入，穿透了她的身体。

“四年以后在上海，一位美国军事情报官员的妻子向我说起这位苏联妇女被杀害时的情况，并给我看了她的身体被钉子刺穿时的照片。我默默地听着，一声不吭。这位美国官员的妻子讲完以后自以为是地说：“不过您知道，我

一点也不同情她。”尽管以前我对他们一无所知，可从这时起我清楚了：美国统治阶级一点也不会比中国封建反动派来得人道。一旦美国工人开始觉醒并为摆脱资本主义的奴役进行斗争，他们就会象中国工人一样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

“广州大屠杀数日之后，富人们开始冒险进入市区。我穿着一件丝绸旗袍，打扮得象个资产阶级太太，也混了进去。只有这样，我才是安全的。如果是穷苦妇女打扮，我就会被杀头。我在街上走着，只见负伤的和死去的工人躺在地上，仍然保持着被刀砍倒、被枪击中时的模样。我看见资产阶级妇女在街道上穿行。她们在死伤的工人面前弯下腰，用石头和木块的尖角敲打这些人的头颅。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被认为是统治阶级妇女特有的所谓人性，终于在我面前暴露出了它的虚伪和恐怖。在广州革命起义的最后一块阵地上，挖了许多大沟作坟场。我听说，在苏联领事馆官员的尸体被扔进去以前，有些资产阶级妇女竟然用小刀从上面割下肉来作纪念品。

“资产阶级和军阀的专政被重新建立起来了。除了黄色工会这个半官方组织(共首脑支持反动派)以外，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被取缔了。几年以前的孙中山博士以及后来的革命政府，都曾解除过城市商团的武装；而现在，商团又被重新武装起来了。遍及全省的农会被摧毁，成千的农民在斗争中被杀害。

“现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旧秩序都在广州重新建立起来了。鸦片烟馆到处泛滥，鸦片成了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赌场、宴会、妓院又成了官员们的主要娱乐场所。年轻女奴的买卖重新兴盛起来了。此后的几个

月里，我亲眼看见：贫苦农民家的姑娘又作为家庭苦役或小妾，被卖到商人和官员的家里。

“农村又恢复成了旧的租税制度。从农民那里收税的权利，被高价出卖了。为了这些权利，买者向政府提供了数以百万的银元。回过头来，他们就以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大量地向农民征收租税。他们向政府交过税之后，所有的余额就全部进了自己的腰包。新政府对这一余额的多少并无限制。象贪得无厌的兀鹰一样，这些吸血鬼把农民剥削得一干二净。农民曾经赢得的一切权利，农民曾经拥有的一切希望和梦想，都被重新建立起来的商人、政客和军阀的专政粉碎了。后者就象漫天的蝗虫，遮盖了广东省，遮盖了全中国。

“我已经看清了中国统治阶级的真面目，这就意味着我也看清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在重建中国反动统治的过程中，中国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通力合作。他们象野兽一样凶暴、残忍、无恶不作。他们对于中国的“贡献”，就是使它更加贫困落后，就是奴隶买卖，就是贪污腐化，就是残酷镇压。

“我当然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渴望受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成为自由的人，能够发展一种为自己的而不是象以往时代那样否定自己的文化。除了共产主义者，谁还能这样做呢？作为一个信仰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我正在中国中部的革命工农的队伍里工作。我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中华苏维埃政府，我们正在为人类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奠基。我是一个医生，一个卫生防疫工作者。作为特权阶级的一员，我曾经享有学习的特权。现在，我要用我学来的一切为工农服务。

“起初，除了那个残酷冷漠的旧制度以外，我们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所有劳动者都有权享受的学校、医院、剧团和俱乐部，有了我们自己的政治组织和军事防御组织。在这里，我四处奔波，建立卫生组织，发表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的演说，教育妇女照料好自己和儿童。我已经深入到了几百万被压迫者之中——除了对知识的渴求以外，我的注意力就全部集中在他们身上了。因为某些原因，我有时还不得不去上海或反动派残酷统治的其他城市旅行（我没有出国的自由）。每当这时，根据地人民热切的面孔就总是浮现在我的面前，召唤着我。

“至于我的那个封建旧家庭，他们对于我不过是一段黑暗而丑陋的回忆，而我对于他们则是一个可怕的恶梦。我所希望的，是作为一个红军战士站在他们和他们那个阶级面前，打掉他们的尊严，把人的生活方式带给被他们奴役的人们。他们曾经试图用婚姻束缚我。如果这样，我也许会象他们一样，和某个百万富翁生下一大堆孩子。但我自己在革命队伍中选择了——一个我所热爱的男人，为了获准和他在一起生活，我并不需要牧师或警察赐予资产阶级婚姻的那种神圣祝福。现在，我的丈夫已经在白色恐怖面前倒下去了。虽然我的心已经和他一起埋葬在汉口一个无名的坟墓里，但他为我国人民做出的英勇牺牲，一直在鼓舞着我不停的斗争。

“您希望了解我在中国所起的作用。我想，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也就足够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正在和同志们一起为新世界而战斗。也许有一天，我会在这个历史舞台上消失的。但是，我现在为之奋斗的一切，将结出丰

硕的革命果实，而我正是这场革命的一分子。现在我要走了，因为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分配给我的那些工作，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中 篇

苦 难 的 歌

十二 苦难的歌

一天晚上，在中国内地的一家小客栈里，一位来自广东的中国姑娘躺在一张中式雕花床上，向我讲述了她的童年生活。她把小巧而洁白的双手交叉着枕在头下，唱起了一首古老的中国民歌。还是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她就知道了这首歌，她的名字就取自这首歌。

象绝大多数民歌一样，这首歌也是十分简单的，它叙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在这首民歌的旋律中，中国古典音乐的深奥消失了。绝大多数西方人都能够理解它。它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民间歌谣，它是一篇人民的记事，它象征着今日中国许许多多的事情。不过从字面上理解，它只是一首悲歌。一个女人的丈夫在修筑万里长城的时候被杀害了，当时距基督教时代的开始还有两百余年。这首歌是这样开头的：

正月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挂红灯。
别人的丈夫回家转，
我的丈夫修长城。

二月里来燕成双，
飞向南墙上屋梁。
鸟儿栖身房顶下，

我的家里空悲凉。

就这样，这首歌按一年的月份持续了十二节。三月，桃花粉红，柳枝翠绿，家家户户都在祖先的坟前点上了几根香烛。四月，玫瑰花开，是采桑养蚕的日子。五月梅子黄熟，家家都在土地上耕作，只有范家^①的土地生荒了。六月荷花开了，七月忍冬花开了，妇女们在窗前穿针走线忙个不停。八月，金色的桂花开了，远在他乡的人们捎回了家信，但这个丈夫已在千里之外死去的孤独女人却没有收到信。九月，美酒飘香，菊花争艳，流民们又走上了流浪的路程。十月，树枝长出墙头，农民们割稻交租。十一月，大雪飘飘，白霜在每一片干枯的草叶上闪着青光。十二月，黄色的腊梅花开了，人们开始为欢度新年作准备了，但是这位妇女的丈夫在修筑长城时被杀害了，她只好孤独地呆在家里以泪洗面。她悲伤已极，万里长城在她的哭声中崩溃了……

这支古老的民歌在娓娓凄凉的曲调声中结束了。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似乎都有人唱着这支歌。人们也许会问这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将会告诉你：修筑万里长城涉及到了当时的千家万户。伟大而壮观的长城长达两千五百英里，是在二十年内筑成的。就象古埃及的金字塔和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一样，长城也是由奴隶劳动完成的。

据说当时的中华帝国有十分之三的男人被征去修筑长城。他们象牲畜一样，被残酷的监工用鞭子驱赶着。他们精疲力竭，遍体鳞伤。一旦他们死去，他们的尸体就会被

^① 原文误为“万家”。按“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孟姜女的丈夫为范喜郎。
——译者

埋入长城的泥土之中。修筑长城的故事记录在这首民歌和其他歌谣里，已经流传了二十多个世纪。

这首歌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人人会唱。它记载着修筑长城给老百姓带来的痛苦，记载着人民千百年来所遭受的苦难。就是今天，在上海街头你还能听到苦力们唱着这支已经变了调的歌。现在，它已经成为一支革命的歌。它保留了原来歌词的一部分和原有曲调的全部，并以这样一个革命故事作为基础——人民修筑了万里长城，国民党却背叛了它。

今天，这支诉说人民痛苦悲泣使长城闻声崩溃这一古老故事的民歌的歌词，既是抒情性的，也是战斗性的。不过，它的曲调仍然是愁闷而沉重的，就象几乎所有的民歌一样。

十三 难 民

陇海线上的最后一晚，我们在郑州换乘了另一列火车。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我们在车站的各个站台上看见不少标语，其中一条大标语写道：万众一心，抗战到底。这个地区挤满了军队，似乎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都穿着军装。不过，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已经司空见惯了。

郑州站的站台上有许多难民，他们将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干草杈和稻谷碾槽——都放在手推车上。难民中有几个男人，但绝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或坐或立，默默无语。两个站着男人就好象雕像一样纹丝不动，他们的身上裹着白色的长被单；妇女和幼童盖着被单在他们脚下挤成一团。看见这些人，我便想起了美洲的印地安人。这时，我们向站台的各个方向望去，发现还有许多人身上一无所有。

我们和难民交谈起来。他们都是来自河北西部一个小县的农民。在那个地方，八路军、游击队正在与“扫荡”他们的日本军队作战。我们和一位瘦高的老年妇女进行了一次难忘的交谈。她的嗓音嘶哑生硬。她既没有外套，也没有被单。她那满是皱纹的皮肤就象羊皮纸一般。

“河北西部有游击队和日本军队作战吗？”我们问。

“有。”她答道，声音象冰一样的生冷。

“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吧？”

“当然，大苦大难！”她很严厉，似乎不愿意说一个多余

的字。

“您多大年纪啦？”

“七十二。”

“您是怎么从河北西部到这里来的呢？”

“走来的——从去年十一月开始。”

无论是她的话语、她的声音，还是她那一动不动的身躯，都显现出一种无法描述的冷漠。她七十二岁了，却是冰雪皑皑的北方道路上的一个流浪者。她正在受苦受难，她的一切都被剥夺走了，甚至包括交谈中的语言。

我们站在一个裹在被单里的妇女面前。在这个女人的怀里，一个婴儿正在哭泣。紧靠着被单，坐着一个不到两岁的小女孩。我弯下身子，将她移到被单下面，然后又拉起被单替她盖好。她看着我们，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她笑得像个成年人，温文尔雅。这张小脸是多么甜蜜、多么可爱呀！衣不暖身，她也没有半点抱怨。

“今天，我们除了热水什么也没有。”一个逃难的农妇对我们说，“我们连一点吃的也没有了，给我们几个钱吧。”

我只有六块银元。在去汉口的快车上，我们的军事通行证是否能够被承认还很难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付钱的话，那么六块银元远远不够，我本人还得向比我钱多的同伴借钱呢。因此，我不可能把钱给难民。我只有六块银元，而难民却有几百个！这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于是，我象一只可怜虫似的，护着自己的六块银元，向难民们解释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们钱。

那时，在中国，要进入列车的三等车厢，需要经过周密的安排与计划。

“让我们安排一下我们的战斗吧。”我们中的一个人说，

“列车进站时，我们用肩膀将王幸福从车窗口顶进去，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行李递给他了。然后你帮我从车窗口爬进去，你自己再从车尾的那个门进去。”

列车进站了，每一节车厢两头的门前都挤满了人。若加入到这些正在搏斗的人们当中，无异于自找苦吃。于是，我们将自己人顶在肩膀上，从车窗口扔进去。最后，我本人从车厢后门挤了进去。车厢里面满满当当的，就象一个战场。乘客好象比座位数多出两三倍，连走道都被乘客、包袱、大大小小的篮子、盒子和皮箱挤得水泄不通。人们高一脚低一脚地从小山梁一样凸起的卧具上走过，睡者亦无可奈何。行李架上堆满了行李，行李上面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人。

这时，一家有钱的地主从人堆里走过。除地主本人外，这个家庭的成员还包括五六个妇女和七八个儿童。这情景就象一个土耳其苏丹^①，带着自己的后宫。士兵们扛着行李在前面开道，行李里包括你能想象出来的每一件东西。他们刚从我们面前走过便停下了脚步。一些行李被塞上了行李架或者扔在了走道上。此外，还有许多家具、卧具、衣物、篮子、包袱、皮箱。这些东西要占去不少地方。塞满每一处可以利用的空间之后，地主便指挥士兵驱赶座位上的乘客。我们搁脚的地方并不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可他们竟然连一声“请让让”都不说，就开始在我们脚边堆放包袱。

我腾地一下站了起来，提起搁在我脚旁的包袱朝走道扔去。包袱正落在地主妻妾们的脚旁。这对于他们可是见

^① 苏丹，阿拉伯文 Sultan 的音译，意为统治者。作为称号，始于十世纪，十一世纪起为伊斯兰教国家统治者广泛使用。——译者

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空前惊吓。可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跳起来。这些行李消失在其他乘客组成的人流之中了。人们听天由命地承受了这一切，就好象承受不可阻挡的黄河洪峰一样。

也许，等战争一结束，等贫苦农民和士兵打败了日本人，这个地主又会急急忙忙地赶回去的。说不定他还指望夺回自己的土地，甚至还指望农民补给他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租子呢。

在又直又窄的木板座位上是不可能睡觉的，车厢里的空气更是令人窒息。于是，我便开始观察其他乘客，仔细地听着他们的谈话。在我们前边的座位上，一些士兵正在说着什么，其中一人是个小头目。他们谈论的话题是中国政府从汉口向四川的大溃退。

我的卫兵说话了：“他们只谈撤退，太悲观了。为什么不谈谈进攻呢？”

在我身后的座位上，我听见有人在轻声说着什么。我站起来，回头一瞧，只见一位父亲正在跟怀中抱着的幼儿说话。

“打倒日本人！”父亲说。

幼儿稚嫩的声音重复道：“打倒日本人！”

“打倒卖国贼！”

“打倒卖国贼！”细小的声音尖叫着。

顺着走道过去是另一个家庭。然而这是一个悲惨的家庭，母亲不断地朝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大吼大叫，她的声音在全车厢人的耳中回响。这个女人有着一张惨白、冰冷、凶恶的面孔，我看见她三番五次地抽那个小孩的耳光。这太过火了。一个男人从走道上站起来，走过去，抱住了孩

子。凶狠的母亲一边紧紧地跟着，一边打着小孩的头。孩子痛苦地哭叫着。当这位陌生的男人用手臂护着孩子时，她竟朝他的手臂打去。

我从未见过这样残酷的中国母亲。中国的母亲们通常都是很温柔的，甚至于溺爱自己的孩子。于是我想，这位母亲说不定患有精神病；如果没有，那么说不定这个孩子是她丈夫前妻的。

在我们后面的另一排座位上，一位中国妇女在向她周围的人宣讲基督教义。她正在用世界末日的来临威胁人们，说眼下的战争就是世界末日的信号。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打动任何人。她又用死和死后的地狱烈火来威胁人们。可是，这似乎仍然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趣。于是她告诉人们，外国人并不希望中国成为基督的世界，外国人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防止中国人知晓基督的真理。这时，我看见一位妇女笑了笑，然后打了一个哈欠，在自己那个小角落里团起身子睡了。布道的妇女无可奈何，只得停了下来。

在宗教的领域里，中国人都是不可教化的。控制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唯一办法，是让其处于洪水或饥荒之中，然后再向这些人提供“唯一的真理”——粮食。这位布道的女人试图用战争来控制他们，而她却不能提供哪怕一粒粮食。更何况，有足够的钱乘三等车旅行的人们，无论如何也还没有走到绝路的尽头。

我们在当天午夜到达了汉口。人力车夫为了多挣点钱，拉着我们在街道上穿行了两个半小时。他们知道我们人生地不熟，对此毫无办法。最后，我们总算到了八路军驻武

汉办事处。

这个机关所在地原为日本租界，现在已经被中国人夺回来了。我们走进一个空房间，在地板上打开睡袋，铺上被单，转眼之间便进入了梦乡。

十四 五个沈阳女性

沈阳市那高大的城墙是清王朝时修筑的。城墙里面，现在正是茫茫黑夜。城外日本等国租界以及南边的中国人的生活与打算，此刻似乎都远在千里之外。钉着钢钉的四道城门午夜十二点关闭，清晨五点开启。在这段时间里，城外的世界似乎就更加遥远了。对于那些几十年来一直在中国沈阳和外部世界之间活动的人来说，这种远隔千里的感觉似乎更加强烈。

月光照在地上一片银白，夜的寒冷似乎把一切声音都冻结了。然而，站在我们的小花园石门外的一个乞妇，却不时发出悠长而神秘的呼叫：“老天保佑你呀，……你家会发财呀……”她叫了一遍又一遍。可是，我们这个院子里，最终也没人走出灰色的小屋去送她一块面包。于是，她离去了。她走后，花园里只剩下一个声音——堆在灰石墙边的长高粱杆上的枯叶发出的沙沙声。

在我们的房间里，一位小个子中国妇女正在谈着她的丈夫，谈着警察、债务、法庭以及少帅张学良。张学良那座防守森严的封建城堡在月光下高耸着，与我们的住所只隔两条街。如果你走过去，面对着你的将是高达二十英尺的阴森森的石头城墙。身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会用固定在城墙上的枪炮对着你，同时大呼“口令”。

和我们谈话的小个子妇女还很年轻。她那柔软的黑发朝后梳着，在脖子后面挽成一个发髻。在她的脸上，有着

一种奇特的表情。“她很美。”我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不，她并不美。”一个朋友答道。然而，好象为某个念头所启发，他又纠正了自己：“是的，她是很美。不过，这种美经不起琢磨。”她才思敏捷，目光执着。可能是和五十岁的丈夫一起在满洲生活的那段经历，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她有一种超越了哭哭啼啼的阶段之后才可能具备的镇定沉着。她坐着，双手交叉搁在膝上，很平静地谈着自己的丈夫。九个月以前，她丈夫的朋友在北边的吉林省被捕了。在严刑拷打之下，这位朋友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并说她的丈夫也是国民党。可后来，她的丈夫却被当作共产主义者逮捕了。她的丈夫长得很漂亮，见过他的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除了那个受刑者的供词以外，并没有别的指控他的证据。而这所谓“供词”，也不过是说他曾经在山东从事过多年的诸如放粮救灾之类的社会工作。然而，在满洲的官员看来，“证据”只不过是一个时髦玩意儿，用不着正儿八经地为它操心。

为了把丈夫从酷刑和死神下面解救出来，这位漂亮的小个子妇女到处找朋友帮忙。他们借了许多钱去疏通官员和法官，可是官员们的贪心是无止境的。据说南京新政府的刑律现在在满洲有效了。可是，除了那些腐朽的官僚或者新反动派以外，谁又能解释这个刑律呢？于是，他们不得不借了六百块美元去疏通一个律师，以求为她的丈夫开庭审判。据这位妇女说，律师说了，按照新刑律要“公开审判”。我听了不知底里，便说自己想去旁听。然而，屋里响起了一片坚决的反对声。

“如果您去旁听，我们大家都会被作为共产党抓起来的。审判永远都是秘密进行的。如果您要求旁听，他们就

会问您为什么对此有兴趣，还会问您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消息。”

这位漂亮的小个子妇女要走了。她缓缓地鞠着躬，说着“再见”。可她脸上的表情却说明，她正在考虑着与我们无关的其他事情。她走了。除开干枯的高粱叶子的沙沙声，花园里重又一片寂静……

我的中国房东是一位穿着旧式长裤和短上衣的小个子妇人。她十分瘦弱，因生育过多而显得十分憔悴（她生过十二个孩子，其中六个夭折了）。她丈夫一走进房间，她便站起来，递上一杯茶。她不识字，也从来没有出去过。可她的眼睛很明亮，透着一股聪明劲儿。她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询问着其他国家妇女的情况。她提的都是一些知识性问题，就好象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提的问题一样。她不时地叹着气，一声不响地思索着那些在她看来十分奇怪的事情。她说，西方妇女命好，她们可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只是在她们自己愿意的时候才生孩子。她并不了解中国南方现代妇女的生活情况。是啊，她怎么可能了解呢？十五岁时，她就从吉林省来到这里，和一个素昧平生的男人结了婚。沈阳远离她的家乡，她的全部生活就是生养孩子，时间和痛苦都是那么漫长。

现在她老了，憔悴了，丑陋了。她丈夫准备买一个十六岁的歌女，带回家来作二房。我的女房东不敢反对。但是，她的大儿子是现代学生，他提出了异议。他告诉父亲说，只要他娶二房，他就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再回来。

“你是我的儿子，你的行为要象个儿子。”他父亲警告他。

一个星期以前，父亲打了儿子一个耳光。但是，他这个儿子不信邪，头脑也很清醒。据说，在中国，作儿子的都爱戴父亲。可我并没有见过这样的儿子。而我女主人的大儿子眼中流露出来的对父亲的仇恨，我也从未在别的男人眼中见识过。在客人面前，他说话很少。可当人们谈起他的父亲时，他的眼睛却在说话。父子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摩擦。

这位父亲向我夸耀说：“过去，在公婆面前，媳妇只能垂手而立。”

儿子打断了父亲的话，说：“这就是那么多媳妇死亡的原因。”

“闭嘴，你这个笨蛋！”父亲训斥道。

但儿子并不住嘴，父亲也不敢把小老婆带回家了。

一位身着蓝色紧身棉外套、头发剪得象男孩子的年轻女教师，正在侃侃而谈。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我们曾试图一起闯进沈阳市的女监狱。监狱长对年轻姑娘说：“告诉这个外国女人，监狱长病了，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也不能干。”然后他又私下对她说：“不行呀，这个女人也许不是来参观什么监狱的。对于一个外国记者来说，眼下监狱还不太清洁，不太中看。”

然而这个女教师可以访问犯人，因为她是中国人，可以作为社会福利工作者进去。她告诉我：满洲的妇女还是半奴性的。男人们可以有許多小老婆，而妇女对自己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权利。离婚的观念被认为是极不道德的。男人可以“休”妻或者娶小老婆，而他的妻子却不能有所反对，甚至还须表现得象新来者的朋友。

“监狱里的女犯都犯了什么罪？”我问她。

年青女教师回答说：“主要是杀人罪。”

“杀人罪？……什么原因……杀了谁？”

“自己的丈夫。”她答道。

有些妇女是温顺的，有些则不是。我见过这样一位妇女，她曾被认为是最温顺的人。她是一个看上去很可怜的裹脚的农村妇女，来自山东，在沈阳沿街乞讨。她颠着一双小脚在结了冰的街道上蹒跚地走着，时常滑倒。于是，她干脆伸开手脚坐在沈阳市的主要街道中央。她那个小小的口袋破了，面包屑撒得四下都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小孩站在她的身边，什么忙也帮不上。

街上挤满了人。大家都看见了她这副模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过去帮助她。相反，他们却开始大笑起来。站在街角的警察盯着她，也和大家一起哄笑。三个花花公子，身穿精美的丝绸长袍和漂亮的浅黑色夹克衫，头戴青色的丝绸瓜皮小帽，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所有的人都在大声哄笑。

这位农村妇女的腿连动也不能动，但她用双手撑住自己的身体，前后左右地审视着四周的人，就好象一位将军在观察战场一样。接着，她开始诅咒起这些人了，从他们的列祖列宗一直骂到他们的子子孙孙，包括他们有幸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所有后代。她时而痛骂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时而怒斥他们全体，所有围观的人谁也无法逃脱。她一边有条有理、面面俱到地骂着，一边一英寸一英寸地朝他们爬过去。在她的骂声中，哄笑者脸上的笑意冻结了，就好象西伯利亚的寒流突然袭击了他们一样。他们急急忙忙地溜开了。可是，当他们四下逃散的时候，这位农妇又

用她所能想到的恭维话追随着他们。先行围观的人走了，又出现了情况一无所知的新来者。他们转到街角，见她坐在地上，也开始哄笑起来。于是，她又开始朝他们骂起来。她的声音象一根九股皮条拧成的鞭子，抽打着围观的哄笑者。他们的表情也变得很尴尬，都尽可能快地溜开了。最后，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于是，这位农妇带着无穷的烦恼与悲哀，重又使劲挪动着她那细瘦的腿。那个一直站在她身边的孩子，帮她拾起地上的面包屑。然后，两个人蹒跚地向前走去，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

街道上挤满了人，女人却没有几个。偶尔，有几辆汽车或人力车载着几位穿着典雅的夫人经过。这些夫人有的吸着香烟，有的叼着小烟嘴。不时地，也有那么两三个摩登女郎飘然而过。她们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双手插在口袋里，而且没有裹脚。她们满脑子都是自由主义思想。不难断定，她们都是学生。这些学生迈着轻松的步子，富有风度，骄傲而自信。

有一次，一位身穿普通蓝色棉外套的女学生和一位老年妇女一块上了电车。很明显，她们是母女俩。她们之间的文化教养相差了好几十年。母亲裹着小脚，长发梳得光溜溜的，在脖子后面挽成一个发髻。姑娘却象华北男子汉一样，长得高高壮壮，短发，天足，脸上流露出聪明与自信。

电车上挤满了男人，没有一处空地方。姑娘一只手抓住头上的木杆，一只手扶着自己的老母。全车厢五十多个男人，只有一个站起来给老太太让座。这是一个年轻的小

伙子。从穿着来看，很明显，他也是个学生。老太太吃了一惊，忙不迭地表示感谢。这时，其他的男人都乐不可支地瞧着，油腔滑调地说着，讥笑这个男学生心肠软。于是，这位男学生和高个子姑娘一起转过身子，朝那些男人报以轻蔑的一笑……

五十比二。这个比例对于中国南方来说是太低了，可对于满洲来说却太高了。难道不是吗？

十五 徐美林

徐美林是一个旧式妇女，在她身上体现了旧式妇女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她是被按照旧方式培养起来的——人们教她读书、画画、刺绣、管理家务以及书法。她现在三十岁了，是四个孩子的母亲，但仍然很年轻、很有吸引力。她的皮肤象中国的大多数非工农妇女一样，非常细腻光滑。她那闪着光泽的黑发从前额往后梳，在脖子后面松松地盘成一个发髻，发髻上还常常插着几朵香气四溢的鲜花。她穿着一件从脖子一直垂至脚踝的丝绸旗袍，旗袍隐现出她那苗条的身材。她有一种朴素的美。她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饰物，也没有一条皱褶。她的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柔软的平跟鞋。

她看上去风度十分优雅，可走路的时候就不尽然了——每当这时，她的举止便显得十分僵硬、笨拙。如果你在近处观察她就会发现，她的长统袜里面裹着宽厚的脚布，连踝部都裹上了。一般来说，在中国内地，女孩子都必须裹脚。但是后来，反裹脚的革命运动兴起了，人们鼓动三十岁以下的妇女为自己的双脚松绑。在华南和华中，许多妇女团体派人挨家挨户地鼓动人们反对裹脚和蓄长发。有些保守而迷信的妇女拒绝这么做，现代妇女便依仗手中的法律，强迫她们剪短头发、解放双脚。

徐美林也去掉了裹脚布，可是她的双脚仍然象裹着时一样痛苦不堪。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一只小脚，一

把泪水。虽然她的双脚松绑了，但它们已经永远地变形了。现在，她不得不半裹着它们。

美林比她的丈夫大五岁。她丈夫先后毕业于美国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教会学院。他是现代化的崇拜者，并把现代化与美国方式视为一体。他懂得美国的音乐、历史和文学。他写英文比写中文要漂亮得多，但他说起英语来鼻音却很重。他梦想去美国的福特工厂，然后回中国充当福特汽车公司的代理人，可他却没钱去实现他的梦想，因为他只不过是上海一家银行的小职员。为了把自己的妻子改造得象自己一样现代化，他将美林和孩子们从内地迁到了上海。

他是一个很时髦的男人。爬满青藤的陈旧的中式房屋，以及彩色的斜屋顶、用铜丝编织的窗户、设计奇特的中式雕花家具，这一切都被他视为没落的象征。于是，他租了一套现代风格的小公寓。这所公寓的窗户是正方形的，墙壁雪白，明亮的电灯在银色的灯伞下显得更加耀眼，就好象西方人的浴室一样。他在房间里配上了一套便宜的家具，并用通常是教堂里才有的一些小装饰品取代了那些旧式的写着哲言或画着精致的松竹图的中式条幅。他买回了诸如月光下的德国(或瑞士)之类的色彩绚丽的现代风景画，并把它们装进宽大的金色框架里挂在墙上。他最珍爱的是一张纽约市中心火车站的巨幅照片。他房间里最后的点缀，是那架附有许多美国爵士乐唱片的留声机，他的小女儿，刚刚八岁，就能够跳十分漂亮的查尔斯顿舞。然而值得庆幸的是，他是一个宽宏大量的人，从不强迫美林遵循中国女教徒的习惯，也不叫她戴那种从后面看去就象朝上翻的鸭子尾巴似的外国帽子。

美林象一个幽灵在这套奇特而丑陋的公寓里徘徊，就

好象徘徊在长期被人遗忘的中国古战场上一样。她是一位旧式妇女，热爱中国的旧东西，保留着旧式妇女的含蓄、尊贵与宁静。同时，她也是无知、迷信而且多疑的。她唯一懂得的，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上海的环境对于她来说就象是一场灾难。她丈夫谈起“现代化”便不分昼夜。永远服从丈夫的愿望，这难道不是妻子的美德吗？于是，她接受了现代公寓和爵士音乐，她常常每周两三次地和丈夫一起去看电影。她瞧着那些电影广告，它们表现的似乎都是男人躺在女人身上之类的事情。她带着一种恐惧的心理去看电影。银幕上，外国女人穿着开口很低的长袍，毫无羞耻地拥抱男人、亲吻男人。而且，似乎所有的电影都是描写女人是否乐意充当这种角色的。面对这一切她浑身发抖，即使是丈夫的不满与厌烦日益增长，也不能使她有所改变。于是，她丈夫越来越多地一个人带着孩子出去而把她留在家里，越来越多地和他的朋友而不是她一起出去消磨夜晚的时光。

久而久之，变故随着一位白俄舞女的出现发生了。她是上海一家夜间营业的咖啡馆的舞女，长着一副洋娃娃似的面孔，头发卷了几个卷儿。徐美林最初得知丈夫与这位舞女的关系时，扑在丈夫身上大哭起来，并把丈夫紧紧地抱住，企图不让丈夫出去过夜。“徐美林妒忌了。”她丈夫的朋友知道底细，大笑着说，“她是一个旧式女人，人也老了。”中国人一直认为，三十岁的女人就是老女人了。

美林几乎不会说一句英语。如果她能流畅地说上几句，就不会让自己的内心暴露在朋友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了。而她丈夫却象大多数小职员一样既时髦又空虚，脑子里无论转出个什么念头，有什么烦恼，都要吵吵闹闹地嚷个不

停。“如果依我自己的愿望，我是不会和她结婚的。”有一次她丈夫很痛苦地向我说起徐美林，“她是一个无知的旧式女人，脑子里灌不进一丁点新思想。我从她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我打算让她离开。”

“让她离开本身就是一种陈旧的方式。”我争论道，“况且，孩子们怎么办呢？”

“这不是我的过错！她喜欢孩子，她可以把他们带到我父母那里去。她可以拥有我在这里的全部财产。”

“那个俄国姑娘……？”

“她是个现代女性，从来也不会扫我的兴。她也想去美国。”

“她爱您也许就是因为她想去美国。”

他争辩说，关于这个姑娘我一无所知。然而他错了，徐美林曾领我去过那个咖啡馆。其实，并不需要个别地进行了解，就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姑娘。但是美林希望去看看她，希望了解一下俘虏了她丈夫的那种生活。我们走进咖啡馆，坐在一张桌子旁。美林小心翼翼地坐在椅子边上，观察着华丽的大厅。她的眼睛很黑，富有穿透力。她观察着每一个姑娘，包括她们的衣着、面孔和双脚。美林的脸上毫无表情，可她的眼睛却好象在燃烧。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乐曲《索尼娅》，一个歌手声嘶力竭地唱着：

“我的心儿多么痛苦，

因为你不再爱你的尼科罗斯！”

……

这以后，日子过得还象平时一样，可美林的丈夫要把她赶走的决心却越来越大了。哭泣多了，冲突多了，她丈夫呆

在家的时间却越来越少了。后来，美林不再流泪了。一天，她一头短发出现在我们面前。几天以后，她又把头发做成了波浪式。从前曾给她以个性的纯洁和尊严，现在消失殆尽了。她作为一个可悲的妇女出现在人们面前，这个妇女试图为了一个头脑空虚的丈夫去和一个头脑同样空虚的舞女竞争。此后不久的一天，当她走进我的屋子时，我发现她那雅致的长旗袍已经变成了一条齐膝的短裙，就和中国那些摩登女郎穿的一个样。短裙下面，却暴露出她那笨拙而僵硬的紧紧地裹着脚布的双脚——以前，除非她在行走，否则丝毫也不会引人注目。

这天，她打开留声机，扬起她那悲哀而又充满渴望的脸，害羞地恳求道：“请您教我跳舞吧。”留声机唱针擦过唱片的刻纹，开始尖叫起来——唱的竟然是我们那天在咖啡馆听过的那支歌！

要跳舞，心情必须舒畅，双脚必须灵活。可是，美林的心象铅块一样沉重，美林脚在童年时就已经裹成了残废。歪歪斜斜地扭了几步之后，她突然在地板中央停住，双手抓起裙边捂住脸，象小女孩一样放声痛哭起来。站在门道里的两个孩子瞧着自己的母亲，大眼睛里充满了惊讶的神色。孩子身后，留声机还在声嘶力竭地叫着：

“时值十一月寒冷的冬，
伏特加浸透了我的心。
啊！索尼亚——
我想你，正在这个时辰！”

下 篇
死 的 生 活

十六 死的生活

南京有一处古老而宽敞的中式住宅，它属于政府最高层的一位官员。这个官员享有学者兼政治家的盛名，作为学者，他的名声基于他的这一才能——书写极其漂亮的条幅，其中包括书写封建时代那些古老的格言；作为政治家，他的名声基于他的这一愿望——在军阀角逐之中，作为出谋划策的人物来行动。有些人根据古老而过时的观念，觉得他的年龄有助于他承担自己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可是实际上，他的年纪已经太大了。

他家里有九个女人——一个女儿、八个姨太太。在这座住宅的各个厅室里，甚至在不对客人开放而专供女性漫游的花园中，都时时飘荡着甜腻的鸦片烟味。因为他的八个小老婆全都抽鸦片，现在他的女儿也染上了这种嗜好。

他的女儿名叫琪菊，倒不经常抽鸦片，也不经常在那些充满鸦片烟味的房间里和紧紧闭着的花园中闲逛。因为，她曾经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主义者，她曾经激烈地反对过吸食鸦片烟，反对过娶姨太太，反对过把年龄或书法作为政治或学术的资本。然而，这都是五年以前的事情了。当时，她是一个苗条而活泼的姑娘，穿着军装，正和革命军一起从广州向长江流域进发。而现在，她成了一个孤独的女人。精美的丝绸旗袍从她的颈部垂至踝部，遮掩着她那虚弱得如同枯竹一般的身体。

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那伟大的群众革命的日子里，这个姑娘和她年轻的丈夫一起到莫斯科去学习。她的丈夫，一个意志坚强的男子，是江西南昌一个穷学者的儿子，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年轻貌美、思想活跃的琪菊，就象绝大多数中国妇女一样，以自己的全部身心追随着自己的丈夫。在莫斯科，她学习了在那里的大多数中国妇女以及共产党员都必须学习的一门课程——妇女象男人一样具有独立的人格，社会生产力决定性地确定了她们自己的人生道路，她们不必再受家庭、父亲和丈夫的摆布。

一九二六年，她和丈夫回到了中国。他们心中充满着对新世界火一般的激情，充满着对对方无限的爱，决心为中国大众的解放去战斗和生活。他们立即去了革命的麦加^①——广州，接着便和军队一起远征武汉三镇。他们的整个身心完全和席卷华南的伟大革命运动融为一体了。在那些日子里，当一个革命者是容易的，对于琪菊就更是如此。因为她置身在几百万革命者之中，而身边的丈夫又是一个农民运动的组织者。

但是，决定性的一九二七年来到了，反革命开始发难了，中国的土地被象琪菊夫妇这样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鲜血染红了。琪菊的父亲站在反革命的队伍中，成了南京政府的奠基者之一。作为一个仇恨共产主义——它向构成他的存在的一切提出了挑战——的封建遗老，他成了政府的发言人之一。

^① 麦加，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汉志境内，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诞生地和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是世界穆斯林朝圣的中心。——译者

在夺走了成千上万个革命者生命的残酷斗争中，琪菊的丈夫和农民们一起战斗着，他多次从囚禁和死神手中逃了出来。然而有一天，在长江下游的靖江，一个短发姑娘作为共产主义者被捕了。军事法庭经过短暂审讯之后，判处了她的死刑。只是因为姑娘宣称自己是南京一位老学究的女儿，法庭才没有立即执行判决，而是等候证实她的供词。后来，答复来了，她说的是实话，她的死刑被无限期地推迟了。

老父亲赶到靖江监狱，和被判死刑的女儿见了面。因为中国的每一件事情都为某些人的意志所决定，在父亲的要求下，女儿的死刑判决被取消了。但是琪菊所进行的比和白色恐怖作斗争更为可怕的一场搏斗，也就从此开始了。离开了革命队伍，离开了一直站在自己身边的丈夫，姑娘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那曾经养育过她的全部封建势力。

她父亲每天都来监狱求她，常常涕泪交流，甚至双膝跪在地上。他是她的父亲，他年事已高，而她是他唯一的孩子。是他给她以生命和存在，给她吃，给她穿，在家里所有女人都不曾受教育的情况之下送她上学，以父爱将她抚育成人。他是他的女儿，她的生命属于他。现在，他请求她表态脱离共产党，公开保证不再参加革命活动。

接下来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同志们仍然在监牢里等待着死亡，琪菊却从这个污秽、黑暗、潮湿的地方，转移到了监狱长舒适的私室中。在这里，她还是囚犯，她父亲每天来探望她。即使在这种环境下，透过父亲的恳求声，琪菊仍然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同志们的声音，因而她挡住了父亲的影响。于是，父亲把她转到苏州监狱，关进了

一个家具齐备、舒适无比的特殊房间。她要在这里一直呆下去，除非她改变自己的立场，做她父亲希望她做的那些事情。为此，她父亲常常从离此地不远的南京来看她。

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随着时间的流逝，同志的声音和关注的眼睛越来越遥远，甚至于慢慢消失了。每当琪菊想到外面那个世界的自由与安全，想到自己尚有可能从这个房间回到几码之外同志们所在的监牢中去，她的心就不由得因恐惧而紧缩了。父亲的话语越来越中听，她终于同意照他说的去做了。

释放时，她在报上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自己过去是一个共产党员，今后与该党及其活动脱离一切关系。然后，她随着父亲去了南京，在父亲的姨太太们生活的住宅中为自己弄了一个房间。

琪菊的丈夫，一个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在报上读到了她的声明。谁也不知道这纸声明对他意味着什么，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曾经不顾一切地爱着她，为她是一个革命者而自豪。不过，他了解中国妇女的力量和弱点之所在，也清楚将中国妇女和家庭、旧意识及黑暗制度束缚在一起的纽带之所在，因为他本人就是中国人，他与这些人来自同一个古老而腐朽的社会。

赎回自己的自由之后，琪菊收到了丈夫的一封来信——一封，只有一封！信文简明扼要。信的署名，也不是她平时所熟悉的爱称，而是他在公务往来中使用的完整而正式的名字。信中说：她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唯一值得为之生活与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她赎回了自己的自由与生命，然而却成了一个毫无价值的令人生厌的人。中国劳苦大众正站在生存的十字路口上，面对着解放与继续被

奴役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在这样一个时刻，她竟然做出了这样无耻的事情。带着因爱情死亡而产生的深切痛苦，带着不可动摇的坚定的信念，他宣称，她是革命的叛徒，是中国民众的叛徒，对于他来说她已经死了。这封信没有流露出丝毫的痛苦与惋惜，有的只是简单而明确的最终诀别。此后，关于他，琪菊所了解的就只有这样一个情况了：他去了江西，参加了红军，正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府而斗争。

琪菊生活在她父亲的南京住宅中已经五年了，她无时无刻不在思索这种赎回来的生活的价值。不，五年来她并不是在思索而是在做着一场梦——一场从鸦片的腾腾烟雾中浮现出来的梦。她丈夫唯一的来信，已经在她的枕头底下压了五年了。就是枕着这个枕头，她抽着鸦片做着梦。自从丈夫来这封信以后，五年来她再也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但是官方报纸不时地提到他的名字，称他为华中造反工农的“土匪头”。

琪菊每读完这样的报纸之后，便躺到枕头上抽鸦片。她那曾经十分强壮而又精力旺盛的身体，已经变得非常虚弱了。红润的脸庞变得象纸一样惨白。她的眼睛也象中国老年妇女一样，变得那么暗淡无光。她象一个幽灵，默默无声地在她父亲住宅中紧闭的花园里游荡，有时停下来，和父亲的小妾们扯上几句闲话。

在朝气蓬勃的过去和死气沉沉的现在之间，她用鸦片架起了一座梦想的桥梁——这就是她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当然，鸦片的腾腾烟雾，也许已经将对过去的回忆全部抹去了。

在南京城，还徘徊着离开了革命队伍的另一位妇女。她名叫谷兰，也曾和她的丈夫一起在莫斯科学习过。一九二七年四月，反革命在上海发难，大肆屠杀群众。他们回国后，还没有在上海站住脚，她丈夫就被英国巡捕逮捕并引渡给中国反动当局，不久便押往刑场，和一百多个男女一起被砍掉了脑袋。他的尸体象动物的尸体一样，被扔进了满是青年革命者尸体的象战壕一样又长又深的万人坑。

谷兰得知丈夫的死讯后，神志便有些不清醒了。她没有象别的女人那样大哭大叫，而是睁着干枯的双眼，不分时间，不辨地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着自己的丈夫——说丈夫在世时的千姿百态，说丈夫被砍头致死时的悲惨情景。

“他们强迫他跪下，把他的双手绑在背后……但是他仍然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她就这样无休止地自言自语。在她说话的时候，如果她的朋友们离开房间，她就会站起来，跟在她们的后面说：“他们绑住了他的双手，强迫他跪下，然后砍掉了他的脑袋。可他临死之前还在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万岁。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

开头，她的朋友们总不让她单独呆着。因为她在她们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怖，她们害怕她的话语给她们带来灾难。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们总是设法让她呆在她自己房间内。可是，只要她们试图把她所在的房门关上，她就会盯着她们嘲笑着说：“你们认为我有精神病，不是吗？你们想把我关起来，因为我的丈夫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我是一

个共青团员。”于是，只要她的精神病不是全面发作，她们就总是安慰她，让她的房门开着，让她一个人留下来。几个星期过去了，她总是在城里游荡，从一个朋友的家到另一个朋友的家，不停地说着。她睁着凶狠的闪亮的眼睛，迫使人们听她讲述她丈夫的生平与死状。有人说：“她疯了。要小心点，不能让她在敌人面前说这些。”

然而谷兰从来也不在敌人面前说起自己的丈夫。即使指出其区别所在，她也分不清外国人和中国人的模样。但只要有陌生的中国人在场，她总是一声不吭，只是在宁静中紧张地捕捉他们发出的每一个字词——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坐在椅子边上，好象随时准备朝他们扑过去似的。

好几个月过去了，她变得不言不语了，但她仍然在南京游荡。有一天，她在国民党党部出现了。她对一位官员说：“你们已经杀了我的丈夫，那么你们把我也杀了吧！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可我不是积极分子，我干什么都不适合。你们要不就杀了我，要不就给我一个工作，让我了此残生。让我一天到晚数着指头过日子，说不定我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出于某种考虑，这位官员将她安置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让她干一些机械性的活儿，一个月给她三十元钱。很清楚，她疯了，不值得为她消耗一粒步枪子弹。

现在，谷兰已经在南京住了五年了。她成了这样一个女人：两眼从不旁视左右，从不读书报，从不追求娱乐，从不走访朋友。清晨她就去干活，深夜才回到自己那空空如也的小房间。她在一只汽化油炉上做好饭，吃完后就上床睡觉了。她就这样消磨着自己的生命。在她床边的一个小桌子

上，放着一张邮票大小的照片。照片被装在一个廉价的黑相框里，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瘦削的年轻人正凝视着框外的人们，脸上有一种热切而严肃的表情。每天早晨以及晚上上床之前，谷兰都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这个年轻人——她已故丈夫的面庞。

一些已经背叛革命当上官的朋友有时来拜访她。谷兰总是用天真和坦率来迎接他们，说：“虽然我并不积极，但我毕竟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如果我积极的话，我就不会呆在这里，就不会和你们这种人谈话了。”她的这种天真和坦率，常常使他们无地自容，悄然而去。

当这些朋友怒气冲冲地向负责官员汇报她的情况时，后者总是说：“她是一个疯女人，无能为害。一旦我认为她有这种可能，我就会……”

就这样，这位革命者的妻子在南京这座活地狱里度过了五年。五年中，她丈夫所葬身的上海万人坑里，又增添了无数牺牲者的尸体。

茜成宣称，在大革命的日子里，她是一个 C Y ①。不过，这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因为她去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那些知道她的人都不承认她是 C Y。他们说，她是一个空虚而浅薄的姑娘，每天的时间都是依偎着爱人在床头度过的。

她的爱人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共产党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许是由于他个人的影响，才使得茜成去

① C Y，即英文“China Young Communist League”的缩写，意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译者

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她很少学习。她象许多有钱人家或中等阶级家庭的妇女一样，蜷着身子和爱人嘁嘁喳喳地说着孩子气的话。据说，这种作派可以让女人“逗人喜爱”，使她们对男人更有吸引力。因为爱人是一个共产党员，茜成的穿着也象一个小C Y，就象西方有些女大学生喜欢佩戴爱人的大学生联谊会证章一样。茜成的爱人多年来一直很激进，他认为一个女人能是一个C Y，这的确很美妙。然而，他对女性的看法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而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因此他觉得，如果这个女C Y能以对他的依靠来体现其本身的存在，那就更美妙了。

但是，反革命发难了。在强大的压力下，茜成所在的阶级不再是时髦的了。于是她放弃了自己对于反动阶级的权利与要求。在剧烈的犹豫与摇摆之后，她爱人也投靠了反革命阵营，成了蒋介石的得力干将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有人奇特地嘲弄他，说他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员，正在按照党的秘密指示做他眼下正在做的工作。

然而，即使在白色恐怖的最初几年里这是真实的，到后来也是不可信的了。因为他不会愿意放弃权力、安逸、地位和财富，而革命者每一步都可能走向死亡——或者比死亡更为可怕的严刑拷打。他死心踏地地替反革命效力，已经不可能从中摆脱出来了。

茜成先和这个男人秘密同居了一段时间，然后和他结婚并搬进了南京一处极好的住宅。在这里，她迎来送往的都是一些军事将领和他们的太太。这些太太们无所事事，日复一日地在首都逛来逛去。虽然岁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可茜成仍然是一个空虚而浅薄的女人。即使有许多人在场，

她也噉噉喳喳地对丈夫说些孩子气的话，做出一副不能自立而只能依附于人的孩子神态。

尽管在丈夫面前她表现得十分孩子气，表现得那么没有自立能力，但当她作为上流社会一位高贵而漂亮的夫人款款前行的时候，当她在赌台上面对自己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当她遇见往日的朋友——她觉得他们还是共产党人——的时候，这一副娇滴滴的作派就在她身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作为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一位官太太，茜成常常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由”“出借自己名字”，比如征集爱国款（此事后来杳无音信），赞助某所学校、幼儿园、孤儿院或者某项慈善事业，等等。每当这种时刻，她总是在一位身着军装或者佩着官方证章的男人陪同下，从自己的私人汽车里走出来，发表演说，赞助某项由她发起的或许还提供了百十元赠款的慈善事业。

不过，她最得意的，还是在南京军事会议期间露面。在这段时间里，军事将领和高级官员云集南京，寻求金钱、权力和更高的地位。而茜成的家，就成了那些即将完全成为蒋介石之羽翼的将领及其太太们的客房。赌博是茜成及其所在阶级的其他成员的主要娱乐形式。每天下午和晚上，她家的主要房间全都被打扫干净，并摆上了麻将桌。政府军事将领和高级官员的太太们在这里兴高采烈地赌博，输赢的银元数以千计。在这座建筑物警备森严的高墙外面，都能听到麻将牌的啪啪声。

在赌台上，茜成一扫平时那种娇滴滴的神态，摆出一副在南京城里久经沙场的女赌棍的样子。可她并不常赢，因为输和赢都是一种高级政治。如果对手碰巧是一位前途有

望的将领的太太，那么茜成就会打出两手笨牌，让这位太太当赢家。不论女人们心里想的是什麼，只要有这样一位将领太太走进房间，茜成就会暂时停下賭博，欣喜若狂地叫道：

“啊，您今天穿的旗袍多么漂亮呀！多好看的鞋！……您戴的是一只新戒指吧？玉环上嵌的全是珍珠呢！值五百块银元吧？当然，它值不少钱。不过要得到这样一只可爱的戒指，需要的就不仅仅是钱了，还得有很高的鉴赏力。”

賭博停了许多，先是茶水，后是夜宵——无数道奢华已极的菜肴。茜成是一位出色的女主人，她很少朝自己那玫瑰花苞般的小嘴里送食，而是不断地向自己桌上的客人们让菜。因为这些夫人汇集在一起时都那么文质彬彬，她们极少品尝摆在自己面前的菜肴。如果不得不表现出需要食物这种低下的情趣，她们就会露出一副正儿八经的虚伪面孔——筷子举起来了，可撩起的菜只有一点点。

此后，賭博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这时，男人们从商量如何同革命红军作战的会议上回来了，从男人自己的宴会上回来了，从与歌女的聚会中回来了——这些歌女来自上海最高级的妓院，“服务”一周的报酬数以千计。当然，这些姑娘优先让那些前途有望的将领们享受。

太太们要睡到下午才起床，起床后唯一要干的事情，就是为一场新的賭博作准备。一般来说，茜成的家就是这种无限循环的聚会的场所。不过有时候，夫人们也愿意乘汽车在南京城外兜风，在莫愁湖里泛舟——懒洋洋地倚着靠椅划水。每当这种时候，所有的船只都被扣起来了，湖上不允许有任何别的人露面。

在其他场合，茜成也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成熟女性。她

过去在莫斯科和共产党员在一起的生活，已经使她具备了一种活动能力。她清楚许多从前的男女同志的姓名和长相，他们至今仍然在坚持革命。对于这些人，只要她知道，或者在上海、南京见到，她都向自己的丈夫和丈夫的主子做了汇报。有时，她偶尔遇见了某人，但又吃不准他是不是以前的同志，或者遇见了某个被她丈夫和丈夫的主子怀疑为她以前的同志的人，她便彬彬有礼地请这人上她家喝茶以建立友谊。对这样的人她总是高兴地说：

“以前我们都是 C Y，对不对？那是多么有趣的生活啊！我至今仍然同情革命，我并不认为我们以前走错了路。”

她当然不会笨拙地询问客人当下做何感想，但她会运用她这种女人所具备的各种才能狡猾地进行迂回。她就这样操纵着谈话，从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答案。她常常旁敲侧击地提问题。每当等待客人回答的时候，她总是大睁着象蛇一样一眨不眨的又圆又黑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的对手。然而，她常常本能地感觉到，对方也象她一样狡猾，而且还具有她所缺乏的聪明才智。

有时，她主动去解救那些陷入恐怖之网而无生还希望的人。在这些接受或寻求她帮助的人们面前，她表现得十分仁慈，可以信任，富有同情心，而且慷慨大方。她总是用眼睛盯住求助者的脸，说：“案情的确严重呀！”然后便提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个人是谁，他在干什么，他的朋友和家人都有谁，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按照她丈夫及其主子的指示，她随时随地都在观察和聆听，然后回去汇报她所得知的一切。就这样，她弄到了共产党人的不少行动计划，探听到了许多共产党人的情况。

比如，这个男人可疑——他曾经在莫斯科呆过，可他现在却占据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他说话很少却显得无所不知；又如，这个女人可疑——她穿着廉价的衣服，瞧不惯涂脂抹粉，从来也不赌博，而且无所不知。这些人一定是共产党！

按照茜成戴着玉镯的葱白色的纤手的指点，有些人最好不过地“拯救”了他们自己，即象茜成这样，财富、权力、地位等等应有尽有。而他们如果被捕，有的就只是酷刑、屠刀、行刑队，或者是在中世纪的黑牢中一直生活到死。

在上海，外国人把茜成作为“一位出色的、强有力的男人的迷人的太太”来吹捧。但是在南京，这位噉噉喳喳的夫人甚至听不到公鸡在黎明时分的打鸣声。因为鸡鸣声被噼噼啪啪的麻将牌声淹没了，被夺走她过去同志生命的砰砰枪声淹没了。

十七 烈士的遗孀

在南京监狱坐等死神的日子，戴扬清以一种全新的观点，回顾了自己和妻子在一起度过的那些烦恼的折磨人的年月。妻子的探访唤起了他的全部回忆，尽管以往的回忆都是不愉快的。妻子以付给监狱长一百块银元为代价，换取了和他交谈几分钟的权利。她告诉他，为了救他，她已经从银行提取了三千块银元，她用这笔钱买通了监狱长和法官，请他们设法让他逃走。于是，戴扬清每日扬着因高兴而容光焕发的脸，等待着妻子允诺的实现。

每当回忆起自己过去对怀娟的态度，戴扬清便觉得良心上负担沉重。当然，他以往的行为也有其充足的理由。因为，多年来他一直在和她进行斗争，革命将他推向了一个方向，而她却被推向了另一个方向。对于这个由他家庭选择的妻子，他早已懂得如何爱抚了。但是到了一九二五年，也就是他被捕的那一年，这种爱情破裂了。尽管他们的三个孩子已经将他们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可是他却从不了解她，即使爱她的时候也是如此。她花那么多的时间喝茶聊天打麻将，以频频换穿新旗袍为荣耀，心里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穿着打扮。这难道是女性特有的生活方式吗？

不仅如此，她还特别爱钱。当然，这也许并不坏，因为他本人根本没有关于钱的价值观念。结婚十年，他总是将自己的全部薪水交给妻子。妻子以她自己的名义将这些钱

存在上海的一家银行里。通过一个代理人，她用这笔钱放高利贷，差不多赚了一倍。她象赌徒一样贪婪地注视着金钱的增长。戴扬清原谅了她，因为她是为了使家庭免于贫困，何况现在可以肯定，她正在用这笔钱来挽救他的生命。

他记得，他曾努力培养她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他将一些书籍和杂志给她看，热情地向她传授某种思想和知识。可是，她把这些书籍和杂志统统收进贮藏室的箱子里，它们都在那里霉烂了。当他试图向她宣传自己的观点时，她却给他一副烦躁而怨恨的面孔。

“谁统治中国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她抱怨道，“你有一个很好的职业，你的薪水也不少。如果你和那些危险分子混在一起，只会给我和孩子们带来危险。”

对于来看望戴扬清的那些朋友，她是持怀疑态度的。听到他们谈论戴扬清曾经试图向她宣传的那些东西之后，她变得更加反感了。后来，她竟将丈夫的客人一个个赶出了家门。

戴扬清希望她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从自己的朋友那里，从他们丰富的思想和秘密的计划中，他得到了许多东西。于是他反复尝试，企图说服怀娟。他的朋友多次警告他，不要向妻子泄露自己的事情。可要这样做并不容易，因为他爱她。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和她的冲突增加了。只有眼泪流下她的面颊时，他才后悔，觉得自己不该和她争吵。他将她搂在怀里，倒在床上，被她的无数亲吻堵得透不过气来。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答应保护她，答应切断与那些危险的朋友们的联系，答应不再参与那些危及她的活动。于是在一般时间里，她感到满足了，他们的生活也安宁了。可是要不了多久，他又被

自己的思想和计划拉了回去，家庭冲突重又开始了。而新的冲突，每每又以妻子躺在他怀里流泪为结束。他们躺在床上，戴扬清为妻子所左右，于是又给她以新的允诺。

他时时在夜里醒来，想着夫妻间这种折磨人的冲突。他知道，他的朋友们是正确的，他的妻子是错误的。然而，他本人却没有力量追随自己的信仰。他回想起控制过他的第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是他父亲的姨太太，他父亲为这个女人付出了好几千块银元。在差不多十年的时光里，这个女人一直是他的教师——教给他“爱”的秘密。

那时，他是一个十七岁的青年。在那以后的四年中，他一直暗地里等候着按她的指示行事，就好象一条秃尾巴狗在等候主人的指令一样。他用妒忌的眼光注视着她，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的沉郁的青年。他常常为病态的激情和犯罪的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后来他父亲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便突然将他送到国外留学去了。然而，即使在这位姨太太因疾病缠身而神秘谢世以后，她对他的魔力仍没有消失。他在自己遇见的每一个女性那里寻找她。当他答应和家里为他选择的女人结婚时，他也不过是将这个女人作为他所爱过的第一个女人的替身罢了。

戴扬清记得，夜里他经常坐在床头，凝视着熟睡中的妻子那模模糊糊的脸，寻找她与另一个女性的相同之处。然而，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妻子身材矮小，皮肤白嫩，眼睛很细。她所具有的只是一种僵死的、乏味的美，就象洋娃娃的面孔一样。她整日里劳心费力，也就是为了使自已维持这种美。而那个女人就不同了。她身材修长。当他将她搂向自己时，她那细长的黑眼睛被激情燃烧着放出异样的光芒；她的身子就象在和风中摇曳的一株秀竹，与他

的每一个要求相呼应。他还记得，她总是一声不吭。也许，在这种场合女人都是不说话的。她，是他对女性渴望的开始，也是他对女性渴望的结束。不过在妻子身上，也还有某种东西可以勾起他对那个女人的回忆。每当他春情荡漾地将妻子搂在怀里时，对过去的回忆便复活了，他似乎重新躺在那位姨太太的怀抱中。是的，就是因为有这些珍贵的回忆，他一度不屑于与自己的朋友交往，不屑于从事革命活动。

戴扬清记得这样一个夜晚，就在这个晚上，他最终将自己从妻子身边解放出来了，他以一种全新的激情取代了陈旧的回忆。这是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晚上，上海大屠杀^①的消息飞快地传遍了全国。当时，一切正常工作都停止了，每个地方的人们都在谈论着反抗、罢工、抵制日货。那天他回家很晚，指望妻子也会和他一样充满激情、斗志昂扬。妻子一见他便甜甜一笑，可她根本不曾听说外界的消息。当戴扬清将一切告诉她时，她用空虚的目光瞧着戴的脸。

“这些人常常把事情弄糟，”她不安地说，“他们总想挑起麻烦。”

“你说什么？”他心里又乱又惊，忙问。

“应该镇压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他们毫无责任感。你的朋友也一样，他们都在对你施加不良影响。”

他的双臂无力地垂在身体的两侧。他直直地站着，盯着妻子那空虚的面孔。

“我干下什么啦？”她嘴唇颤抖，热泪盈眶。她把双手伸

^① 即五卅惨案。——译者

向他，吊住他的脖子。可他仍然死死地盯着她，就好像她是一个陌生女人似的。然后，他缓慢而坚决地拉下了她的双臂，一句话也没说，甚至根本没有掉转头来望一眼，便离家它去了。

从此以后，他便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他在她的生活中消失了。而她则将自己的焦急、怨恨和泪水，凝成了对戴扬清的朋友们的仇恨，凝成了对正在席卷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仇恨。在南京，她从一个茶桌到另一个茶桌诉说着自己的悲伤。她的话传到了戴扬清朋友们的耳中。戴扬清对朋友们说：“她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工作，我从来没有向她讲过这些事情。”可他们仍然很着急，怕她的舌头露风。

后来，一个叫吴昌怀的急性子男人决定采取行动。一天，他出现在她的家中，直接了当地说：“听说你到处谈论戴扬清的政治活动。我警告你——你正在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如果你的多嘴多舌传到了军阀的耳中，他们会将他抓起来杀头的。”

她的脸色因愤怒而变得惨白。“你们都是赤色分子！正是你们在危害我丈夫的生命。你有什么权利强迫他参加这些活动，他是我的丈夫！”

“我郑重地警告你，军阀在每一个锁眼里都安上了耳朵。”他说，“除你以外，没有人会抱怨你丈夫的行为。”

“你是一个坏人！你给我出去！”她叫道。

吴已经警告过怀娟了，可她又在全城诉说着自己所遭受的新伤害。吴昌怀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收拾停当离开了南京，因为他自己也有暴露的可能。于是，戴扬清回了一次家。当他用坚定的话语对妻子的行为表示抗议时，怀娟愤怒地大叫一声，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后来，戴扬清被捕了，几小时之内便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怀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仇恨和愤怒。戴扬清的朋友请她以妻子的名义去监狱探视，并让她向当权者行贿。她却以各种罪名谴责他们。他们一言不发地等她说完，然后便直接了当地以尖锐的言词提请她注意：即使她说的都是事实，当务之急也不在这里，而是要营救她的丈夫。这件事可以由她出面，而戴扬清的朋友却不能冒险与他联系。

“谁出钱行贿？”她暴躁地问。

“我们。”他们对她说。

当他们说出“金钱”两字的时候，她的怒气消减了。最后，她同意了他们的计划。

怀娟在南京的各色衙门里进进出出，最后敲定了三万块银元的数目——这也许可以让戴扬清从监狱里逃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因为戴扬清的朋友都很穷。怀娟在上海的银行里有比这还多的钱，可她没吐出一个子儿。给戴扬清带来麻烦的是他的朋友，他们应该对此负责。于是，钱被送来了。戴扬清的老父亲从四川电汇了一万五千块银元，准备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南京。戴扬清的朋友这里一千那里五千地零零散散凑齐了一笔钱。

最后，三万块银元躺在了怀娟的手心。她注视着这笔钱，觉得将这么大一笔钱交给当权者，实在是太窝囊了。怀娟认为自己是有魅力的，钱不也就意味着魅力嘛。于是，她开始和法官及狱吏们讨价还价，就好象和店铺老板讨价还价一样。

“三千块银元就够多了——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没有这么多钱……我可以给你们五千……那么七千……”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威胁的增大，怀娟拿出了一万银元。死刑已经宣判了两次，可两次都缓期执行了，因为当权者在等钱。不过，他们要的是整整三万块银元。当然，比这更大的数目，他们面子上也过不去了。因为怀娟和他们讨价还价，就好象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豪门权贵而是普普通通的市井小人一样。

戴扬清的朋友每每悄悄来到怀娟家里，额头上总是冒着汗珠。“就付三万块银元吧！”他们说。付钱！怀娟看见他们在她面前这副毫无主见的样子，不禁笑了。不过一个星期以前，这些人还那么可怕地威胁过她呢。

“如果我将扬清弄出了监狱，”她说，“你们得答应离开他，以后不再将他拉回到你们的叛逆活动中去。”这些人瞧着她，黑眼睛里充满着仇恨（或者是恐惧）。

“好吧，我们答应。”他们答道，“我们答应你的任何要求，只要能赎回戴扬清的自由。”

“我会付钱的。”她说，“可是，如果我们再拖上几天，就可以少付点钱给那些当权者了。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们这些人。”

对于怀娟来说，事情是再有趣、再兴奋不过的了，就好象她读过的小说一样。她常常将自己描绘成小说里的女英雄——一个最漂亮的女人，玫瑰色的手心里掌握着帝国的命运。在旧小说中，女人通过狡诈和性的魅力，使自己的家族上升到显赫的地位并消灭了自己的对手。在现代的小说中，一个密谋者被枪杀了，他的朋友将他救了出来，发现他只有一处枪伤——而且还不是致命的，于是他们将他唤醒过来，细心地照料他，使他恢复了健康。幻觉之中，怀娟看见自己也在干着同样惊心动魄的事情。为了省

下一万到一万五千块钱元，她常常挑逗当权者；她还常常向扬清的朋友们施加压力，因为他们是要对他的监禁负责的。她时时幻想，如果丈夫到头来还是被枪杀了，她就要用汽车把他的尸体送到医院去，照料他，让他复活。

怀娟开始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努力。怒气冲冲地讨价还价和喝茶聊天之后，怀娟从监狱回到家中。她觉得，自己应该采取新的策略了。她去一家丝绸店买了许多新旗袍料子，然后乘人力车赶到裁缝家，叫裁缝立即加工。她打算穿着新旗袍，令人心旌摇动地出现在当权者面前。从裁缝店出来，她不想回家面对那些没日没夜地悄然出入于她的住所的人们——他们诉说着、恳求着、允诺着，汗流满面。可是，不听他们嘟嘟囔囔，她每天的生活都已经够紧张了。营救扬清出狱同时省下一半花费，这重担整个地压在她的肩上啊！为这些困难折磨着，她驱车前往一家水果铺，精心挑选了一篮芒果。带着这些东西，她赶到一个朋友家。在那里她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懒洋洋地吃着芒果，述说着自己心中的忧愁和难题。

次日上午怀娟起床后，又一次无精打采地面对她的困难幻想开了。可在外面，全城都在议论纷纷，说今天枪杀戴扬清。有人给怀娟送来一张条子，报告了这一消息。可她对此毫不在意，双肩一耸，心想：这不过是第三流的威胁手段，他们是想从我这里榨出三万块钱元。

不到一个小时，南京街道两边便挤满了人，另外还有许多正从不同的方向象河水一般涌来。不少外国人也混杂在好奇的人群里边。

一队士兵沿街而下。走在士兵中间的，是身材高挑、长相英俊的戴扬清——他的双手反绑在背后，没戴帽子，

瘦削、惨白然而却显现着聪明才智的脸上充满着视死如归的神情。

面对着成千上万懒洋洋地打着哈欠的人们(他们之中竟无一人挺身而出, 将他从士兵们手中救出来), 他喊道:

“我就要上刑场了。我是一个为革命奋斗的国民党员。打倒孙传芳! 打倒一切压迫人民的人!”

围观的人们大眼瞪小眼地瞧着他, 不时有人从鼻孔里发出一声短短的冷笑。成百上千个落在围观行列后面的人, 拼命地朝士兵队伍挤过来, 想看看一个人在他下地狱的路上到底是如何动作的。在被选作刑场的地方, 密密麻麻的人群形成了一个半圆。这些人常常以一种迫不及待的兴奋观看封建主义的旧戏。此刻, 他们又以同样的兴奋看着士兵排列成行, 等待着开枪时刻的来临。他们拼命地朝前挤, 想看得更舒服、更清楚。

戴扬清被押到士兵面前的空地上, 站在行刑队前方, 面对成千上万站在那里嘻嘻哈哈的男男女女。他抬起头来, 朝着中国的精神荒漠高呼:

“打倒孙传芳! 打倒一切压迫人民的人! 革命万……”

一排子弹切断了他最后的声音。他的尸体痉挛着, 随后瘫软下来, 倒在地下——他的头在尘土上压出了一个小坑。这时, 又响起了一排送葬的枪声。接着, 一个军官走上前去, 将尸体踢得面孔朝上, 然后举起手枪。一颗子弹射入死者口中。

这时,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男人昏倒在地。人们将他抬出去, 然后站在一边瞧着, 愚昧地大笑起来。没有一个人弯腰探视, 却有一个人走出来朝他猛踢一脚, 就好像踢的是一具死尸。昏厥者的身子一动也不动。一小圈人盯

着他看了一会，就转身看更大的热闹去了……

士兵们列队返回了。戴扬清的尸体留在原地，被几只野狗啃咬着、吞咽着。移尸它处是不允许的，因为戴扬清是一个革命者。人们走上前，睁大眼睛盯着尸体，心满意足之后，便四下散向全城，向自己的亲戚朋友述说今天的闹剧去了。

最后，刑场上留下了一具尸体和一小群好奇心尚未满足的人。此外，还有一个男人，他呆呆地站着，眼睛直视虚无缥缈的远方。许久过后，这个孤独的人动了动身子，似乎准备走了。这时，他的眼光落在地下的尸体上。

随着一声悲叹，他双膝跪下，将朝下的尸首翻转过来，抚尸痛哭，呜咽不已。过了一会，他再次将尸体翻转朝下，然后叫来一辆人力车，载上残缺不全的尸体，驱车而去。

在四下散去的成千上万个围观者中，有戴扬清的妻子怀娟。她听到戴扬清正被沿街押往刑场的消息后，赶忙打电话叫了一辆汽车。她觉得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故事——一个男人被枪杀了，他的朋友们将他救了出来，经过细心照料，他竟然又复活了。她也要象小说里写的那样，将自己的丈夫救出来。可是到达刑场以后，她根本挤不进水泄不通的人群。她没听到单一的枪声，可听到了一阵排枪响。接着又是一阵排枪，就好象是一支大部队在作战一样。最后，是一声手枪响。一个坐在别人肩头上的人说：“好了，这家伙完蛋了。”怀娟心里一阵慌乱、恐惧，她连忙转身上车，奔回家中。汽车司机提出要四毛钱赏钱，她冲着司机大呼大叫：“见你的鬼！”司机垂手而立，不知所措。

当天晚上，南京暴雨大作。几个黑乎乎的人影穿过雨幕，在黑暗中偷偷地爬到停放戴扬清尸体的地方。他们不时地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显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后来，他们又悄悄地爬走了。第二天，报纸说，阴谋分子的尸体夜里被人偷走了。还说这样一来，南京野狗的一顿盛宴便不得不取消了。

两天过后，戴扬清的父亲赶到了南京。他在这里呆了一个星期。临走前他回到怀娟的住宅，打点好行装，然后便扬起阴沉的脸对儿媳说：“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

怀娟哭叫道：“这不是我的过错！是姓吴、姓蔡、姓王的那一伙人将他害死的。他们将扬清拉入了歧途。我试图营救他……我就象一个奴仆一样拼命努力。现在归罪于我，在他们是容易的。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寡妇，拖着三个小孩，毫无自卫能力。如果扬清还活着，他们绝不敢这样攻击我。”

老父亲等她停止哭叫之后，又重复道：“是你害死了我的儿子，你拒不交付我为救他寄来的一万五千块银元。”

怀娟的眼睛哭红了，她痛苦地呜咽道：“我想你 现在要把这笔钱拿回去了……你到扬清的孩子手上拿去拿吧！”

老人转过身子，迈着缓慢的步伐离开了她的家。

只剩下怀娟一个人了。以前在她家神出鬼没的戴扬清的朋友，似乎都已吞没在虚无之中。她向前来安慰她的不多的几个女友哭诉着自己的痛苦，说是戴扬清的赤色朋友杀害了他。后来，听说对怀娟本人也起诉了。她的女友便赶紧收拾财物，一个个从南京消失了。

在伟大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光辉照耀下，戴扬清遇难的细节黯然失色，被人遗忘了。但是，他，这个国民党

烈士的名字却留了下来。慢慢地，怀娟作为烈士遗孀的名声、作为烈士遗孤的母亲的名声，也传扬开了。

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滚滚向前。南方军队占领了南京，旧军阀的军队落荒而逃。然而，随着一九二七年的来到，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中断了。在旧基础上，新军阀在南京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国民党进行了大清洗，只有军阀、地主及其知识分子辩护士被留了下来。戴扬清的许多朋友都过着钓鱼打猎的生活。

怀娟，这位烈士的遗孀，作为革命者忠实妻子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人们都知道，她曾经坚如磐石地屹立在丈夫身旁，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她本人亦常常回忆过去进行秘密革命工作时的种种磨难。官员们都来拜访她，给她带来大量的礼物，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政府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要她“继续戴扬清未完成的工作”。

既然这位烈士遗孀承担了种种新的官方责任，再要她抚养戴扬清的几个孩子当然就不可能了。她给戴扬清在四川的老父亲写了一封信，建议他领走戴扬清的孩子并抚养他们长大。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寡妇，以微薄的薪金负担自己和几个孩子的生活，是很艰难的。她写道，无论如何，孩子是戴家的人。于是有一天，戴家人来到南京，将三个孩子领回了四川。

现在，怀娟可以轻松自由地“继续戴扬清未完成的工作”了。为了完成这个“艰苦卓绝”的任务，她到上海买了许多新旗袍，还买了一大批外国香水、冷霜、胭脂和口红。她的头发也烫起了漂亮的波浪。有这些玩意儿帮忙，她就可以一扫过去悲哀和困苦的痕迹了。

她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于是一位老官僚欣赏的眼光

落到了她的身上。此人名叫傅广传，从前在湖南当官，是一个老国民党员。他相当富有，以致怀娟想到他时心脏都差不多要停止跳动了。他过去是一位新军阀的幕僚，反革命发难时他在湖南省帮助“清党”。当时的报纸报道说：“他将自己的拇指压在他地盘内的赤色分子身上——这是一个沉重无比的拇指。”

怀娟毫不犹豫地回应了傅广传的青睐。傅广传有一位旧式太太，他将她留在自己在湖南的庄园里了。不仅如此，他还有十个孩子。不过革命时期嘛，离婚对当官的来说并非难事。

这以后不久，傅广传的汽车司机便向傅广传公馆的门房透露了不少消息。这位门房又将这些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把它们传给了一位下级官员。据说，老头子时常晚上将怀娟叫来，天明时分才让她离去。这消息四下传扬，尽人皆知，最后传到了怀娟本人的耳朵里。一天，她去拜见大权在握、尊贵无比的傅广传。当她经过走廊时，许多小职员站在那里看她，有个人还嘻笑起来。于是，她愤愤地回家去了。月底，被怀娟恼怒的眼光盯住的两个人，便从他们的头儿那里知道，他们的活儿干得太不漂亮了，因此只能另请他人——犯下了罪过的汽车司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多嘴多舌的门房不得不在大街上流浪。

意外的事情在上海发生了。傅广传手下的一个科长常去上海度周末，在那里看看晚场电影，逛逛歌舞厅。一天晚上他回到旅馆，竟与老官僚和怀娟迎面相遇。他们正要进屋，听到他的脚步声便忙不迭地转身走开了。科长惊得目瞪口呆，一下子动弹不了了。星期一回到南京之后，他

的上司便立即把他召到办公室。老头子先扯了几句先总理孙中山的主义，然后对年轻人在其本职工作上所做的贡献赞赏了一番。他说，在新的革命政权之下，这种贡献是不能不予以嘉奖的。于是，他宣布晋升这位年轻科长为处长，并说以后若继续在岗位上尽职尽责，还会有相应的奖赏。

年轻的官员向其上司表示自己深深的感谢，并保证说，他愿意为革命、为党国献出生命。他还说，无论什么危险关头，他都可以为上司效犬马之劳。

不多久，会计开始为处里开销逐月上升大伤脑筋。上海商号送来的该处购物总账，有时是伪造的。而且，最近交给他的两份账单，一份包括一打女人围巾，每条价值三块银元；另一份包括两块桌布（带餐巾）、一匹绸料和一盒丝袜。

老官僚看着账单大吃一惊：“这里面有鬼！我要进行调查。”几天之后，会计被叫去了，交给他的两份新账单。一份，女人用的围巾改成了处里要的手巾；另一份，成了一张购买杂物的总账。傅广传站起来，讲了几句话。他说：他很高兴自己手下有这么一位眼睛雪亮的会计来管理处里的经费。蒋介石在最近的讲话中说过，官员的诚实在今天是难能可贵的。因此，会计的月薪升为四十块银元。以后若在岗位上有进一步的贡献，还会如此嘉奖。

会计对薪水的增加表示感谢，并且说：虽然他并不是为金钱才工作，虽然他觉得自己为党国服务竟然还要报酬是一种极大的耻辱，可是由于内地的饥荒、洪水和共产党掠夺抢劫，为了生存活命，他仍然不得不依靠金钱。以后，就象以前一样，他要继续无私地工作。

怀媀，国民党的精华之一，正在许多方面“继续戴扬

清未完成的工作”。一次，她在大街上与吴昌怀迎面相遇。吴昌怀是戴扬清从前的朋友。他曾经警告她说，她的多嘴多舌会导致戴扬清的死亡。也就是他，当戴扬清被枪杀时，曾昏倒在地。此刻，他身穿一套极不雅观的旧西装，戴着一顶旧帽子。一道伤痕横贯他的上唇，就好象有人朝他的嘴巴猛抽了一鞭似的。而怀娟，身着精美优雅的旗袍，就象是上海画坛的一幅杰作。怀娟停下脚步，迷人地朝他微微一笑。可是，吴昌怀并没有投桃报李，而是冷嘲热讽地叫着她作姑娘时的名字，说：

“听说您现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了，孙怀娟。”

她先是用疑虑，后是用怨恨的眼光瞧着他，答道：“我在尽职尽责。”

“就象过去一样尽职尽责。”他强调。

怀娟的怨恨变成了暴怒：“我也听说过你。你象过去一样，还是一个赤色分子，还在从事反对政府的勾当！”

吴昌怀笑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见识和权力，怀娟继续说道：“我在政府要处决的人员名单上见过你的名字。”

“也许你可以帮助他们，孙怀娟——就象过去一样。”吴昌怀答道。说完，他轻蔑地从怀娟身边走过，顺着一条小街拂袖而去。

这天晚上怀娟哭了。傅广传见不得他的小宝贝的眼泪。怀娟告诉傅广传：一切都是因为她在街上遇见吴昌怀时，吴侮辱了她。吴昌怀是赤色分子。过去他造成了戴扬清的被捕，现在他公然在大街上侮辱她。

老头子发怒了：二十四小时之内，这个人必定落入警察手中！不过，小宝贝实在不应该为这么一个土匪流泪。

她会有自己最喜欢的玉耳环，会有她想要的一切东西。

泪水继续从怀娟的脸上流下来。“这些人所以这样欺负我，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孤孤单单的穷女人。”她哭得透不过气来，“如果戴扬清还活着，他一定会保护我……可是在你眼中，我只是一个供人玩弄的寡妇。你的老婆有你的名声和地位的保护，我却一无所有。”

傅广传表示异议了：他爱她，可他的妻子是旧式妇女，是他十个孩子的母亲。如果他再娶一个年轻的老婆，面子上不好看。

“你说的不错，”她哭道，“我不过是个烈士的遗孀而已。我这个人太好了，我将自己的全部生命都献给了革命。可是要和你结婚，我这个人就不够格了。”

老头子摸索着吮吸她的泪水。他在她的怀抱中兴奋得瑟瑟发抖，被她一连串的亲吻堵得透不过气来。最后他答应说，她所希望的任何事情他都尽力去做。

又有一次，怀娟向傅广传抱怨道：“每个人都在飞短流长地议论我们俩，我知道谁应该对此负责。这是魏伏安教授干的好事。他极力否认自己是赤色分子。可戴扬清曾经秘密地告诉过我，他是一个红党。这就是他造谣攻击我们的原因。”

几天以后，一个朋友警告魏伏安说，他必须立即离开南京，否则就会被当作共产党逮捕。魏伏安大吃一惊。他说，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然而朋友宣称，考虑到传言的来源，即使不是共产党，他也免不了被捕的危险。当魏伏安听到傅广传的名字时，他想起了死在旧军阀手中的戴扬清。旧军阀成百上千地杀人，新军阀则是成千上万地杀人！当天夜里，魏伏安跳上了去上海的夜班列车。

这一天经过多年之后终于来到了，怀娟为革命受苦受难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傅广传和自己的旧式妻子离了婚，给了她和孩子各一部分财产。傅广传送给怀娟一大笔钱及其在上海的一部分不动产。在和怀娟结婚之前，他把这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因为怀娟总是倒在他怀里哭哭泣泣地说，如果她不在自己的名义下拥有财产，恐怕有一天他的孩子们会向她对他财产的权利挑战。怀娟说，她不愿意说这一天是指他在她之前死去的日子——一想到这种可能性，她就宁愿自己去死。不过，万一他不幸去世，事先有所准备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

离婚及财产手续办妥之后，怀娟和傅广传举行了现代式的结婚典礼。怀娟走到桌前。老头子骄傲地站在她身边，为自己占有了这位革命烈士的革命寡妇而得意。许多来宾就现代婚姻的优点夸夸其谈，说这种婚姻的基础是两性之间的爱情，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表现了新社会的诞生。一位发言者富有诗意地叫着：“我们拥有崇高的爱情，爱情统帅着全国的革命。有了它，中国就有了前途！有了它，中国就充满希望！”

有一个年轻的发言者是傅广传手下的官员。他从傅广传的所有部下那里搜刮了一大笔礼金，买了一件价钱昂贵的礼物。他就老傅在官场生涯中的“克己奉公精神”摇唇鼓舌了一番。他讲的时候，感动的泪水从许多客人的眼睛里流了出来，连傅广传老头自己都泣不成声了。

婚礼之后，怀娟充满感情地对前来祝贺的朋友们说：“现在我觉得，我能够更好地为革命服务了……”

十八 中国的显贵文人

在中国，就象在古希腊一样，家庭妇女从来不能与男子建立朋友或同志关系。虽然许多女学生都学着和男朋友一起在大街上公开行走，但只有少数几个人敢于当女演员。在中国，就象在古希腊一样，受过教育的男子没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从事的工作都是知识性的，他们认为从事体力劳动是丢面子的事情。

在推崇女性的时髦风尚中，我向北京的显贵文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问题：关于有身份男人的妻子身上存在的落后痕迹，关于姨太太制度，关于妓女，等等。

有些人说，妓女至少要比西方的卖淫制度好。我认为恰恰相反。因为，西方是把卖淫制度作为一种罪恶来认识的，然而妓女在中国男子的愿望中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敢于寻找自己爱人的中国妇女总是被她们的丈夫和家庭“打入另册”，然而中国男子却从来不会遭此磨难。

有些人说，旧式家庭中的姨太太制度为男人提供了“面子”。一个后来成为我朋友的诗人甚至认为，姨太太是男人们绝无仅有的爱的机会。“笑话！”我表示反对，“姨太太并非爱的选择——她们是买来的商品。”在中国，姨太太可以买进，亦可以卖出，还可以送给下属作礼物。

这位诗人早已和家庭决裂了。象许多中国男子一样，他拒绝接受家庭为他选择的妻子，虽然她已经作为儿媳妇进了他父亲的家门。他本人追随时尚，和一个女演员结了婚。

他的家里并不承认这桩婚事，拒绝接受他的新妻子。有一次他告诉我，他不爱二十岁以上的女人，因为女人一过二十岁就不漂亮了，柳条般的细腰变粗了，体重超过了一百磅。当他和我们一起坐在茶馆、餐馆或者北京的旧戏院时，我常常叫他从我们周围的女性中选出他认为最漂亮的来。

“你选的都是些空虚的长着娃娃脸的女人。”我告诉他。

他常常感到很遗憾，因为我不是男人，他不能强迫我参加在他那些显贵的文人朋友的阔情妇家里举行的晚会。他本人并没有情妇，可他不时地将自己的眼睛盯在其他男人的妻子身上。

某些摩登男人娶的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可是用不了多久，他们便毁掉了自己的妻子，作妻子的就不再具有和丈夫平等的地位了。一旦丈夫在家庭之外寻求爱侣，妻子便只是他孩子的母亲了。我曾问过这样一位妻子，她读些什么书。她答道：“哦，您瞧瞧，我十年以前毕业离校，此后不久就结婚了。”

不多一些意志坚强的现代妇女，总是明智地和她们的丈夫保持距离。她们是女权主义者，有自己的愿望，由自己做决定。如果她们的丈夫试图娶姨太太或者偷偷逛妓院，那么他们就大难临头了。每当听这样一些妇女讲话时，我总是想，裹脚的旧习俗也许并不真正是一种摧残妇女从而使之屈服的好办法。

有时，我和中国的显贵文人们呆在一起。我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成了好朋友。对于他们来说，我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在他们眼中，我是一个外国人，不年轻，不漂亮，自食其力，和男人之间关系平等。我的职业既不是作别人的妻子，也不是谈恋爱。

中国的显贵文人绝大多数都是“人道主义者”。有些人接受了约翰·杜威^①的理论，成了实用主义者。也有不少人受了伯特兰·罗素^②对社会的精辟分析及其明确的无神论的影响。如同我本人一样，他们也赞成伯特兰·罗素的观点——如果不存在死的恐惧，那么也就不会有不朽的信念。不过他们反对伯特兰·罗素的著作在中国传播，因为它欣赏中国的邪恶事物；它使得青年人骄傲自大，冒犯师长。

按照实用主义原则，这些显贵文人倾向于这样的观点——得不到实际检验的任何运动都是不可信任的。他们赞成美国的民主，但对俄国的共产主义尚有疑问。我争辩道：在历史上，美国曾经采取新的革命的路线，反抗来自欧洲的敌对势力。而现在的苏联并不比当年的美国干得少。可是这些中国人坚持说，马克思主义还仅仅是苏联的一种实验，还没有证实自己的正确性。许多中国学生相信马克思主义，华南的农民和工人正在为马克思主义而战斗，但是这些显贵文人却反对它。他们强调，中国并不存在阶级，阶级这个概念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移入中国的。有人曾告诉我说：他认为可以给中国共产主义者一个省，让他们在这个省进行实验。如果共产主义在这个省证明了自身的正确性，那么别的省就可以模仿它。他们说，科学和教育是争取进步的方法，科学在西方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争辩道，共产主义者不也在运用科学与教育吗？

① 约翰·杜威(1859—1952)，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实用主义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他曾经来中国讲学，加之胡适等人的传播，他的学说在旧中国有一定的影响。——译者

②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一九二一年他曾经来中国讲学。他的理论在旧中国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译者

有一位非常风趣而又思想丰富的显贵文人，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他曾经花了大量时间，在“中国的摇篮”——黄河流域发掘远古时代中国人的定居地，挖出了不少建筑物、家庭用具、艺术品、占卦用的兽骨，甚至还有形状象女性生殖器的作为货币使用的贝壳——这也许是远古时代母权制社会的遗迹吧。我承认，这一切都是价值无比、极其珍贵的。然而现实又如何呢？人们生活于斯劳作于斯的黄河流域，现在成了战火纷飞、洪水滔天、饿殍遍野之地。数百万的农民不断地从他们的家园中被驱赶出来。为了一碗面条或者一碗米饭，他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军阀、地主和官吏。甚至他们最基本的财产——起码的农业生产工具——都不得不送到集市上以物易物。他们的儿子象洪水一般地涌进军队，目的只是为了“当兵吃粮”。他们的妻子被人家买去当奴仆。他们的女儿被人家买去当妓女或姨太太。为饥饿所驱使，这些农民砍光了土地上所有的树木，把它们作为燃料卖给人家，以求自己可能的衣食。于是，降雨之时，竟然没有一棵残存的树来保持水土。“中国的摇篮”被洪水淹没了，大地一片荒芜。紧接着，风暴来临了。表土层以云雾状被席卷而去，沙漠甚至已经蔓延到了黄河流域。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黄沙甚至堆得象城墙一般高。我想，用不了多久，这些沙土就会成为这些城市的坟墓。

“为什么要现在去发掘那些死去了的城市呢？”我问，“五十年以后，制造死亡城市的各种条件都会被消灭。应该到那时候再去发掘它们。”

有人告诉我：这将意味着参与政治，而政治既腐败又危险。这些显贵文人一旦进入政界，他们的唯一结果就是

被黑暗所吞没。因此，中国的显贵文人应该等待光明时期的到来。听了他们的言论之后我不禁想到，谁有时间来等待呢？

在北京，我参观过一个火柴厂。除了工头和不多几个操作机器的工人以外，所有的工人都是年幼的儿童。他们都是从农民那里买来的，有的比婴儿高不了多少。他们排成长长的一列，站在装满火柴的浅盘面前给火柴装盒，每双小手的动作都象闪电一样迅速。就这样，他们一天要干十二个小时。走道上，工头手持短棍来来回回地巡视着。

孩子们每天吃两顿咸水小米粥，有时加几片青菜叶，有时滴几滴油星星。为了保暖，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躺在长炕上睡觉。所谓“长炕”，是一条贯通整间兵营式屋子的土平台，平台下面的盘旋烟道为平台上面的人们提供一点可怜的温热。我探望过一个盖着薄被躺在炕上的小孩——他已经病了三天了，可无人知道病因，也没有任何医疗措施，他不过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而已。

在中国，死神就象国王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家徒四壁的乡间茅舍是它居住的地方，肺结核和心绞痛是它在矿山和工厂猖獗的形式，它还不时出没在有产阶级——他们为了对付曾经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农民起义的威胁，用外国造的机关枪武装了自己——的恶梦之中。花天酒地地生活在港口城市的外国人，也害怕随着中国的每一个进步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死神，不论这进步是出自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还是出自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

死神和贫苦学生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然而学生们并不惧怕死神，他们只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考虑它的存在。据

此，我对中国的显贵文人说：“你们的死亡哲学是荒谬的。学生们并不接受你们的哲学。否则，他们为什么要造反，为什么要为全世界寻求一种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呢？”

这些文人争辩道：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学生们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们不负责任，他们把中学和大学的宿舍仅仅作为宣传中心来使用。然而，我并不了解这种说法的真实程度。有些学生一夜之间成为革命者，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吗？旧的传统禁止他们从事体力劳动。因此，他们温文尔雅，弱不经风，几乎别是一类人物。尽管如此，许多热心学习的学生还是变得很刻薄、很厉害，他们敢于向死神挑战，既不在乎到处游荡的密探，也不在乎警察的棍棒。

一天晚上，几个显贵文人请我吃了一顿饭。我开始懂得了，为什么许多外国人爱北京、爱交中国朋友、愿意学习中国话。我们在一家平时接待贵客的餐馆进餐。我走出我所下榻的中式旧住宅之后，关上了红漆大门。在我身后，一个苦力正好路过。我的毛皮大衣似乎在他心中唤醒了某种童年的回忆。他把脸转向冬日的天空，唱起了一支摇篮曲——一只五彩斑斓、威风凛凛的老虎，长的却是一个兔子胆。走到街角处，他还在自得其乐地对着白雪皑皑的寒冷世界唱着。然后，就象喜好悠闲的所有北京居民一样，他在一大群哄笑者中间停住脚步，开始欣赏在街上卖艺的小丑、魔术师或山东剑客。

我和我的朋友们会合了。当我们走进古香古色的中国餐馆时，侍者大叫：“八位贵客到——”声音如雷贯耳，连房梁都震得直抖。

候客的歌女显然正在试唱——将所有的半音依次与一

把尖叫的中国小提琴^①配唱。所有的歌曲都出自京剧。与歌女的歌声混杂在一起的，是男人们的尖嗓音。这些男人正在划拳行酒令。在这种游戏中，输者每次都得喝干他杯中的酒。与歌声相混杂的，还有侍者通报新来客人的叫喊声。毫无疑问，这些嘈杂之声温暖着餐馆老板的心，因为他一直在笑咪咪地向客人们鞠躬致敬。

侍者们端着几个敞口的木炭火盆走进了我们的房间。另外几个人端来了用小杯装着的各种各样的酒，其中有未经温热的烈性白酒——“白干”。呷了几口酒品了品滋味之后，我的东道主们接连下了好几道指示。不一会儿，用小瓶装着的冷“白干”和热果酒就被端进来了，一起端来的还有几大盘“小菜”。然后，经理进来了，他一边笑一边鞠躬。他身后是整整一队侍者，他们手里端着已经去了毛的著名的北京鸭——走进这家餐馆的大门时，我们就已经看见这些挂在屋梁上的鸭子了。我的东道主们象鉴赏家一样审视着这些鸭子，然后从中选出几只最好的，叫侍者们用文火烤。

这当儿我们围坐在桌子四周，一边交谈一边喝着杯中的酒，还别有风度地使用筷子吃菜。一个又矮又胖的客人举起酒杯叫着“干杯”。他说，今天的情景使他想起了一个朋友：此公英文程度很差，却非常喜欢在外国客人面前卖弄。有一次这位先生举起酒杯，一本正经地说“*We will now show our bottoms*”。

哄堂大笑。接着，我的一个东道主宣称：“我重复一遍，

① 小提琴 (Violin) 为西洋乐器，后传入我国。原文所谓中国小提琴 (Chinese Violin)，可能是指二胡之类的中国弦乐器。

中国没有阶级，阶级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输入中国的。我的人力车夫拉着我在大街上跑时，我和他可以象老朋友一样说说笑笑。”

“如果您不得不拉着他在大街上跑的话，您还会是他的朋友吗？”我打断了他的话，“如果他反对您的话，您还会是他的朋友吗？只有他认可自己的从属地位时，您才是他的朋友。”

“我也是一个无产者，我工作是为了自己的生活。”我的同桌自得地回答。

我的一位东道主用筷子夹起许多油煎鸡肝放在我的小碟里。后来成了我的朋友的那位诗人要来了纸张、擦子和墨水，开始为我构思一个中国名字。我不喜欢“梅花”或“荷花”之类的名字。最后，他给我取了一个中国旧式家庭的姓——“石”，还加了两个音节——“美林”。当我拒绝后者时，他只是把这个名字拼成拉丁语“Shih Mei Di Li”给我听。这毫无意义。但由于有四个音节，他便称我为蒙古人。为了我的命名式，上了更多的酒，还献了一首描写大海波涛的诗。我似乎回报了一首歌，这支歌肯定是《内里多的街》。我真正知道的只有这支歌。它作为一首古典乐曲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这时，鸭子上来了。最初，我们大家都坐着不动，眼光全部集中在鸭子上。我想，无论对于谁，只要看上一眼这只美妙绝伦的鸭子，就是死也值得了。可我的东道主们全都不以为然地摇着自己的脑袋，称眼前的烤鸭为下等货色。随着轻微的卡答声，我们将手中的筷子平放在桌面上。然后，所有的人都凑向鸭子，一块一块地撕下薄薄的鸭皮、鸭肉，把它们放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未经发酵的美味薄饼上。接着，我们

风度不凡地将用各种调味品配制出来的酱汁浇在上面，再加上一根嫩葱。最后，我们将薄饼卷起来，一咬一大口。我们几个客人的眼光幸福地碰撞了一下，然后感激不尽地移向我们的东道主。那神情就象是一群乞丐！开始吃鸭以后，一切嘈杂之声似乎都飘然远去了。我们喝着美酒，吃着烤鸭，喝着美酒，只是偶尔停下来就中国妇女、中国的显贵文人及无产阶级诸问题平平和和地争论几句。菜肴不断送上，美酒不断涌来。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起身离开餐厅。一位侍者跟到院子里，向我们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我们穿过院子时，另一个侍者高声送客。当我们走出院门，第三个侍者又高声呼应着第二个侍者的送客声。我们就象是一群正在检阅的将军，从两列向我们致敬的士兵队伍中穿过。这种仪式给我们以极大的“面子”，并使得我们慷慨解囊。看来，一个侍者为一毛钱鞠躬与他为两块银元鞠躬，真是有着天壤之别呀！

我们坐着人力车穿过寒冷的街道朝住所奔去。在我们后面，有人用尖尖的假嗓子唱着一支歌——一个囚徒拒绝出狱，因为这里是爱的监牢。这时，我不禁赌咒发誓（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我永远也不离开北京。只要我本人也能成为这样的显贵文人，即使在此消磨一生我也干。然而，我的誓言很快就变得混乱不堪了。因为在我面前，人力车夫就象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正默默无言地奔跑着，虚弱的咳嗽声不时地打断他那沉重的呼吸。突然，他那宽阔的肩头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①。啊，我在干什么？我简直是一

^① 史沫特莱出身贫寒，她父亲是一个劳苦终生的美国工人。——译者

只狗！我们全体都是狗！

“您听着！”我以最不耐烦的声音向我的东道主尖叫着，
“您下车，把您的人力车夫拉回家去！我们都下车，把我们的人力车夫拉回家去！让我们来证明一下——中国没有阶级！”